

聯東明西記



二三月合輯

總社出版會協盟聯亞東華中

風行中外的
亞東明報
第五回期出版了

內容豐富富印刷精美

愛讀請君幸勿錯過



東亞聯盟月刊

二月

三月

號合輯目錄

東亞聯盟運動的經過 汪精衛 一十一

處理中國事變與東亞聯盟 木村武雄著
周航譯 三十九

中日文化溝通論 陳璞 一〇一二

東亞聯盟之基本理論 大曼 二二一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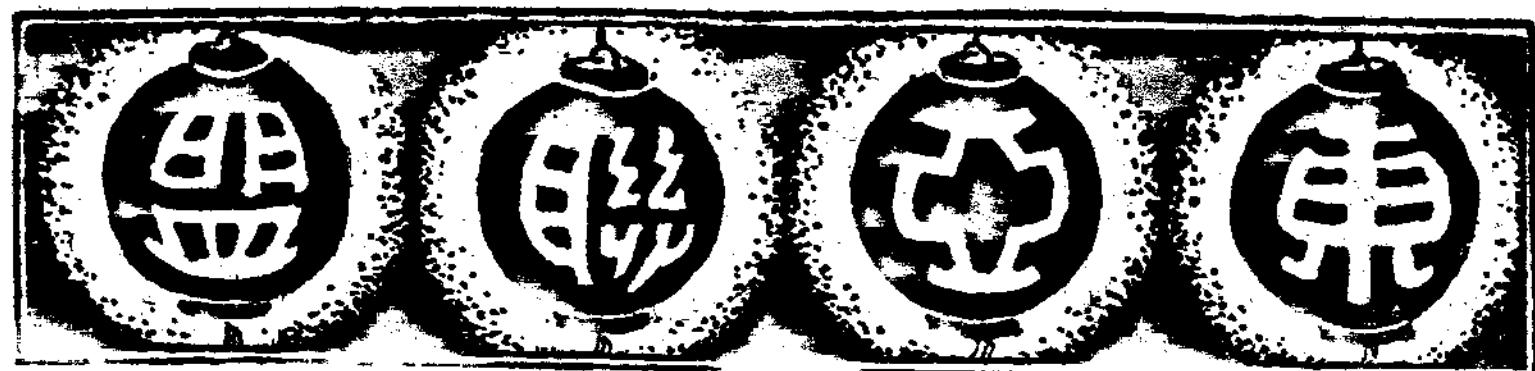
東亞聯盟與教育 何健常 四三一四五

東亞共榮圈與日本 田中香苗著
姚英譯 四六一五七

孔子畧傳及其學說大旨 革麌 五八一六四

美國參戰與軸心國家 前原光雄著
陳應榮譯 六五十六八

泰國與法屬安南的紛爭史 守禮 六九一七六



泰國之復境運動.....菊生.....七七——八二

文化之新體制.....大政翼贊會岸田國土著
文化部部長紀江譯.....八三——八七

和平傘下的民衆對策.....林无邪.....八八——九三

清代宰輔考略.....邱盤根.....九四——一〇四

東亞國防體制之急務與其原理.....岡野鑑記.....一〇五——一〇九

亞細亞民族政策論.....新明正道
譯者李辰.....一一〇——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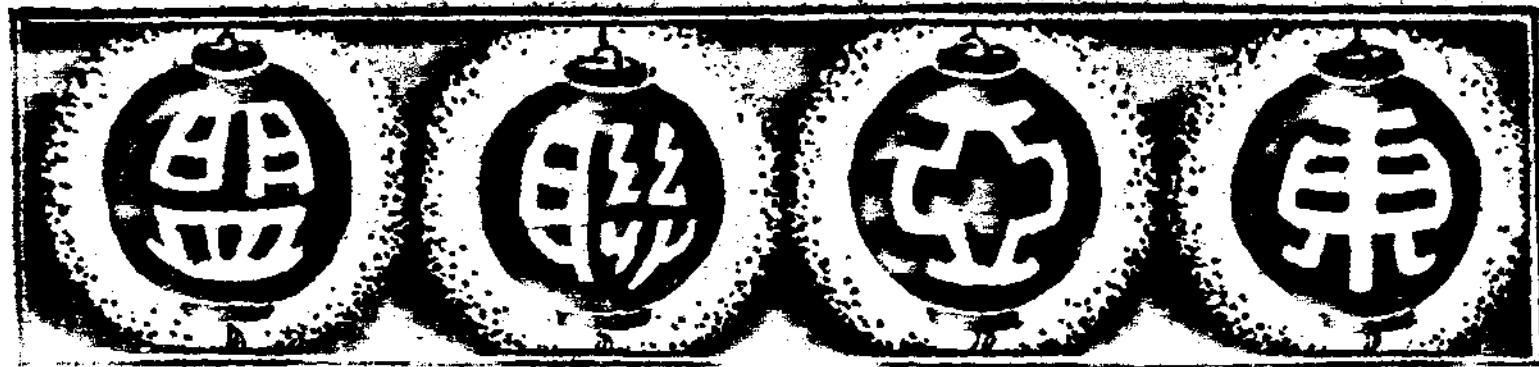
中日新條約與大東亞聯盟.....鷹島守之助著
徐華慶譯.....一一六——一三

緬甸之佛教.....謝爲何.....一二四——一二五

勘察加半島獵黑貂之奇談.....桐雲.....一二六——一三〇

中華東亞聯盟協會青年團
幹部訓練班第一期學員結業典禮招辭.....張子凡
三十一三四

會務摘要.....
一三五——一三八





東亞聯盟運動的經過

汪精衛

汪主席在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創立會致詞

自中日事變以來，中日兩方，同時反省，深感兩國關係有重新調整，東亞秩序有重新建設之必要。前此日本言論界曾有東亞協同體之倡議，我國人士以含義未明，甚少談及。其後復有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口號，詞意較顯，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近衛公廣播，說明日本之意，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期與中國分担中國東亞新秩序之責任。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更發表聲明，提出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去年三月十三日，米內首相復發表宣言，申述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意義，在東亞各民族國家，互尊其本然特質，各安其所，近隣相攜，共謀興隆。至此而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內容愈見明確。其在我國，既深知其對於建設新東亞所應分擔之責任，且尤深感中國一日不能完成其獨立自由，即無分擔此責任之能力。此義既明，故去年

遷都之際，中央政治會議於決議頒佈十大政綱中，即採用建設東亞新秩序一語。自此以後，兩國人士，更進而爲東亞聯盟運動。蓋悉本向來之主張，列爲綱領，使其意義，更爲一目了然而已，就中政治經濟軍事三點，固以近衛公廣播及聲明爲本，文化一點，亦余於豔電中所提出者，簡括言之，所謂聯盟即在使東亞各民族國家，本於獨立之立場，而爲共同之行動，所以東亞聯盟與建設東亞新秩序兩者，用語雖有不同，意義實則一致。去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日締結條約，同時發表三國共同宣言，以爲調整邦交，建設東亞之準則。吾人今日所以推進東亞聯盟運動，其精神亦正在於此。東亞聯盟運動，在去年秋間，各地先後有中華協會中國協會中國同志會之成立，及十二月向中國共和黨，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及中國大民會，更相率爲發展之解消，加入中國國民黨，並以促進東亞聯盟運動。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感於對進展之全國國民運動之統一實有必要，爰以鄭重宣言，昭告國人，決盡其心力，以促成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自此以後，即着手於本會之籌備，承各位熱烈參加，共創斯會，此實中國前途東亞前途之大幸也。



處理中國事變與東亞聯盟

木村武雄著
周航譯

(一)

第二次歐洲戰亂之進展，是促進中日兩國，必須從速處理此次事變。世界是正在天天的向着新的路上走。我們應明確把握此次事變之本質，非從速解決它不可。

中國事變是爲產生新東亞體制的東亞內亂。在明治維新時，西南之戰役，是不可避免的，爲產生新的東亞，此次事或者是迫不得已，也未可知。在此意義之下，且就過去的中日關係，聊可追想一下。

展開東洋近世史，即知在過去數世紀中的亞細亞，是怎麼樣受着歐美帝國主義，以巧妙的手段來侵害我們的教訓。明治三十三年，因爲日本對外條約，改正之成功，亞細但始得踏進脫却半殖民地狀態之第一步。孫中山先生在他那「大亞細亞主義」的講演中，曾說過：日本不平等撤廢之日，就是亞細亞全民族復興之日，由於不平等條約之撤廢，全亞細亞之國家及民族，對於獨立解放，便懷抱着莫大的希望。

但是日本是一個小國，由於積極的努力，一躍成爲近代化的國家。因爲由於膨脹的本能之發展，以至於與大陸發生交涉關係，清國在那時是感覺不少的威脅壓迫。格外是日本一戰勝過帝俄，一面牽制列強分割中國之大勢，最近列國對中國勢力之進出，表面上持以領土完整，機會均等，門戶開放之原則，終至變成爲經濟的鬥爭。在另一方面日本之地位，因此次戰爭關係上，急速的把它提高了，隨着那個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遂至對於大陸，採取積極的進攻的姿勢。日本對俄之戰勝，是最近數百年間亞細亞民族對歐洲人的最初之勝利。這樣的事態，給予被壓迫民

族的影響，是相當深刻不可臆測的，我們看一看從那時以後，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阿拉伯、印度等相繼的起了獨立之運動，即是明証。但是反面，他們眼看日本也具備了歐美帝國主義的發展之形態，對於他們予以甚大之失望，這是可以想像出來的。但是潛伏和東亞的歐美之壓力，是很強大的，尤其是清國在列強差別的特權之下，日本必須首先要充實他自己的實力，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以後，列強對日之感情，有漸次惡化之傾向，日本本着防衛東亞的立場，爲在均沾歐美帝國主義之特權，是不能不強化自己的立腳點。所謂二十一條問題，實在是日本爲着確保自己在極東的地位，也可以說是乘歐洲大戰混亂的機會，所嘗試的努力。至於中國對外憎惡之焦點，集中在日本身上的原因，乃是根據弱小日本急速的發展，多半以中國爲目標，所以中國感覺了失望和怨恨。中國人也應虛心坦懷考究當時之歷史，要理解日本是在不屈不撓的對抗歐美帝國主義的情形，及爲此不得不進出於大陸的苦衷。

(一)

日本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歸趣在不知不覺間，發生了兩種思想，一個是模倣歐美帝國主義之思想，一個是王道文化之思想。在近幾年日本對華政策之不能統一的原因，應該從他們意識不定的二種性格求之。進而從現實的歷史上去看，中國之對日感情，是由於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之宣言，及受蘇聯革命之影響，愈趨於惡化之一途。歐洲大戰後，歐美的力量，是綽有餘裕的，在所有的國際會議上，日本總是成爲中國代表抗議之的，有如被列國裁判的被告爲一樣，吾人至今，猶記憶之。同時也是因爲日本對於中國沒有確定的國策，且對中國之抗日態度亦頗欠澈底，即屢次出兵於大陸，也很難說有一貫之國策，這樣一來，兩國的關係，完全脫出軌道，遂至釀成了滿洲事變。

滿洲事變之特異性，自有其明微之指導方針。日本以國防的地位而言，原不辭和歐美帝國主義者一戰，在這種合理的信念之下，我們確信東亞大同有歷史的必然性，由於這個確信，必須根本的轉換從來對華之觀察。

由於滿洲事變產生出來最寶貴的東西，不外是從模倣歐美帝國主義，而轉向恢復王道主義之指導精神。所以在滿洲建國後，日本基於此理，專心一意，爲邁進滿洲國理想建設，明示出滿洲國爲中日提携之橋樑的重要性，用

現在的事實，來求中國之諒解。同時在另一方面去說，對於中華民國應加援助的，急不可緩的是國內統一，務期其及早實現完成獨立國家之實質，俾便分擔組織東亞聯盟之責任。但是很遺憾的，對於滿洲建國的意義，一般識者尙未澈底，因此對於中國，日本之傳統的認識，依然殘存着，且不能使對華的政策，趨於明顯。在此同時，就是中華民國關於東亞解放問題，也缺乏正常的認識，照列是踏襲歐美依存之愚策，強化其抗日，祇不過是激刺了日本的強硬論者，在這種情勢之下，便勃發了所謂中國事變。

(二)

在此次事變當初，日本政府始終堅持不擴大主義，在昭和十四年七月，中日事變二週年紀念講演中，近衛首相曾親自表明，我們應該認識中日滿一體的關聯，所謂中日之衝突也可以說是東亞之內亂，從所有各方面觀點看起來，都要極力避免的。但是在那以後，竟成爲中日全面的抗爭，遂致狂呼出膺懲橫暴中國的呼聲，到了東亞大同含有世界史的意義被闡明之後，日本國論才漸次適宜的改正，趨於建設的方面，政府所說的長期建設，也變爲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現在的日本並不是像在優越的希望之中，獲求處理事變之條件，可說是正在細心考慮成立一個能使中日滿有提携可能的基礎。亦即是日本自下爲要完成東亞自主的連環起見，在自覺之下，自甘忍受最大之負擔，進而克服現在的抗爭之狀態，意在今日以後促使東亞有新的進步。在此意義之下，日本雖在殘存着模倣歐美帝國主義的形態，可說是已經覺悟，現在着着傾向於王道主義。現在的日本，正是立在是否能夠獲得中國四萬萬民心的分歧點上。必須用一種能使中國的新青年，誠心悅服的國策，來收拾這個時局。因此應該從速斷然實行一掃新中國青年向來所完全拒絕接觸的，日本對中國的指導者陣營們。日清戰爭以來，日本國民腦海裏，均存着強者弱者的指導者之意思，浸潤着所謂大陸經營論的心理，而現在正應該宣告歷史的終了的時期了。

我們處在這個時機，百尺竿頭當更進一步，應該確立根據王道主義，作國家處理事變的方針。有一部分人目爲王道主義，批評爲微溫的消極主義，就是權利思想也實在是違反時代的趨勢，開倒車的反動的消極主義。當第一次

歐洲大戰終了的時候，凡爾賽和約各國，雖以條約盡量來束縛德國，結局又呈現出如今日之狀態。此次事變勃發以來，日本天皇屢次在諭旨中明白詔示，東亞之安定。東洋之和平。東亞永遠之安定等旨意，我們應該體奉君心，實現不致再發生第二次動搖的東亞之大同。根據王道解決事變，固然是道義的結合，且須審知中日兩國，因此也會獲得彼此真正之實力。

中華民國國民由於此次事變，可以體驗得日本決非輕於屈期歐美的，對於日本之實力，要加以相當之認識。但是中國現在恐怕是還以為日本是明治維新以後的暴富者，這種觀察完全錯誤。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不論那一次戰爭，甚至內爭，都是濫用依存歐美辦法，來阻礙自己的統一。但日本則不然，他們能舉國一致的造成今日的精神力量，和明治維新後吸收了兩洋的文明，這都是因為日本國民在歷史上有了充分的準備，決不是一朝一夕的僥倖，可以成功的。凡此種種，中國應該加深對於日本民族有適當的認識，清算過去一誤再誤的優越感。同時中國更要虛心坦懷，洞察日本現在模仿西洋的心理，已告訣別，正向着新東洋精神路上進展的實情，如再能真心示出以王道主義為基礎的東亞大同，庶幾可以接受日本之誠意。

中華民國應該認識滿洲國為諸民族共同之經營地的意義，承認其獨立，並且如能誠意贊同，根據東亞聯盟之精神，為中日真正之提携，那麼敢說，日本對於中國，是別無所求。進而即時把既得政治權益，返還於中國。至於此次事變，和平之根本方針，可以說，盡於此矣。

(四)

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衛首相談話中，最具體的闡明了日本政府關於處理事變的見解。我們要把上述的根本條件，作一個念頭，應該理解為這個階段的本聲明之內容。

本聲明最值得注目的第一點，是日本對於中國領土或賠償軍費，均無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為完成中國之獨立，進而交還租界，復且表明撤廢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同時希望中國承認滿洲國，明示出中日滿各自的政治獨立之

原則。

第二點值得注目的，是防共協定之締結，與防共駐兵之要求。防共協定據我們所理解的，是爲防止反王道主義，反東亞聯盟思想的思想協定之意義。但防共這個名詞，乃依據當時之政治情勢，而冠以防共二字，惟其內容，不僅限定這樣而已，實在是對於一切反王道之思想，加以制止，俾便擁護我們的東亞聯盟思想之協定。

防共駐兵之要求，也應該從這樣見地去解釋。現在日本方面有的主張駐兵之必要，有的以爲不然。防共駐兵之要求，可說是對於解決這個微妙問題，能使雙方都感覺滿意的辦法。因爲這樣的辦法，可以使駐兵主張論者的滿意，同時特附加防共一語，可明白表示和從來專依駐兵威力，希圖佔據政治經濟優位的權利駐兵意義之不同，這也可使反對駐兵論者首肯的。

關於駐兵問題，我們要率直的表明吾人之見解，所謂駐兵，乃基於中日雙方之理解。對於外敵，從防衛東亞地域之見地，應抱着國防共同之目的。如果脫出這種目的而駐兵，我們便加否認。若是從這個觀點去論，那麼近衛首相聲明中，所謂防共駐兵，并不是權利駐兵，固屬當然。且亦不得認爲是根據中日雙方之協議，爲純然之國防上的要求而駐兵，換言之，就是不能不認爲日本有暫時的駐兵之性質，也可以說是思想駐兵。即如前述，凡所有反對王道主義一切之思想者，在東亞大同之理想，還未確立以前，臨時在若干地點，分駐兵力以對付之，我們應當了解這種駐兵的意義。所以這個駐兵，反映着中日雙方之程度，有一種越早撤退越好的性質。

像這樣所說的防共協定之締結，防共之要求，是基於中日雙方尚未普及貫澈東亞聯盟精神的過渡狀態而產生的，東亞聯盟組成之原則，是思想一元化，在實現的同時，這種種要求，當然要解消的。當解決此次事變的時候，如在現在狀況下，想要一舉實行全面撤兵，誠屬至難。在那以後一部份的駐兵，在他那目的上，又這樣的很明確被規定，務求及早達成這個目的，然後實行撤兵，同時還有當實行駐兵的時候，又不能不採取與這個目的相符合的駐兵形式。

聲明之第三點，是要求設定內蒙特殊防共之地域。不用說內蒙是直接對抗蘇聯武力的一個軍事上之要衝。最近

假使中日之間，和平告成立，中國真正爲東亞聯盟之一份子，那麼中日雙方，除了貫澈聯盟思想而外，且須獲得足以完保衛東亞之實力，來對抗英美蘇的聯合力量，這是必要的，所以有人力說，目下視爲重要地點的內蒙，應特別劃定爲特殊防共地域之必要。到了聯盟成立之時，日本依據國防共同之原則，基於東亞聯盟共同防衛之義務，遇必要之時，應與中國相互協力，進軍於必要之地點。

聲明之第四點，是開發華北內蒙的資源，這是爲防衛東亞所必要的經濟力，大概日滿兩國之資源，是十分的充足，爲補其不足起見，日本方對比較因緣深的華北及內蒙，在開發資源上，提出了要求。但是這也不過是東亞聯盟沒有成立以前的臨時條件，如果真正立於中日大同之理念上組成東亞聯盟，必須遵從經濟一體化之原則。設若強化聯盟之經濟力，不僅限於華北及內蒙而已，就是西藏雲南等地，爲着東亞聯盟全體之經濟力增進起見，也要中日互相協力，作合理的開發。

(五)

我們對於近衛聲明的解釋，已詳述如上。總觀之，我們應當理解的，就是近衛聲明以東亞聯盟之組成爲目標，在那個組織未結成以前，是在臨時提出的幾個條件。他所提出來的各項要求，和我們所主張的東亞聯盟組成之各條件，是不差分毫，互相吻合，在極巧妙的方法表現之中，很明確的指示出東亞大同之道，這種近衛聲明公正妥當的內容，確信實在是我們對華政策思想史上劃時代的東西。

時值紀元二千六百年（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天長節的假期，由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發表的「中國派遣軍將士書」上說，獨調力主組成東亞聯盟，俾期處理事變，並澈底的嚴戒霸道主義及權利思想各點，將近衛聲明之內容，愈益促進百步，這是我們所深甚感激不已的。

在上面已經述明了我們關於處理此次事變的根本見解。根據這種見解，對於以汪精衛先生爲領袖的新中國中央政府，要一言日本所採取之態度。

在近衛聲明發表當時，在中國不過僅有一種臨時性質的政府存在。現在新中央政府，業已成立，日本要是承認這個政府，必須忠實的履行近衛聲明之內容，尤不能不極力尊重政治獨立的原則。爲此示出了如下兩點。

1. 應積極的援助中國完成獨立

爲此日本必須即時撤廢治外法權。只要暫時保留日本人向領事裁判所上訴的權力。同時租界問題，看中國的準備程度如何，在適當期間將此返還。還要在此同時，惟恐冒瀆中國獨立之尊嚴，應解散日本法人設立之華北開發公司及華中振興公司等，在中國新政府正常理解之下，改爲中國法人的。

2. 應澈底的取締不良之邦人

關於這點前面所引用的日本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發表的「告派遣軍將士書」，和其後華北派遣軍最高指揮司令部發表的聲明兩文中，是最直截了當的，強調其必要。但徵諸滿洲建國的體驗，要取締不良邦人，那麼撤廢治外法權，是一件不可缺的條件。

我們要排除所有一切的困難，因理解以上兩點。如此方能將東亞聯盟組成之原則，用現實來表現，且更可確信促進新中央政府於渝府之吸收。

但是這裏邊應該注意的，假設此次事變，已告解決，而中華民國要完全爲聯盟之一員，那麼如次之各條件，是有必要的。

1. 中日兩國應共同澈底貫澈東亞聯盟的精神。

2. 要獲得足以完全能夠防衛東亞之實力，以對抗外力，即英美蘇聯合之力量。

我們要使相持已久中日繼續的抗爭，從現實脫却，而貫澈以新的東亞聯盟精神，決不是件容易的事。日本國民應確認東亞聯盟之時代性，進而使中華民國自動的加入聯盟，彼此爲完成東亞大同之偉業，合理的集中力量，將東亞之地位，必須全面的使之向上。

中日文化溝通論

陳璞



- (一) 緒論
- (二) 文化的定義，分類，和特性，
- (三) 文化發生的條件
- (四) 中國文化的發生
- (五) 中國文化的發展
- (六) 中國文化的演變
- (七) 中國文化的改造
- (八) 日本文化的特質
- (九) 如何溝通中日文化

因此，汪主席在其所發表的電文裏說：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隣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隣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方針，以尊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而思想則是文化的核心，教育是促進文化的工具，在着輕視和排他的觀念，則在種種合作的前途上，必發生莫大的障礙，也許發生無窮的糾紛。

倘能使中日文化溝通，則教育方針的改善，與思想的糾正，必能到達。所以中日文化的溝通，又為中日和平所

必然，並且爲東亞聯盟的重要條件。

可是一談到中日文化的溝通，則中日兩大民族間，則多少潛在着一些輕視和驕傲的心理，在中國方面，則以爲中國有着數千年偉大文化的累積，而日本文化大部是從中國傳播過去的；但在日本方面，則又有些以爲中國文化已是衰退了，而日本文化正是新興起來，總比中國文化來得優越。這種輕視和驕傲的觀念，足爲文化溝通的障礙。

更有一部人，以爲文化的溝通，就是文化的侵畧，這種錯誤的見解，足以使中日和平的基礎上，發生很大的暗影！因此，我人必須指出，所謂中日文化的溝通，不是整個的模倣，而是文化的交流，每個民族的文化，雖有獨特的性質，但文化自有其移植與傳播的傾向，沒有鴻溝的界限，何況中日文化大致是相同的，日本文化在初期是有中國文化的輸入，及後有印度文化的輸入，最近有西洋文化的輸入；而中國文化自唐宋時代已有印度佛教文化的輸入，最近也有西洋文化的輸入。中日文化之所以不同的，不是絕對的不同，所差的是各有其本然的特質，和吸收外來文化程度的差異罷了。所以我們主張中日文化的溝通，並不是毀滅自己文化的特點，而

是中日文化的交流，互相擇長捨短，孕育而成一種新的文化，這是在奠立東亞永久和平的基礎上，是有其自然與必要。

然而爲要解決怎樣溝通中日文化？則我們必須要明白：（一）文化是什麼？（二）中國文化是什麼？（三）日本的文化是什麼？這樣才能明白各自的優點，是否適合其本然的特質，這樣須以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才能得到真實的解答。

（二）文化的定義與分類

關於文化的定義，則從來沒有一致的答題，更可以說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爲什麼這樣呢？主要的是文化的研究範圍太廣泛了，牠影響到人類整個的生活，所以許多學者，因爲研究的對象不同，對於文化的定義，就沒有一致，就廣義的說，包括着人類整個的生活，因此許多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多是說「文化即是生活」；而就狹義的說，則有些人以爲僅僅是一些哲學上的思想，或是倫理的觀念。但無論如何，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時，必須要明白，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二詞的區別，本來文化和文明沒有大不了的區別，而且歐

人的著述裏通用的很多，可是德國的學者，通常以文明（Civilization）指外部生活的發達，譬如殖產，工業，及其他法律，制度的進步。而德語（Kultur）文化是指學術、宗教、等。而對英文的所謂文化（Culture）也是指心智上道德上的開明的意思。近來我國的學者，對文化和文明字義的解釋，雖然還沒有一致，而大多數以文化是精神的現象，而文明則是指物質的現象；可是文化和文明是沒有截然不同的地方，而且關係也非常的密切，

因為物質生活常常受着精神生活的影響；同樣地精神生活常常受着物質生活的影響。這不是心物二元論的說法，而是一個的兩面。孫中山先生說得好，他說：

「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在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為體，即物質；何為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為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為用，由人之精神為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

（軍人精神教育演講）

這樣看來，所謂精神和物質，不是絕對的分離，而

是相輔為用。而文明和文化，也不是截然的不同，而是互相影響的。雖說文化是精神的現象，但和物質的生活有着很大的關係，如果僅僅拿一些哲學上的思想，或是倫理的觀念來代表文化，未免有點兒狹隘，如果說文化包括着整個物質生活，這也漫無區別。而最近却有人主張，文化是有生命的，如閻煥文先生在其所著文化學，對於文化的定義就這樣的說：

「文化是人類的生命力受自然環境的影響，社會的交流，歷史的傳授，發揚所產生有生命的東西。」

說文化是有生命的，固不始閻煥文先生，德國的斯賓格拉（O. Spengler）在其所著《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大唱其文化生命論，他的意見：「文化是最高等級的生活本質；而歷史是文化現實了的東西。所以在於歷史的生成，文化有生命，才可理解。」然而文化並不是有機體，為什麼說牠是有生命的呢？因為有生命的東西，是有少，壯，老，死的四種過程，而文化是有着這種過程的，而且文化更有着遺傳，增殖，傳播的特徵，所以文化是有生命的。

文化雖非包括着物質生活，但不祇是一些倫理上的！

觀念，而是包括着人類生存中整個精神活動的現象，牠的範圍是很廣闊的。可是要知道牠的範圍，也要研究牠的分類。

至於文化的分類，從來也是不一致的。如梁漱溟先生。在其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一書裏，對於文化的分類，沒有正確的分析，他認為「所謂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所以對於文化的分類，祇說：

- (一) 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是。宗教，文藝是偏於情感的；哲學，科學，是偏於理智的。
- (二) 社會生活方面，我們對於周圍的人——家族，朋友，社會，國家，世界——之間的生活方法都屬於社會生活一方面，如社會組織倫理、習慣、政治制度及經濟關係是。
- (三) 物質生活方面，如飲食、起居種種享用、人類對於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種是。

梁先生的分類，是把文化看作民族生活的總和，所以範圍是很廣闊，包括着一切物質生活，即是文化和文明同一看法，文明和文化雖沒有嚴格的分別，但文

化是指精神的現象，則梁先生的分類有點太泛。

至於美國生物學派的社會學者，漢根斯 (Hankins) 的分類，則為：

(一) 言語與交感：

- (甲) 姿勢與象徵
(乙) 言語
(丙) 文字

(二) 實際知識和工業藝術

- (甲) 食物

- (乙) 衣服

- (丙) 屋宇

- (丁) 工具與技術

- (戊) 財產

- (己) 個人的服務—職業

- (庚) 貿易

- (辛) 運輸

(三) 生殖的集團和德型

- (甲) 戀愛
(乙) 婚姻
(丙) 家庭

(丁) 血緣關係，他們的權利與義務

(四) 關於世界和人類的性質之觀念和習爲：

(甲) 神話

(乙) 魔術

(丙) 神學和宗教習爲

(丁) 醫學信仰和習爲

(戊) 科學知識和實驗方法

(五) 支配諸個人的私的關係之觀念和習爲

(甲) 儀態和禮制

(乙) 私的道德

(丙) 自願的結合

(丁) 遊戲與運動

(六) 支配個人的公的關係的觀念和習慣行爲：

(甲) 道德的風俗和制度

(乙) 法律的形式和制度

(丙) 政治組織和制度

(七) 美術和裝飾

(甲) 個人的裝飾

(乙) 繪畫、雕刻

(丙) 音樂

(丁) 建築

(八) 戰爭和外交

這種的分類較爲廣博，可以包括一切民族，由最高等以至最低等的文化。這樣，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範圍是廣闊的。

明白了文化的定義和分類，更須要明白文化的性質。文化不但可以溝通，而且從來有着移植。傳播，融和的特性，要明白這點，特分析如次：

(一) 文化的周遍性 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固然有着每個民族文化的特質，但從空間言，則文化是由人類生活的要求而發生，因是各種文化內容，從大體來說，是相同的。文化在空間上，不是孤立而是周遍的。

(二) 文化的累積性 文化不是短時間可以形成，一點一滴，都是由歷史所累積，文化是經過許多時間，而逐漸演進。由舊石器而至新石器，由新石器而至鐵器，由鐵器而至銅器，以至今日的機器，都是由歷史所演進的。而演進的過程，一點一滴，是由不斷的所累積而成的。

(三) 文化的移殖性 文化不受地域的限制，隨時有移植的可能，如希伯來基督教不發達於猶太，而發達於

歐洲；佛教出於印度而不盛行於印度，却發達於東亞諸國，如中國、日本、印度支那等地。所以文化是可移植的，並不受地域上的限制。

(四)文化的傳播性 文化並不是孤立的，可以從甲地傳播到乙地，這不是移植而是傳播，如以前中國文化的傳入日本，朝鮮等地，最近西洋文化之傳播東亞，這種文化的傳播，是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或由交通的發達，而使兩種民族相接觸，而使文化傳播。

(五)文化的融和性 文化雖能移植與傳播，但決不能整個地傳播，必定與原有的文化，與地理的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或由於兩種文化的融和起來，或產生一種新的文化。如巴比倫文化與埃及文化到了歐洲之後，與希臘文化融合，成了近代西洋文化的基礎。

(六)文化的獨特性 文化雖然是可以傳播和移植，但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性質，這獨特的性質是一部分或少部份，兩種民族文化的類比，無論如何，大致雖相同，而少類仍差異的。其差異的原因，是出於地理的環境，或其祖先的遺留，如風俗，神話，習慣的不同，往往影響到民族的性格，而使社會制度的差異。

(七)文化的關聯性 文化的發生變化，是互相關聯

的，如甲民族文化可以影響乙民族文化的变化，同樣地乙民族文化亦可以影響甲民族文化的变化。又如物質生活的生活的演進，可以使一切文物制度的發生變化，則一切思想，政治，宗教等亦隨着而變化；同樣地學術思想的進步，可以使文物制度與物質生活也隨着變化。這是互相影響而且可以隨着變化的，所以文化是有其關聯性。

總觀以上的剖析，雖未能析文化的特性，而觀此則可知文化是有移植，傳播，融和，關聯的性質。則文化的溝通不但可能，或因此而孕育一種新的文化，這祇看我們東亞民族如何努力。

(二)文化發生的條件

文化是怎樣地發生的呢？在未研究這問題之前，先要解決的問題，文化的發生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呢？即是說文化是從一地發生，而分佈成若干支系；抑或從各地有若干發生文化的條件，而產生若干文化體系的呢？現時主張一元的或多元的，尚在聚訟紛紛，莫衷一是。主張一元的，如英司密斯(Elliot Smith)，在其所著《古代埃及人》一書說：所有的文化，都發生成長於埃及，由此傳播於世界；其次是帕萊(W.J.Perry)所著文明的

生長及日子二書，均說文化運動，起初是發生於地中海底埃及，而傳到西歐羅巴洲，又漸漸擴展到世界各地；至日人西村真次，在其所著文化移動論，也有同樣的主張。至於主張文化多元的，如德國的斯益格拉（Oswald Spengler），在其所著西方的沒落，則主張文化孤立發展，他認為沒有所謂人類全體文化；存在的只是相互各不相關的個體文化，各文化雖有時外表上發生接觸或混合，但在內面精神方面，是難於瞭解的。而葛臘納（Graebner, F）則把世界的文化，分成若干文化區，這文化區不是地理上的區域，而是一種文化型，每種文化型最初是獨立發生的，逐漸傳播於世界。

關於文化的發生是一元還是多元呢？我們的看來，一元的有點不妥。因為文化的發生，當在人類分佈以後。而人類是否一元的，至今還成疑問，達爾文的進化論發表以後，人們都相信人類是同源的，是由猿人轉變而來的，但自最近中國方面，在北平西南約五十公里處西山之龍周口店地方，由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連續發見中國最古的人類化石，此遺骨委託北平協和醫院專門教授步達生（Davidson Black）博士研究，而研究結果，謂與爪哇發見的 (*Pithecanthropus*) 人，英國發見的

(Pit down) 人，德國發見的 (*Heidelbergensis*) 人，同為世界最古的人類，因是名為北京中國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而與北京人同出土的化石研究的結果，大概屬第四紀初期，其年代距今約四五十萬年，或至壹百萬年之間，因是人類一源說，已發生動搖。最近人類學者則主張三源或四源說，文化的發生傳播與人類的分佈，雖未必完全一致，而人類一源說既發生動搖，則文化一元說更難成立。即主張文化一元的司密斯（Eliot Smith）則謂太陽石器文化（*Heliolithic Culture*）由埃及傳播出去，不會在公元前九百年之前，主怕萊（W. J. Perry）則謂在埃及第六王朝之初——約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但無論如何，中國北京人在周口店發見的，已能治石英，石器及骨器的工業，而遠在四五十萬年已是晚期舊石器時代，則不獨可打破司密斯和帕萊的文化源出埃及之說，反之，說文化源出中國為更可靠。

不過在我們的研究，文化的發生是多元，中國文化則出自本土。現在世界文化史來看，文化的發生，至少有五個發源地，（一）埃及，（二）巴比倫，（三）印度，（四）中國，（五）墨西哥。由埃及文化與巴比倫文化，西趣至歐洲，變成了西洋文化；而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則

混合而成東洋文化；至墨西哥文化則中途毀滅。

文化的發生，是多元的，文化的形態，也不一致的。而且巴比倫與埃及文化，到了西歐之後，與希文禮化相混合，遂孕育而成現代的西洋文化。又如佛教本發祥於印度，但佛教却不盛行於印度。文化的發生，傳播，變遷都有着地理的環境，及發生的條件。如果沒有明白這些，則談什麼文化溝通，都是沒奈的。

然而文化發生的條件，是什麼呢？主要是地理的環境，有了良好的地理環境，才是產生良好的文化，而地理環境中，則以交通和生產的關係為重要。在古時交通沒有現在這麼發達，而河流則是交通的重要條件，當游牧時代的社會，也須要逐水草而居，但農業的社會，則更須要利用河流的灌溉，而且有河流的交通，則農人的物物交換，而至商業的發展，也基始條件而發達。

所以埃及文化產生於尼羅河(River Nile)流域；巴比倫文化產生於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平原，這裏有着底格里斯河(R. Tigris)和幼發拉的河(R. Euphrates)的兩大河流，橫貫其中；印度文化則產生於恒河(River Ganges)流域；而中國文化則產生於黃河流域。

其次是氣候和地形的關係，中國文化和巴比倫文化

發生北溫帶；而埃及文化發生於亞熱帶，印度文化則發生於季節風帶。從氣候去說明文化，因為古時的人民，智識幼稚，抵抗自然界的力量薄弱，人民生活在溫帶和亞熱帶的地方，比較容易生活，而且適宜於農業生產。所以最初文化就發源於這幾個地方。

從地形方面來說，尼羅河每年定期的泛濫，幾遍洪水的沖積細泥沉澱，而使平原增加土地的肥沃，這是從游牧時代轉變為農業時代的重要條件。這尼羅河的河源，青尼羅河發源於阿比西尼亞(Abyssinian Highlands)的高原，查那湖在每年積雨之下，泛濫而抵尼羅河。不僅如此，青尼羅河還引下盧溫左里山(Ruwenzori)的積雪，這山古時稱為月山，綿亘三十餘哩，拔海一萬三千呎至一萬六千呎，山上有著窮年的積雪，山谷高處，佈滿着冰川，在定期的暴雨到來時，洩注而下的冰雪，融解而成了定期的泛濫，加以白尼羅的源流，系出中非洲許多湖泊，當青尼羅河洪水下流時，白尼羅的水不得不暫時倒退，到了青尼羅河退落的時候，白尼羅河的水重復下流，在一長時期保持尼羅河下游的平均水量。

但最初的埃及人，沒有明白洪水泛濫的原因，以為是一件奇蹟，引起埃及人神秘的思想，說尼羅河的水，

是神的哭泣而來，稱這洪水為「埃及之淚」(TearofAries)。因是宗教的色彩，成了埃及中心的文化。而埃及不僅有尼羅河定期的泛濫，而且有撒哈拉大沙漠(Sahara Desert)的阻隔，使敵人不易來侵，遂使埃及人很少戰役的準備，而有餘暇來研究和平的藝術。

可是巴比倫的文化就有點不同，雖然有着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的河，橫貫於美索不達米亞，也一樣像尼羅河有河水泛濫，但沒有尼羅河有平均水量，春天雨季過後，就是旱季，人民感着農業灌溉的需要，於是建築許多巨大的湖沼和運河，一可以減少洪水的水勢，並可以貯藏水量，從事農業的灌溉。然而因為沒有像埃及有撒哈拉大沙漠的阻隔，而且底幼兩河接連於波斯灣，而成了歐亞兩地的商業交通孔道。因為有着兩河的水利，而使農業生產發達，因為兩河的交通利便，而使商業繁盛，遂使附近許多民族羨妒，為許多強大勢力所爭奪而統治。所以回教的可蘭經是讚美戰爭的。

美索不達米亞，在阿述王國的時候，是一個黃金的時代，巴比倫人會侵入西歐，而希臘人在亞歷山大大帝的時候，也會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羅馬帝國強盛的時候，亦佔有美索不達米亞之一部，及後在阿刺伯回教徒統

治，阿刺伯人企圖於此建立回教王國，不幸底幼兩河從人工做成的湖沼和運河，忽於修理，以致常有水患，從前許多肥沃的農田，變為荒蕪，商業也跟着衰落，巴比倫的文化，也就衰退了。

當埃及文化有了偉大的城市和建築物，但歐洲人還處在漁獵和遊牧時代，可是埃及文化和巴比倫文化一到了歐洲，就成西洋文化，主要的原因，是有丁希臘人的精神，希臘是處在巴爾幹半島的南端，地濱地中海，希臘人很早就過着漁獵生活，因此希臘人在紀元前二千年至二千年之間，已從腓尼基人(Phoenicians)學得了航海術，而因為航海的需要，而有克服自然的追求。而且希臘的地理環境做成了希臘人自由的思想，希臘這一塊地方，山脈綿亘使陸地形成了無數小山谷，而海岸又參差不齊，形成許多沿海小平原，各與外界相阻絕，在這樣的地理環境，就形成了希臘人無數的自由的城邦(Polis or city state)。這些城邦和一般城市不同，牠是一種政治組織，把政治、宗教、社會各方面包括無遺，他們既沒大部落的政治壓迫，各城邦的公民能自由參加政治。因此，他們能自由發展其個性，盡量運用其才能，加之以他們活潑而好奇的心理和敏捷的智慧，希臘人不但能容

納文化，並且能孕育文化。他們從埃及學得了建築術，天文學，醫藥學及幾何學；從腓尼基人學得了字母和航海術；從克里特人學得了機械術與工藝；他們並能從把巴比倫文化和埃及文化的哲學思想，建設了一個知識的系統，創立了近代哲學的源泉；又因能自由發展個性，與克服自然的追求，從各方面的知識，而奠立了近代科學的基礎，孕育了近代的西洋文化。

文化的發生，雖未必盡是地理環境的關係，在初民時代的公共聚餐，圖騰的宴會，這種宴會便是社會的、藝術的、宗教的淵源；而為滿足性的要求，於是有戀愛的風俗，婚姻和家庭的關係，以至倫理的觀念，也因之而發生。惟是的地理環境，却是文化發生和轉變的重要條件。這樣我們為要研究中日文化如何溝通，則必須究中日文化發生的地理環境，才能解決怎樣溝通的問題。

其實詛咒是不必的，徒然的讚美也是沒用。中國既沒有偉大的文化，何以今日演變至次殖民地的地位。我們實不能不尋求其因。在現階段的中國，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否需要一一加以發揚；抑或徹底的拋棄；抑或擇長捨短而加以改造。因此我們對於中國文化是須加以客觀的檢討。

可是我們一研究到中國文化，就覺得所謂中國文化，其性質與範圍，雖是渾然自成一體，異乎其他文化的型式。可是詳細分析起來，則在時空上是有點差異，從時間上言，則現在的文化，已不同於清代的文化，清代的文化已不同於宋明時代的文化，更不同於唐漢時代的文化，與先秦的文化差異更多。說是文化進化嗎？則孔子以後其政治哲學倫理思想無更深的發明，且後人多是述而不作。說是退化嗎？則因人類因生活的關係，已由

簡單而複雜，文物的演進，已是日新月異。從空言，則中國文化有各種民族的混合，各民族的文化，自有其差異之點，即以漢族而言，漢族文化，可以說中國文化的代表，但所謂漢族，也不是一個種族的一源而來，而是多個種族的混合而成。即漢族的基本族華夏，夏族和殷族已是兩個民族，衛聚賢著「中國文化起源於東南發達於西北的探討」（見東方雜誌三十四卷七號）以江蘇浙江相繼發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與殷墟的文化同，因是主張夏民族是從西北來，殷民族是從東南來。但我們不必於此細辯，總之，所謂漢民族是由多個民族漸漸同化而成。

現在我們要研究族漢族文化的發生，實不能不明瞭中國的地理環境。中國文化最初的產生是在黃河流域，黃河是中國文化的搖籃地。黃河發源於青海高原巴顏喀喇山下的星宿海，經甘肅、寧夏、綏遠、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省，長凡二千三百哩，牠的流域面積約有七十三萬方哩。這樣廣大的地域，在初民游牧時代以至農業時代，已有不少部落聚族而居，而因為利用河流自然灌溉的關係，農民能用輕巧的農具，即可耕耘而種，這就做成農民樂天安命的心理，所謂：「日出而

耕，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是農民樂天安命心理的寫照。農民既有樂天安命的心理，而所要求的是土地，當時黃河流域，地廣人稀，土地取用不竭，所以部落雖多，而戰爭甚少。且各部落為着黃河的共同水利，何況黃河是從高而下，水流甚急，時有氾濫，各部落為着共同利害的關係，趨於合作，政治亦傾向於統一。因是各部落各自擁戴其酋長，各酋長又共戴一大部落的酋長為元后（即天子）。那時天子對於諸侯，不是以武力征服，而是出於各部落酋長（諸侯）的擁戴，所以為天子的對於各部落的行政，不但不積極干涉，祇以道德去教化人，去感化人，要人懷德，不要人畏威。如果不能以德服人，那末，諸侯就不肯擁戴，天子的勢力就消失了。所以堯之子丹朱不肖，諸侯不謗譖丹朱而謗譖舜，堯就不能不禪位於舜。及後禹治水成功，疏九河，而使黃河之患以平，於是諸侯又謗譖禹，而不謗譖舜之子，所以舜就禪位於禹。當時所禪位的是各部落所擁戴的元后的地位。而堯之子丹朱，及舜之子商鈞仍為該部落的酋長。

但當時各部落民族所深以為憂的是黃河的水患。如孟子所云「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禽獸

遷人……。」而禹能治水，所以各部落感禹之德至其後而弗衰，故伯益雖賢，諸侯竟謗譖啓而不謗譖益。又啓之子太康失德，那時的一强大部落有窮（國名）后羿，因民弗忍拒於河，夏后相避羿，羿因夏民而代夏政。而大康之子少康居縕，雖然仍是一個小部落，「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一成，五百人爲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卒復禹縕」。所謂復禹縕，就是恢復天子的地位。這可見當時諸侯對禹的懷德至其子孫弗衰。直至夏桀無道，諸侯離貳，夏民有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之語，而殷民族的湯武始伐夏。且那時湯武亦必先佈仁德，使諸侯愛戴，又必待別人國失德而後伐之，所謂吊民伐罪，於是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僕我后，後來其蘇的情況。

為什麼要這樣呢？就是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在黃

河流域的部落衆多，有着共同的水利，共同的利害，而需要分工合作，政治上自動的傾向統一。但這統一不出於武力，而出於各部落的擁戴。所以爲各部落共同的元后（卽天子），必須以仁德感人，如要取得元后的地位，則必以仁義道德使天下歸附，卽所謂以仁義王天下。否則專以武力攻伐，則各部落各懷恐懼，不但不擁戴，勢必羣起而攻之，元后的地位，不獨不能獲得，也許會給其他部落所消滅。所以在岐山之下的一個新興部落周族，雖地方百里，而自太王、王季、的時候，早已施行仁政，至文王時，各部落傾向於周的心理，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而文王猶不敢伐湯。及紂無道，民心離貳，周武王才大會諸侯於孟津以滅紂，這所謂仁義之師。中國的仁義道德的王道文化就在這樣環境下產生。

三未完：



東亞聯盟之基本理論

大曼

一、東亞聯盟道德之基礎

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國，世界之所以爲世界，莫不賴文化道德以統攜之，綱維之，保全之。文化爲道德之輪，道德爲文化之軸；文化賴道德以前進，道德依文化而永存；文化爲先鋒，道德乃後盾；人有之則安，無之則危；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世界有之則進化，無之則退化。古今中外，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其能一一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爲全世界人類造無量無邊之幸福者，舍此蓋無他屬者矣。然試一追溯古今上下，轟轟烈烈，光耀寰球，能以此提携世界，動萬國人羣之崇拜之瞻禮之信仰者，非我東方之偉大文化道德乎！孔之大同，老之貴德，釋之尚慈，其精神皆足以參贊造化，曲成萬物，範天下萬世人心於不死，此非一日一時之所積也，行之者數千年，化之者數百國，習焉而相忘，久焉而相安，深印入於人心而不自知也。

自西風東漸，邪說橫出，萬徑千蹊，莫知所適，言德化者，不出於奇，則出於迂；謬柱鼓瑟，違反治理。世之學者，趨向新奇；新知之來，不加別擇，貿然信之；又或剽竊新知，未經同化，即以問世，冀獲名利；執其學術一端，即曰文化權輿，不知道德爲學術之體，學術乃道德之用，無道不立，無德不生，無論其爲若何學術？若不根本於道德，則其學術皆爲無本之學，不得謂之文化，以其不惟無益於世，而反貽害於世也。

(一) 文化道德之真精神，乃根據於世界人類之真理，而非根據於個人之空想，根據於人類最大公之公益，而非根據於少數人之私利也。如孔之老安少懷，老之利萬物而不爭，釋之慈悲普渡，各科學家哲學家之發明，非以此爲旨歸，不足爲世界人類生命之保障，而致萬國於大同也。故學術進化，皆宜以道德爲皈依，而由其救世之心所發出，

始能利民之用，厚民之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造福於世界人羣矣。（以上余曾代某報作發刊詞，數數言之）

張公臨安曾著「一切宗教科哲根本道德論」一書，謂回之教義，多與基督同，基督之教義多與孔孟同，孔孟之教義，其向上一義多與老通，老之教義，其精微處，多與釋同。基督與回專敬事上帝，而孔六經言上帝者殆百數十，是卽孔與基督回互通之明證；釋與老多講性命，而孔六經言性命者所在多有；是又孔與釋老互通之明證；德之康德，英之培根，法之笛卡兒，爲近世紀科哲泰斗，開文化變遷思想進步之先導，然試取康德之純理性批判，培根之實驗法，笛卡兒之懷疑論，其與孔子學說，可互相發明者甚多，是又孔與歐西各大科學家大哲學家互通之明證也。蓋孔教根本人道，故一切入世出世形上形下之理論，均無不可以孔教證明之也。東方偉大文化之精神，道德之基礎，莫不莫乎此。大哉至聖！首出羣倫，微乎微乎！孰造其極？西謬稱爲無冠冕之君；德儒花之安預言五百年後，孔教遍行全球；德人費希禮氏，以爲孔子根本之深，不在已往，而在將來，不在一國，而在萬國，以爲孔子生前所立許多目的，尙未達到，且未昭著，以待後人，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至於老學淵源最遠，聖如仲尼，猶深欵欵，遺經俱在，大可證明，有一與後世所托相同者乎？跡其道德一經，精深渾樸，一切天人哲理，進化公例，無所逃遁，實爲東亞道德之發源。近世英哲羅素，稱爲哲學鼻祖，取其以柔勝剛之說，足以制伏强大各國，消其雄心，使人類漸趨於平等。一二經言，包括無垠，矧茲全文，利賴何窮，知我者希，孰知其貴？老子之言，今方驗矣。足見我東亞之文化道德，可以昭示全世界，貫澈百萬世，使大同之來，必先之以大道爲公。門戶爭持，黨派傾軋，害公道而阻進化者，皆不足稱文化道德也。蓋人類共生於大地之上，必有天賦人羣共同秉彝之公性，而此等公性，原諸先天，具於人心，擴之爲達德，體之爲達道，人人俱有，個個圓成，不以地限，不以時異，雖全球萬國種族有異，文言有異，風俗習慣一切有異，而此等公性，則未嘗或異，而各大聖哲，適得以天賦人類公性之全體，足以代表一國數國或數十國數百國思想境遇之感觸，共同利害之關切，薰習既久，遂結成一種無形之信約，浹洽其肌膚，鎔鑄其鳴類，印入於其腦筋

，而牢不可破，國與國以是教，人與人以是習，夫是之謂文化。陸子所謂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南海西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百世以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百世以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

中日兩大民族，世居亞東，人口約占全世界五分之二，為五千年文明古國，袖聖綱出，至周而集大成於孔子，其道淵淵浩浩，恢恢廓廓，器量宏遠，足以兼容並包，氣吞六合而無遺也。若能大其道，廣其教，繙繙繩繩充滿其教之量，能使萬國文化趨於同一之軌道，萬國文化同一，則世界大同至矣。夫大同者視人類衆生，皆同一體，無所分別，無所偏私，均齊物類，與已無異。大同開幕，國民之程度，乃日進高明，東亞文化，必大放光明於全世界。吾人處於今之時代，為中日兩國計，為東亞永安計，為萬國前途計，思欲改造世界，謀人類和平之真幸福，必從根本着手，合東亞羣聖羣哲道德之真精神，以喚起全球萬國無量數人道德之真精神，並以喚醒億萬世無量數人道德之真精神，俾人人皆知道德行道德，使人人無偏私之見，無分別之心；無偏私無分別，則無人我；無人我，則無國別，無國別，則無種界；無種界，則不主異視；不主異視，則好惡得失利害榮辱種種識心因緣無從而發，則競爭不生，戰殺不起；劫運以閉，生運即開，太平可期，大同可致，孔之至善，老之清寧，釋之極樂，耶回之天國，以及社會主義者之理想社會，乃可得而實現也。東亞聯盟，必矢斯義，以先哲之精言奠其基石，發揮國體之精華，確立東亞聯盟之基本理論，（王道）方能行使總力，實現強力之一元的戰鬥機構，完成世界第一精銳之武力集團，建設世界新秩序。以東亞之基本文化道德為學術之中心，確立東亞聯盟之基本的國防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以推之；以東亞之基本文化道德為外交之重心，與以建設世界新秩序及東亞新體制為宗旨，斡旋於世界國家合從連衡之波浪中，完成東亞國防經濟體制及國民生活之一切的國防體制。根據以上諸原則，可以：（一）發揚國體建設道義國家；（二）綜合的指導理論辦理國政；（三）擴大以改造世界改建東亞為目標的國民活動範圍；（四）將政治和統帥化為一元；（五）將國民生活之一切完全為東亞盡義務之觀念更加澈底；（六）對中日滿全國民活動範圍，為世界永久和平而努力，確立東亞聯盟計劃之指導體制。

一、合中日民族性之相近者，融鑄東亞特殊「國性」。

民族之生存，恃有特殊之民族性，特殊之民族性不滅，國家始能有救，特殊之民族性發揚，民族方可有爲。中日兩國，值此晦茫否塞之餘，宜爲特危扶顛之計，如謀自救之方，當有固本培源之策，苟求自生之路，端在潛修船晦之誠，要從根本上，奠定東亞於磐石之固，必在實際上，暗登黃色民族於無疆之麻，東帝民族庶幾乎共趨於平安坦途，固享永久之幸福也。

民族性如人性然，人性不同，乃如其面，雖極相近，而終不能以相易也。失其本性，斯失其所以爲人矣。民族亦然，因性之殊，乃各自爲民族；苟無其性者，則自始不能以立國；民族性未成熟具起時，其國不固；立國以後，而民族性流轉喪失，則民族必亡也。

民族性爲何物？耳不可得而聞，目不可得而視，其具象之約畧可指者，則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以次衍爲禮文法律，有以溝通全民族之德慧，術智，使之相喻而相發，有以綱維全民族之感情愛欲，使之相親而相扶；此其爲物也，極不易成，及其既成，則亦不易滅，豈惟不易滅，以物理學實力不滅之眞理律之，蓋有終不得而滅之矣。

蓋人類共棲於一地域中，緣血統之融合，羣交之漸判利害關係之密切，言語思想之感通，積之既久，不知不識之而養成各種無形之信條，深入乎人心，其信條具有一種大德威，能鎔合全民族使自爲一體，而異於其他民族，積之愈久，則其所被者愈廣，而其所篆者亦愈深，退可以自固壁壘，而無使外力得侵，進可以發揮光大之，以加於外，此民族性之用也。

由此民族性之演進，小而大之，狹而廣之，即可以促人類之進於大同世界。有周之時，秦楚爲異，性不同也；至漢而一。有漢之時，匈奴，西域，西羌，西南夷，南粵爲異，性不同也；至唐而一。有唐之時，突厥，鎌勒，高昌，龜茲，吐火羅，吐蕃，吐谷渾，契丹，回紇爲異，至宋而一。有宋之時遼金蒙古爲異，至元而一。明清之季，海禁漸開，迄至民國，五族共和，則成一大民族果誰爲異乎？中日雖爲兩國，而民族爲一種文字思想，宗教，習俗

，大畧相同，較周秦漢唐宋元明清時之異族的差別爲淺，數年來，祇以一念之差，鑄成六州大錯，兄弟之邦，兵戎相見，荼毒遠超前古，芟蕪漸及子遺，雙方損失，不可勝計，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也。

戰爭雖爲不可避免之事實，然吾人當盡力減少其時間，乃不幸中之最大幸事；如何減少之？即結成東亞聯盟之最後手段也。喚起東亞民族，完成東亞之統合，並一王道文化爲基礎，來建設有普遍於世界之可能的大東亞社會，以便顯示東亞民族之真面目。中日聯盟之經濟的互相依存關係結合，構成聯盟之外廓，從妨害東亞統一之外力重壓之下，將東亞解放出來，如此，中日國民治爲一爐，而鑄之融合無間，成一大民族性，則可以合中日滿三國，而爲一大國也。

東亞聯盟者，乃東亞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如國防之共同，經濟之一體，政治之獨立等），能本此義，發宏通精深之論，約宗教學術於一心，而歸納於東亞道德之途，俾無謂之競爭息，而歸本於大民族性（即大人羣性，包括人類主義，人權主義，人生主義，當另文論之），則中日根本上之競爭息矣，中日根本上之競爭息，則東亞民族可以進趨於大同之一隅也。

夫大同者何？無分別心是也。蓋有分別心，則有人我，有人我故，則有國別，有國別故，則有種族，種族分故，多主異視，凡諸好惡得失利害榮辱種種不同之民族性因之而起。民族性不同，則生競爭，競爭甚故，即成戰殺，戰殺既已，譖爲劫運，舊仇未去，新仇又生，因果循環，同歸於盡，悲矣痛哉何其有極！豈知天生人類，皆屬平等，豈獨厚我，專薄於彼？天如薄波，何如不生？我獨安逸，使彼危亡，我獨存在，使彼滅亡，揆諸天性，夫豈其然！是以大聖大哲出世，視人類衆生，皆同一體，無所分別，無所偏私，均齊物類，與己無異，孔之無意必固我，老子之觀物無物，釋之無我人衆生壽者，基之敵汝者愛之，害汝者善視之，回之僕隸入道，皆受同等待遇，康德之世界衆生，如一網罟，絲絲聯貫，成一體系，內不見有分別心，外不見有分別相，故能精神合一，圓應無方，若互爲參證，互爲貫澈，學無常師，書與人同，集合萬國聖哲之學說，同研萬國共有之民族性，成一大民族性，（即大人羣性）作根本息爭之圖，收起死回生之效，豈非萬國人羣之最大幸福哉。

否則不足言和平，不足言改造，更不足以言解放，言之徒彌縫於形式也。不信，各國成法具在，一法敝，更立一法，一制乖更易一制，窃恐雖有千萬良法美制，將終窮於應付，而無以善其後也。故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無論政體如何，國體如何，要皆不能逃出德性範圍，獨創新奇之境界，可以樹永遠之基也。

凡國皆有其國之特質，其特質，即民族性也。喪厥特質，則精靈無宰，而國以天墟。夫國家之可以得而變革者，如政治，典章，文物，正朔，服色，徵號，皆隨時世爲移易，至於其國本有之特質，則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渝，保之則存，舍之則亡。

日本所謂大和魂者，具見於武士道，武士原作貴人侍者，或衛弁解，平安朝以後，武士階級，漸形顯起，輪奐爲之一新，變爲智仁勇三者兼備，道德之士，成社會上層極有榮譽之一階級。武士階級，既在社會及政治上，地位日趨重要，集團生活必須之道德觀念，遂成爲世道人倫之準則。因稱其所守義理爲武士道，其發達與封建制度，雖有密切關係，實導源於古代日本人民各種習慣性情，而受其中集團道德，及結合意識之影響爲尤巨。復經佛教儒教琢磨而成。萬葉集中有云：「死於君旁，方稱本願」。又云：「嗟我丈夫，勿忝爾祖。」武士道精神，實基於此。

身蒞戰場，視命如毛，養此勇氣，端賴平時。故一而使其生不戀今生之念，淡泊無欲，以得積極勇敢之實行力；一面消極使之大悟無我，重禮義，以養其犧牲之精神，一旦施於君臣，父子，夫婦，同胞之間，卽發而爲忠孝，節義，友愛之行爲，此雖起源於民族制度之血族結合，而武門政治既成，其主從關係，亦漸成非血族之結合，如義父家臣是也。「君臣魚水」，「義氣相投」等重恩義尚氣節之習，風靡全國，遂成日本民族性。世世子孫，永寶無疆，勿剪勿伐，贊諸廟堂，以貽厥後嗣，而俾爾熾昌也。中國重義輕利，以言爲大戒，歷代聖賢，拳拳致意，故男子輕財重諾，敦厲氣節，婦女以貞操自砥，茹苦甘貧，他如崇尚節儉，屏黜奢華，淳樸勤苦，堅忍勇毅，百折而不變其志等，無不與日本極相接近。惜比年以來，事事摹仿歐西，效颦削趾，惟恐勿逮，凡人之良片美意，所以爲強國富民之基者，吾得其一鱗一爪，無在不足以爲喪亡戕賊之媒，人以法律範圍爲自由，吾以破壞法律爲自由，人以利國福民爲政黨，吾以營私漁利爲政黨，取人之所長，益以舉己之所短，蓋失其天性，而擗掠攘窃以爲功，無

一可者，夫民族性者立國之大命，民族性喪失，大命垂傾，精靈泯滅，形影疎依，尤可痛者，因失民族性，方多劣弱，與人相競，輒遭失敗，不推其失敗之原因，反欲並其善良優異之特質，一舉而摧毀之，玉石俱焚，則國脈斷傷者盡矣。於是一般嗜利無厭貪鄙暴橫之徒，利用國民之弱點挾其金錢黨派勢力三利器，恣其爭權奪利之野心填彼無窮之慾壑，我國舊日國性之痕跡，遂至澌滅殆盡矣。馴至國勢糾紛，民生憔悴，大好山河，日趨於危險，果誰爲之，而誰致之哉。

民國元年，庸言報，梁任公先生著有國性篇一文，吳賁因先生曾在大中華雜誌發表說國性一文，國性之爲物，乃表示國民一時之心理，非歷代相承，成一固定之結晶體也。余亦爲「重樹東亞民族之特殊國性」一文，有云：

「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不可喪棄也，蓋國性之爲物，必涵儒數百年而長養於不識不知之間，雖有神聖奇哲，欲懸一理想而咄嗟創造之，終不克致也」。

鼎革以還，我國學者，對於中國之典章文物紀綱法度，乃至歷史上傳來之成績，無一不懷疑，無一不輕侮，甚至無一不厭棄。始則少數人耳，繼則瀰漫於全國，及其橫流所極，欲求片詞隻義，足以維繫全國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公共信條失墜，個人對個人之行爲，個人對社會之行爲，一切無復標準，雖欲強立標準，而社會制裁力無所復施，馳至共同生活之基礎，日薄以卽於消滅，宗族失其中心點，不復成爲家族；市府失其中心點，不復成市府；國家失其中心點，不復成國家；乃至社會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皆失其中心點，不復成社會，國中雖有人億兆，實則兆億之獨夫，偶集於一地域耳，向所以綱維是而團結是者，乃無有也。故一旦外界之強有力者臨之，則如摧枯拉朽，羣相帖伏，弱草依風，吹任南北，古今之亡國者，未或不如是也。吾國自義軒肇構以來，繼繼繩繩不失舊物，以迄於茲，自非有一種善美之精神，深入乎全國人之心中，而主宰之、綱維之者，其安能結集之堅強若彼，而持續之經久若此乎。夫既已有此精神，以爲國家過去繼續成立之基，即可用此精神，以爲國家將來滋長發榮之具。然不出此，一般醉心歐化之人，不惜對於舊社會之藩籬，務破壞之，摧殘之，不遺餘力，苟稍留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舊痕跡，則謂爲非二十世紀之新國民，曰腐敗，曰頑鈍。不知凡一社會必有其所公認之道德信條，由先天的遺傳與

後天的薰染，深入乎人人之腦海，而與俱化，如是，然後分子與分子之間，聯鎖鞏固，而社會之生命得以永續。一舊信條，失其效力，而別有一新信條與之代興，則社會現象，生一大變化焉。若新信條涵養未熟，廣被未周，而舊信條先已破壞，則社會泯棼之象立見。夫信條千百而搖動其一二，或未甚爲病也，若一切信條所從出之總根本，亦牽率而搖動，則社會之樞紐殆潰矣。何也？積久相傳之教義，既不足以範圍人心，於是是非無標準，善惡無定名，社會全失其制裁力，分子游離，而不相攝，現狀之險，胡可思議於斯時也，而所謂識時務者出，或睹他社會現狀之美，推原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其有彼之所謂道德者存，於是欲將彼之道德信條，移植於我以自淑，豈知信條之爲物，內發於心，而非可以假之於外，爲千萬人所共同構現，而絕非一二人所咄嗟造成，徵引外譖之新說，以欲挽內陷之人心，即云補救，爲力已微，而徒煽懷疑之謬，益增岐途之亡，甚非清本源而植基於本懷也。●

至國家不治而瀕於危矣，委心任運之徒乃咨嗟涕洟，拊膺扼腕，以爲不可救，斯真不可救乎？佛言：「三界惟心造，」西諺云：「英雄造時勢。」古語謂「人定可以勝天」。是在志士仁人發動之心如何耳！果能補苴張皇，有以陶鑄國性，而使之復興，則救國有道也。或謂物質貧乏，財政破產，子貢國性，可以及國，迂遠於及，不異於揖讓而救火，抑復可笑。不知吾國非物質上之貧，乃道德上之貧也，非財政破產，乃人材破產也。

人者仁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正人之謂也。管子曰：「赤地千里，不爲有國。愚民百萬，不爲有人。」人材破產之謂也。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過死。」故治不以禮，猶無耕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之而弗種也，夫仁義禮智，非由外譖我也，我固有之也，然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所謂陷溺其心者然也。是故樹立國性，惟正人心端學術爲急。

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尹和靖語）。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學至乎禮而而止矣，（荀子勸學篇。）殷之亡，亡於人心之肆，所謂上無道揆，而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歷史之公例，未有能逃者

也。記有之，壞國喪家亡身，必失去其禮。禮者國之干樞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降禮由禮，謂之無方之民，天下皆無方之民，則亡國不遠矣。窃觀今日之世運，而有我殷淪喪之悲，今日之人心學術，而有披髮伊川，其禮先亡之懼，此所以不憚苦口煩言，危詞聳聽，而冀當世之仁人志士，稍於此加之意也。

國家之強也，非儻以有形之武力，乃以斯民人人具宏毅剛篤艱貞之德，膠固於無形性分之中，是以見利而不趨，見害而不避，甘枯槁而不悔，蹈金革鼎鑊而無所於悚，此則立國之命脉，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當今之世，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者尊於朝，悖逆而猛勇者貴於官（貢禹傳語）。昔仲長教著數性賦，謂保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惟賴詐僞，迭相噲噲，等而下之，至於臺隸童豎，唯盜唯竊，初觀此言，似太苛酷，乃今思之，殊爲篤論。善哉管子之言也，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恥者有廉之本也，孔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之於人大矣哉，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今之貪墨驕貨者，皆不知恥者也，良知之所不能鞠，清議之所不能刼，而其心死矣。雖貢其國以肥其家，猶且不顧而爲之也，故曰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夫利之爲毒，至於如此，正人心，端學術者，所以殺其毒也，樹立國性者正爲此。荀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道爲外籬，對乎事功言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其猶爲內籬，主乎心性言之。要之欲以道德之權威，裁制功利者亦吾先民長慮却顧洞見一方，知言利之極，其禍不至於亡國不止也。

我國自漢唐以來，政教人心，交相爲勝，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名，明人務名，清至民國，名利兼務，不肯偏廢。好名勝者，氣必強，其流也機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恥。以氣勝，得志，則利害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自歐風東漸，凡經傳之所辭而闢，人倫之所諱焉而莫如深者，經一度之藻飾，辯護，遂若

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流風所被，披蕪四方，狂泉共飲，不歛反恥。故今日之人心，法以二因，而成其一果，因果既明，而後補救之術可得而言。仁義禮智，吾國相傳之國性，正人心端學術，則當於此求之。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如是其有責任也。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如是其不妄于進也。不賣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如是其不貪得也。禮義爲甲冑，忠信爲干柂，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如是其守死善道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乾健也，自強不息也，如是其開物成務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行之則在乎國民之自奮而已矣。

『日本海軍之強，與英美爭衡，陸軍之強與德國相抗，醫藥學與德國在伯仲之間，工商業壓倒英美。（原註——價廉物美，英美不如，日本貨載則倫敦紐約，加上運費及入口稅，比本地貨價猶便宜，英美所以提高關稅，用以拒絕日貨入口者以此。）東方學術之發達，（原註——漢文學，漢詩學，中國史學，中國哲學，中國美術，中國建築，等皆包括在內）遠在歐美各國以上，亦非中國所能及，愛國心，愛社會心之強，守秩序，重公益心之勇，尤非自私自利之中國國民所能夢見。……』（見五桐齡「留東通訊」——文化與教育旬刊載原文）

由此觀之，中國四千餘年之文化結晶，中國亡之，日本存之，東亞民族性之特長，日本整個可以代表，昔日之所以崇古，日本最偉大不可磨滅之精神，即東方之文化道德精神也。如將中日文化融合爲一體，確立東亞綜合之特殊「國性」，以東亞諸國國民全體之利益爲基本，強化其與聯盟之互相依存關係，可執世界文化之牛耳！爲歷史上永不磨滅之特殊功績，是亦新史頁之一新紀元也。

三、東亞聯盟，須聚精會神用全副力量，排擊歐西文化侵略。

國人倡言改革，已數十年，始則歐西之越我，僅在工商製造；繼則慕其政治法制；今且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學美術矣。其輸進歐化之速，似有足驚人者。然細考實際，則功效與速度，適成反比例。工商製造，顯而易見，惟之萬國，無甚差別。得其學理技巧，措之實用，而輸進之能事已畢。吾非謂國人於工商製造，已盡得歐西之長；然比較言之，所得為多。若政治法制，則原於民族性，闇藏奧秘，非深入者不能窺其究竟。而又以東亞西歐民族性不同，適於彼者，未必適於此，非僅特模擬而已。至於教育哲理文學美術，則原於其歷史特殊民族性者尤深且遠，窺之益難，採之益宣懷。故國人言政治法制，垂三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文學美術，號為新文化運動者，甫一啓齒，而弊端叢生，惡果立現，為有識者所詬病。惟其難也，故反易開方便之門，作偽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會謠隨，競時倣仰，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且工於自飾，巧為言語奔走，頗為一般幼稚與流俗之民眾所趨從。於是邪說橫出，萬徑千蹊，莫知所適。故言德化者，不出於奇，則出於迂，膠柱鼓瑟，違反治理；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謔謔跳浪，騁怪鬥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暇，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於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其昌言進化，大同，自由，平等者，則又吐棄一切，觀舊日遺規若仇敵，復無新規範以為灌注。於是講進化則成過激，講大同則為無主，講自由則浪漫成性，講平等則父子夫漫婦無禮制。四海之內，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杜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鉉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外沽仁義忠誠之名，而內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讒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許令私，而物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爲之疾惡；如賢忌能，而獨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於是軍閥汚吏貪官劣紳之流，藉民本爲口禪，巧取豪奪，摧殘民命者，比比皆是，共產黨乃乘機而起，倡階級鬥爭，不求適否「兩性」，依樣模仿潮流。不謀人類之公益，徒便一己之私情，視道德爲迂談，委賢材於草莽，相陵相賊。

，相爭以利，即一家骨肉之親，難免無爾勝我負之意，而况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哉。藩籬洞撤，推波助瀾，遷流所極，不至率天下之人而入於禽獸之域不止。則無怪乎，不顧唇齒之誼，同文同種之義，兵刃相見，三年不止，紛紛籍籍，戰禍瀰瀰東亞也。（見余箸「東亞之道德精神」與「新民運動之道德觀」）

東西文化，根本不同，故民族性，亦懸然兩殊。削足適履，無益反損，移橘化枳，其性必異。西洋文化之發生，當然有西洋歷史之背景。按西洋思想史，自希臘至今，二千數百年，一綫相承，其間雖不無盛衰之分，要未間斷也。自培根主張控御自然，征服天行，始謂文化之可貴，非使此人，高於彼人，乃在利用自然力，改造社會，增進人生之幸福。此種觀念，不僅一洗中世聽天由命之思想，並能使人人增高自信力，謂人定可以勝天，不再愁自然之逼害，而有樂觀之心意。熟意今日數十生的之大砲，能轟山而成平地，望而生嘆之海洋，能互相超越飛擊，此皆其所表現之權力所得之成績也。讀其所著新大西洋（New Atlantic）一書，又生科學萬能之觀念。於此吾人所宜知者，即「知識」乃「權力」，然其力能致「善」，亦能致「惡」。自然科學，固宜儘量發達，要必有倫理等科學，與之同時開展，庶幾有所規範，而人生幸福可日進無疆；否則器械之發明，適爲戕害人民之工具，進化云乎哉？西洋人無論何事，皆言「實利」（Utility）求其足以利用厚生。惟其偏注「實利」，故發生競爭，有競爭，即成戰爭，戰爭既已，醞爲劫運，人爲求「生」而得「死」，人爲求「福」而得「禍」，又豈復明者所預料耶？

金子馬治（早稻田哲學教授）講演「東西文明之比較」謂：「西洋文明爲勢能（Power）之文明」英國史學家巴克爾（Buckle）謂：「歐洲地理之形勢，適於人之控制天然，此乃歐洲文明發展之主因。」故彼所謂「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固人類進化之公例也。然而所謂進化者，於人類爲禍爲福，固無確論，抑如何而謂之進化？尤難得一澈底之解釋。蓋自石器時代，迄於火器發明，近則機器之用，愈趨愈巧，上之飛行於天空，下之潛游於海底，奇技精器，日新月異，神工鬼斧，未足以喻其奇，科學進步，於斯爲盛矣。雖然謂科學萬能可也，謂今之科學已達萬能之地位則未也。況乎人類進化云者，標準爲何？如曰機器發明，可爲進化之證；然人類受機器之益極少，而爲期甚暫，受機器之害至速而烈，且普及於人人。即就生理化進言，上古穴居巢處，而體質可以抗風雨；自有宮室而寒暑之疾益多；上

古茹毛飲血，而康健壽考；自有火化，而胃腸之病漸起。由此觀之，謂人類進化可也，謂人類退化亦可也。達爾文所著物種由來論，謂人類遠祖實爲猿屬，夫自太古原人時代以迄今日，生活由簡單而複雜，組織由荒陋而完備，此誠人類進化之表徵；然相爭相殺，弱肉強食如故也。彼未開化之人類，稱曰牛畜野蠻，謂其去原人近也。今之號稱文明國者，殺人之術，日求其精；殺人之數，日求其多；故一彈之力，足以殺千百人，以視木石弓矢之遲鈍，進化誠進化矣，然殘忍極酷，獸性未改如故也。所謂進化云者，果安在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又安在哉，生物進化，由獸而人，故名曰人類，不特獨具獸性，且日謀殺達而擴充之，自其形式言，是曰進化，按之實際，殊有大不然者。嘗聞獵者之言曰：「貂鼠性仁慈，獵者恒裸其胸背，伏臥草上，貂鼠憐人之寒也，就而暖之，被被捕。」由此觀之，獸苟具有人性，而人並獸且不如矣。然則人退化歟，獸進化歟？以此種進化論，傳諸世界，世界亡無日矣。（見盧信著我之覺悟篇）

更有所謂公理云者，吾人不幸，生於東方積弱之國，外則強隣虎視，內則豺狼當道，水深火熱之中，刀鋸鼎鑊之下，生民憔悴，夫有甚於此時者也。然蚩蚩者，力不足自拔，勇不能奮鬥，當呻吟無告，希望俱窮之時，所聊以自慰者，惟篤信世界公理之伸張也。及事實証之，不過「武裝和平」，「赤血黑鐵」耳，此等言論，乃公理廢滅之明證，強權伸張之假面也。

更有所謂革命云者，此不外新舊之爭，且含有推翻現在希望進步之意。然新舊進化，皆唇亡齒寒，並無一定之標準。今日以爲新者，即他日所指爲舊，今日所謂進化，他日必別有進化之途在。故必採去故取新改革圖進之義，則人類一日存在，即一切事物，皆日日在革命之中，而無有止境。兩人倡民權之說，於是政治革命之運動，紛擾者達百餘年，歐戰發生以後，如俄、德、奧、匈、葡萄牙、希臘，土耳其諸國之君主，皆放逐無遺，此可謂政治革命之極盛時代矣。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政治革命尙未達圓滿之地位，而社會革命又已風起雲湧，從過去歷史以觀察未來趨勢，吾恐社會革命之運動，其紛擾又必百數十年，顧至社會革命極盛之時，人類之不滿足爲故，而他種革命，又必繼社會革命而起矣。其作用似爲新陳代謝，陳者既謝，代之以新，而陳謝之後，新者又陳，爲此循環，

永遠不息，革命何時已乎？

中國自有明徐光啓翻譯幾何原本，李之藻翻譯談天，所謂西洋文化，漸次東遷，然以注重理智，並未衝突。直至前清咸同間，輸入火炮，鐵甲，聲光化電，始知採用其所長。曾文正李文忠等創辦上海製造局，並在北洋練海軍，馬尾辦船政，及至光緒末年，一時名臣奏議，通人著譯，書院文課，考試圖墨，以及時務書等，均以西洋物質文明為藍本。此時並無留意西洋文化之來源。將其枝節產生之物質文明，全盤移至，期以強國。西洋物質文明，似種瓜也。吾人以為將蔓截斷，即可搬來移植豆上。不知其根，乃不能移者，強移之，彼瓜不但不能成熟，勢必夭折，反將毀吾豆苗矣。移瓜接豆，猶緣木求魚非不為也，勢不能也。及至甲午之役，海軍全體覆沒，始知其瓜有根在焉。乃提倡廢科舉，興學校，建鐵路，辦實業，自戊戌變法，繼之以庚子事變，逐漸著意政治制度，以為西洋文化之根本，在立憲制度與代議制度，於是有立憲論與革命論之爭辯。此猶生而眇者不識「日」，狀日如盤，扣槃而得其聲，聞鍾以為「日」也。日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揣籥以為「日」也。差之絲毫，謬之千里，愈趨愈遠，而眇者不知其異也。立憲派請求開國會設諮詢局，預備立憲；革命派主張革命，推翻君主，直至辛亥之役，清帝退位，改建民國，可謂完全實現西洋政治制度之形態矣。此非少數黨人之力而全國人心思治之結果也。望治之心與日俱長，然而人愈望治，而世愈不治，愈趨愈下，至五四運動時，方知改革政治，仍為枝葉，非根本也。新文化運動者，乃拋開枝葉，求根本解決。知根本問題，在人生哲學與倫理思想，即「國性」也。此種覺悟，却為中國復興之關鍵，已找到着處。如李守常先生之「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一文中：

「苟不將靜止的精神根本的掃蕩，或將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絕，長此沈延，在此矛盾現象中以為生活，其結果必歸於自殺。蓋以半死不活之人駕飛行艇，使發昏帶醉之人御摩托車，人固死於艇車之下，車亦毀於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譁唯諾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世一系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阨阻不寧，此種政治之妙用，亦必毀於若而國中，總之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於粉碎，世間最可怖之事，莫過於

斯矣。」

此時如果澈底了解東亞文化之不能並立，無可通融，即宜澈底解決，勿使東亞民族之特殊「國性」受其損失。如果了解東亞民族之特殊「國性」乃受西洋文化之壓迫，不能伸展，即宜積極振興，澈底奮鬥，打開一條生路，勿發呆夢想，以致傾覆。無奈一般醉生夢死之徒，如弱草依風，吹南而南，吹北而北，東亦好西亦好，猶疑彷徨，模稜兩可。或者調和融通，另開一面。所以男女平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合曆，你陽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此種迷離含混，痕綴糊塗之意象，足使亡國有餘也。何況紀綱紊亂，兵匪橫行，民不聊生，於斯爲極。一溯辛亥以前之狀況，如白髮宮人談天寶故事，令人悲從中來，不堪回首矣。故亡清遺老，蒿目時艱，每一論及，必謂推翻清室之革命黨，其罪直上通於天！革命所得之結果如此，又豈初心之所及料？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陳獨秀乃大聲疾呼，轟轟然曰：「澈底革命！」對於東方文化，排斥攻擊，不遺餘力。其「吾人最後之覺悟」文中：

「倘吾人以中國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組織吾之國家，支配吾之社會，使適於今日世界之生存，則凡十餘年來之變法維新、流血革命、設國會、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無一非多事，應悉廢罷。萬一欲建設新國家新社會，則對於此新國家新社會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澈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一夫狂呼，亂者四應，「國性」重心動搖，其危不堪設想。西洋之瓜未種，東亞之豆全枯，彼眇者不識「日」，尙不至指其唾，其矢皆云「日」也。何非眇者，竟指「日」曰唾曰矢哉！是誠何心，余不得而知也。此後我國之社會，乃成一黑卑污穢亂衰頽之社會，上自國政，下及民生，無分公家事業，及私人行爲，映於目間於耳者，無不令人震驚迷惘，失望傷懷。此種現象，既無減於數十年前，然則此數十年間之一切活動，不論激隨大小，南北京市，其無益於國也可知。

此時歐洲民族，只知注重物質上之享用，各爲極端權利之主張，第一次大戰爭奪擾亂之結果，仍無法以善其後，對西方固有之文化，發生反感，當山窮水盡之際，大有返還樸醇之趨勢，故對於東方文化發生羨慕，所以當梁任

公先生遊歐時，西人謂之曰：「西方文化已竟破產，正需要中國文化來援救吾輩，君何苦至此求藥乎？」（見歐遊心影錄）先生曾列舉孔子之「不患寡而患不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以及墨子之「兼愛」等等，西人均歎服欽佩，以爲東亞文化至可寶貴。東方文化果爲何物乎？杜威謂「西方人征服自然，東方人與自然融洽」。北哈吉氏「東西文化之融合」謂：「西洋文化，不能融和其自我於自然之中，以與自然共相游樂」。又謂：「凡東洋諸民族皆有一共同與西洋民族不同之點，即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與自然融合與自然游樂是也」。又謂：「東西文化之差別，可云一爲積極的，一爲消極的。」又謂「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爲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與自然融合，對於所與之境遇之滿足，爲東洋人優游之境地。」又謂：「吾人一面努力於境遇之制服與改造；一面亦須……於自己精神之修養。單向前者以爲努力，則人類將成一勞動機關；僅以後者爲能事，則亦不能自立於生存競爭之場中。」李守常謂：「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由此觀之，東西民族之特性，顯然立於極端相反之地位。一爲自然，一爲人爲；一爲順，一爲逆；一爲愛，一爲妬；一爲和平，一爲鬥爭；一爲安息，一爲戰爭；一爲消極，一爲積極；一爲收斂，一爲開拓；一爲鬆散，一爲緊張；一爲隱忍，一爲誇大；一爲謙退，一爲放縱；一爲依賴，一爲獨立；一爲苟安，一爲突進；一爲因襲，一爲創造；一爲保守，一爲進步；一爲直覺，一爲理智；一爲空想，一爲體驗；一爲藝術，一爲科學；一爲精神，一爲物質；一爲靈的，一爲肉的；一爲向天，一爲立地；一爲自然支配人間，一爲人間征服自然；一爲安詳，一爲活潑；一爲涵容，一爲急燥；一爲澄然，一爲斬然；一爲得意淡然，一爲得意傲然；一爲失意泰然，一爲失意憤然；一情一欲；一沈一浮，一寬一褊，一緩一急，一逸一盛，一超一滿，一含一露，一耐一煩，一閒一擾，一淡一濃，一降服一忿怒，一和氣一乖冷，一正氣一妖氣，一浩氣一疑畏，一圓一方，一謹一肆，一儉一奢，一撲一華，一茲一暴，一廉一貪，一公一私，一溫柔一剛烈，一沈潛一淺露，一渾厚一谿刻，一怯一勇，一悔一矜，一主觀，一客觀；一唯心，一唯物；因主觀，則蔑視客觀，準程規矩，而重崇尙天才，乃藝術之精神；因客觀，則共認確實之知識，乃科學之精神。在東方科學亦爲藝術化；在西方藝術亦爲科學化。東方則爲藝術式之成就，西方乃成就於科學之上。東方政治尙人治，西方政治尙法治。西方講

學說理，步步踏實，於論理一毫不苟；東方講學說理，神乎其技，在領會不可言傳。西方主邏輯，東方主立學。因主邏輯，故有固定之現象；因主立學，則為「一而變化，變化而一」之本體。故東方人所用「有所指而無定實」之觀念為立學態度。西方人所用之觀念，必「明白而確定」，為科學方法。中國俗語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民，苟一息尚存，必資本地水土飲食以維持其生命，及飲食失宜（即水土不服）則腸胃壅滯而疾作矣。善醫者，必對症。下劑以藥之滋蕩宣暢之後，方有神清氣爽之感，此醫生下劑之效也。治國獨不然乎，東方哲學，政治制度，社會習慣，學術文藝以及起居，物質生活，與西均異，處斯矛盾環境，如困居牢獄之中，或陷於壓迫殘虐之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醫者如祇能救其一死，而未能解除其痛苦，是救人等於不救耳。故欲解決東亞問題，必從根本上探討，以澈底解決之，否則無濟於事。

救人之急，濟人之危，人有痛苦，我為解除之；人遇強暴，我為勦抑之，此東亞民族之共同性也。如馮驥焚券，漢士解衣，墨氏塵頂放踵以利天下，孟子被髮縑冠以救鄉鄰，乃至樊將軍之借頭，高漸離之擊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迄今讀之猶有生氣。漢時朱家郭解之流，以俠義著於鄉里，其人其事，雖為禁令所不許，而略述原情，自有足多者在。推斯「性」也，在社會而屈己伸羣，在國家而成仁取義，與日本之武士道大和魂非出一轍乎？

東亞聯盟，於根本的文化道德上觀之，係以與中國儒家之聖道一致之日本王道皇道為基礎，聚精會神用全副力量，排擣歐西文化侵界。東亞聯盟之建設，係以解放東亞諸民族，而統一東亞諸民族為唯一目的。於東方文化之基礎上，不妨融合創造成之新的東洋文化理論。於聯盟各國家之政治上係遵從已經自覺之民眾之理性與良心，對於此種民眾之理性與良心之最高價值，信賴之而服從之，使內治與外治之對立觀念，綜之合，統一之，使東方的理論主義之理念，必以東方民族之覺悟與結合為前提。斯「八絃一字」之理想則實現無疑矣。

四、結論

日本渡部萬藏先生著未來世界論有言曰：世界之大勢，天地之理法也。一代之時勢，人運之活機也。據天地之理法，揆人運之活機，以闡明國家之天職，以開拓國民之理想，是之謂政治之真諦，是之謂經世之大本。

和平者，宇內之極運也。文明者，人世之動機也。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人類之治亂興廢變遷消長，雖不遑輒述，而世界之大勢，自滔滔以歸於統一，社會之真機，自徐徐以抵於和平，惟方其進也，有正動，有反動，一進一退，一昇一降，參差錯綜，變化無窮，一若周而復始，郅治終不可幾者，不知迂迴屈曲者其勢，而一以貫之者其理，世界一日不統一，即世界一日不和平，即人類一日不安全；故使世界統一，實國家最大之事業，使世界和平，實人類最高之理想。竊嘗譬之，大勢如江水之入海，浩浩蕩蕩，不注於海不止，時勢如波濤，如鴻流，多方作懸，終必隨大勢而前進，蓋大勢者理法也，時勢者，人運也，理法亘古今，通東西，確乎不拔，人運應時而異，變化無極，大勢經也，始終一貫，時勢繩也，遷流無定，大勢道也，天理也，時勢權也，人力也，道與權實經緯人世之二大動力也。然則立國於今日者，宜如何鑑世界之大勢，應現代之時勢，以盡天職乎？請寬胸襟，默察宇宙之至理，請廣眼界，博考運會之推移，來日雖多，安可不及早計之。而我東亞民族多奔走名利之私人，少獻身種族之公人，有詭計縱橫之策士，無先憂後樂之國材，民昧理想，國昧天職，舉世混濁，內治外交兩大端，且無應時制宜之緯權，奚論悠久不變之經道乎？時事日非，頽波滔滔，苟非實心爲建設東亞而革新者，亦在樹國性，中日前途，均岌岌乎其危哉？

夫英蘇皆我東亞之仇敵也。一則以經濟資產，欲握世界之商權，爲國民至大之目的，一則以社會革命擬掌世界之霸權，爲國際最毒之方針，一切戰爭，均由此出。苟無屹然兩大之間，赫然出一頭地，殆無有能與鼎立爲三者矣。使我東亞，合中日民族之理想，統一其意志，以公明正大之文化，樹悠遠高潔之「國性」，其版圖，其財力，其人數，其智謀，皆可凌駕其上，則在世界之勢力，又豈英蘇所能望其項背乎！不所謂實心爲建設東亞而革新者，亦在

希冀我兩國之民，使有如此理想，見諸施行，均知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嗚呼！兄弟之鬪牆，手足之相殘，譽齒之不顧，骨肉之難全，亦由此無高尚之理想，以爲民族之基礎耳。故渡部萬藏先生又言曰：「國民之理想者，國家之天職也，抑亦生命也。元氣淋漓，山可拔，海可翻，上之可以張綱紀，下之可以阜民生，內治外交之法，猶其小者焉耳。是故曰闡明國家之天職，開拓國民之理想，乃政治之真諦，經世之大本也。」

天理與人心相感應，蓄而爲德，發而爲智，以德爲內容，以智爲外形，東亞聯盟之基礎以定，文明之源泉以成，其潮流之雄壯，漫無涯涘，汎濫東亞，浩浩蕩蕩，有駭魂奪目之觀，數千年於茲矣。就伊藤松貞一所輯「聯交徵書」觀之，由詩文部所載，卽知自古如一國，無敵視之心情。如唐之玄宗「送日本使」，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諸光義「洛中貽朝校書衡」，包佶「幼正」「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趙驛「雲鄉」「送晁補闕歸日本國」，李白「哭晁卿衡」，劉禹錫「夢得」「贈日本僧智藏」高鶴林「因使日本願謁鑒真和尚，旣滅度不覲尊顏，嗟而述懷」，吳頤「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國」，他如孟孔「台州錄事參軍」毛渙「台州臨縣令」崔寥「鄉貢進士」全濟時「廣文館進士」行滿「天台沙門」許爾「天台歸真弟子」幻夢「天台僧」林景「前國子監明經」馬總「會元」胡伯崇「毘陵子」朱千乘「前試衛尉寺丞」朱少瑞「越府鄉直進士」晏靖「沙門」鴻漸「沙門」鄭王「申甫」樓白，張籍「文昌」許棠「文化」沈頌，張喬，無可，曹松，「夢徵」齊亡，貫休「德隱」司空圖「表聖」韋莊「端已」等皆有詩文贈答，親如家人。宋之歐陽修「日本刀歌」王洙「贈日本國僧」，竇從周，鍾唐傑「送僧還日本」，勾令玄「拜瓦屋塔」，師範「天神」懷敵「與榮西」，道暉「送圓爾上人歸日本」，紹曇「希叟」「送日本爾侍者」，大觀「物初」「和靜照詩韻」，他如曾度「虛舟」曾濟「時翁」妙弘「載流」智愚「虛堂」惟俊，道東，慧開「無門」丁惠，行葦「石林」心月「石溪」蘇轍「子由」姜世昌，楊億「大年」等，亦有詩文贈答，親如家人。

元之陳深「子微」「送畊存大參使日本」成廷珪「原常」「送秀巖山人歸日本」他如鄒思肖，釋恩「斷江」虞集「伯生」道原「宗衍」梵琦，智及「愚庵」鏡堂，清茂「古林」元長「千巖」德輝「東陽」宗廓「拙逸」王印，德真「龍巖」薩都刺「天鋐」等，均有文可考。

明之宗泐「送祖闡克勤二師使日本」，太祖「和宗泐韻」，「和絕海韻」宋濂「恭跋御製詩後」，「賦日東曲十首」，他

如道彝（天倫）一庵，張羽（來儀）林鴻（子羽）惠鑑（仲銘）張以寧，道彝，立理，來復，清海（蘭江）陸仁，旭元明，智及（愚庵）唯實，盧希玉，楊端夫，方梅崖（伯行）王恭（安中）祝允明（希哲）唐寅（伯虎）金湜（本清）徐璉（希賢）詹侃，張式之，洪恕，唐順之（荆川）王穉登（百穀）李攀龍（于麟）皇甫汸（子循）王志堅（淑士）許儀俊等，亦均有獻足徵。至清之恭尹（元孝）梁佩蘭，沈德潛（碣士）邱璋，鄭彩，毛奇齡（大可）陳應麟（昌錫）梁處素，尤侗（悔菴）民國以來無數傑出者，（余所著近代二十家評傳中，多與日本有關係）孰非不以家國視之哉。

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教無類之說，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夫東亞一家，人同黃種，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分，隋以前佛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於中國人統謂之曰蒙古，蘇聯語言呼中國人曰契丹，是爲亞洲同種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適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遠古以來，稱爲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微，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文成虛，積虛成弱，歐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鬥力競巧，各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強，獨我中國士夫庶民，懵然罔覺，此張文襄公所以引爲至憂也。興學三十年，夥發憲圖強，求紓國難，而昏墨之人，仍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於其心，猶是乘此阽危，恣爲貪饕，尙待合西，爲西商，從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說，仍試中國爲不足有爲，譏教聖爲無用，分同室爲畛域，引彼法爲同調，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其喪心病狂之態度，且甚於三十年前，張公泉下有知，不識作何感想也。

張公有言，欲強中國，如不以中學固其根基，端其識趣，則強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此言果驗矣。昔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大抵一國之利害安危，本國之人，蔽於習俗，不能盡知，知而不敢言，今日當痛定思痛，不宜諱疾滅身矣。國有可變與不可變者，可變者法制，器械，工藝，不可變者倫紀，聖道，心術；前者爲末，後者爲本，本立則國興焉，本不立則國亡焉。東亞民族，內恕而外仁，中之所謂「聖」，日之所謂「王」，惟其恕，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惟其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本聖道

，重樹恕性，日本王道，重樹仁性。歸之於學，則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歸之於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此孔子集千聖，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之真精神也。此種精神，爲東亞之本，不可不一。此外爲法，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立本必通經，通經以明先聖先師立教之旨，立本必考史，考史以識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然後涉獵子集，以通學術文章，再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此乃張文襄公所謂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徵之經，有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義也。器非求舊惟新，尚審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爲大，禮義也。溫故而知新，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義也。時措之宜，中庸義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將因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即所謂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者，不可不一。我東亞苟本斯道以聯盟，乃爲東西兩文明匯萃之所矣。他日文化益進，民德日新，本天地之理法，準人間之本性，守道明德，明善復初，則天下大同之理想，可以實現，彼西歐之自利自私殘忍嫉妒欺僞之進化，不過過渡時代之一現象耳！余故曰：東亞聯盟，當以文化爲軸，軸一而定；文化爲民族之輪，輪歧而動，文化爲進步之動機，道德爲文化之基礎。天理由此表章，人機以之弛張東亞聯盟後，中日文明，合而爲一，國防之擔任，經濟建設之指導，自然成爲東亞聯盟諸國結合之精神的核心，其他產業計劃，貿易計劃，交通計劃，及其他重要經濟計劃之創立，與其實施事項，均因東亞聯盟之誕生，迎刃而解之也，東亞諸國家，勿因意氣不和而爭，勿因尺寸之地而鬥，不欲屈服於歐美帝國主義之蹂躪，請奮然而揭東亞聯盟之旗幟!!!



東亞聯盟與教育

何惺常

東亞聯盟，已由理論的時期，進而為實行的時期了。

我們為着東亞民族的解放，為着東亞生命的更新，東亞聯盟，決不是偶然產生的一個名詞，而將為歷史上確定的事實。我們生存在這個「昨日與明日」的交替時代，怎樣負起此歷史上給予的使命？已不單是責任問題，方針問題，還有的是方法問題。

誰也知道歷史的構成，不論在時間方面，空間方面，都要經過一般人為的力量，這種力量，決不是靠着少數人便可成功，還要靠着現在及未來的一般人的支持，才能堅實，才能久遠，這是不變的定律。

現在，東亞聯盟，已由中日兩國先覺之士，創立起來了，此種具有歷史性之偉大事業，固非短少時間可以促其成功，尤非少數人力可以求其實現，自然仍有待於

整個東亞民族的不斷協作努力，我們是站在民族前頭，怎樣把這個思想普遍灌輸到整個民族？使發出整個的力量，這是我們眼前最要研究的一個問題。

汪先生電裡有這一段說：「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隣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隣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與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我們把汪先生以上的話，細繹一下，就可以知道中日兩國永久和平的基礎，必須建築在整個民族的上頭，但怎樣樹立這個基礎？唯一就是教育，因此可以說東亞聯盟是我們必要貫澈的目的，而教育就是貫澈這個目的

的手段，東亞聯盟與教育，是具有絕大的聯繫作用，可無疑義了。

現在我們的目的確定了，不過怎樣運用手段？換言之，即怎樣實施合理化的教育？這是我們急要解決的當前問題。

中日兩國，本來唇齒相依，同種同文，而過去竟發生極端矛盾之現象，探其原因，與教育實有絕大之關係，我國從前每利用兩國間一時的糾紛，認為絕好的教育材料，煽動鼓舞，使此種不愉快印象，深深刻上一般青年的腦根，牢不可拔，祇看目前，完全不在高遠處着想，導民族意識於不正軌道，此錯誤者一。

共產主義是含有毒素的麻醉劑，共產黨人是最殘酷的惡魔，渝府竟盲目的加以容宥，甘於受其利用，使此輩借着機會，不但在軍事方面，發展其野心，更在文化界方面，發展其慾念，一般青年，智識薄弱，感情最易衝動，陷迷網而不覺，渲染日深，益難自拔，置青年於險地，此錯誤者二。

以上兩種錯誤，不但影響中國，而且影響及整個東亞，實有嚴格糾正的必要，怎樣的糾正？仍非從教育着手不可，這不過從消極方面來說，至於積極方面，還需

要確定教育方針及實施方法。

一國的教育方針，與一國的確定政策，應該相輔而行，這是不易的法則，假如教育離開了國策，此種教育便沒有意義，我國現在以和平建國為一定國策，以復興東亞為最高理想，故國民政府成立後，即把教育方針，明白規定，內容是：「以和平反共建國為教育方針，且圖科學教育之向上，一掃舉動浮虛之學風」。這就是今後建設中國的教育方針，唯一的用意，是令政策與教育有直接緊密的聯繫，使成為一種有力的推進。

教育的方針是這樣的確定了，怎樣實施？使貫澈這方針，這是一個方法問題，雖然有很好的方針，假如沒有完善實施方法，不論在時間上，效率上，都發生極大的影響，這是必然的。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考慮的，就是實施的方法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有下列幾點意見：

第一、一般教育人員，對於復興中國和復興東亞的政策，應該要有充分的瞭解，充分的熱情，然後才可以發生最大的原動力，沒有健全的原動力，儘管有什麼的良善方法，也屬枉然，現當轉變的時期，故對於目前一般教育人員，更抱有無限之期待？

第二、我國以前的教育方針，既屬謬誤，所以各種課本，多不適應環境，實有急速改善之必要，不但各種課本需要改善，即其他書籍，凡有與現在教育方針違背者，亦要重新訂定，以符合新時代之需求，而收一貫之效。

第三，課本不過是教育的一種工具，除了此種工具以外，還須加以精神的訓線，故今後對於學校裡的各種集會，應該隨時灌輸以在不違背國策原則下的思想，使對新時代有深刻之認識。

第四、以上是關於學校教育方面，至於社會，尤當注意，因為它是普及民衆的，深入民衆的，雖屬一種小的設施，但所發生的力量已甚大，故對於一般民衆的結集場所，不論在文字宣傳，口語宣傳，或畫片宣傳，

都要具有顯淺而又富於刺激性的材料，使深入其腦海，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五、中日兩國，同屬東亞之一環，已實行聯盟了，對於以往隔膜，自然要徹底的掃除，然欲徹底掃除，就非先溝通兩國的文化不可，假如文化能夠溝通，兩國民族，不但沒有隔膜，更易發生感情，然最要的條件，是仍對於相互間的文字，有清楚的認識，此為我們所應當注意者。

以上幾點，雖屬簡單，未臻完備，然亦為我們所不可忘者，總之，東亞聯盟如欲得真正的實現，必須從心理建設，思想建設着手，而教育即為此中的唯一手段，怎樣運用這個手段？這就是我們應該努力的重點了。

國家民族的生命是無窮的，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個人以有限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一代一代新陳代謝，接續不斷，以成爲國家民族無窮無盡的生命，所以國家民族的進步，其關係在於個人之思想能力，一代勝似一代，國家民族之前途，寄託於青年，其意義即在於此。

——節錄 汪主席告青年書——



東亞共榮圈與日本

田中香苗著
姚英譯

東亞共榮圈與日本

一、世界情勢之急轉與東亞

一、歐洲東亞二大新秩序運動與世界四大集團化

三、滿洲事變與東亞共榮圈之關係

二、有田聲明與大地域主義和平圈之主張

四、中國事變與東亞共榮圈問題

二、東亞共榮圈與關係各問題

一、生命線生命圈共榮圈

三、荷印法印之資源

二、東亞共榮圈

四、荷印法印與日本新關係及南進政策諸問題

三、中國事變之處理

一、東亞共榮圈問題與處理中國事變

三、新中國之間題

二、事變處理之現階段

四、外交攻勢

四、轉換期中之日本外交

一、中國事變之處理與外交

三、東亞共榮圈與蘇聯及德意之關係

二、東亞共榮圈問題與對英美關係

在今日大變革過程中，日本當前的中國事變及確立東亞共榮圈問題，應如何進行呢？

一、世界情勢之急轉與東亞

一、歐洲、東亞二大新秩序運動與世界四大集團化德意志以希特勒外交勝利為背景，展開電擊戰術，粉碎了英美支

配世界的舊秩序，推進世界新秩序的大勢。

在德國發動軍事之先七年，日本以滿州事變及中國事變，作為東亞新秩序的開端，負起世界新秩序現實的發起者的光榮任務。以德意為中心的歐洲新秩序運動，與東亞新秩序運動，是相似方向的。歐洲支配世界的地位，是以歐洲新秩序為世界新秩序的動力，同樣的歐洲勢力是含着許多支配東亞的要素；所以日本的東亞新秩序運動，成為世界新秩序之另一動力。然而歐洲與東亞二種新秩序運動，均以粉碎英美利己的世界支配為出發點，二種新秩序運動，均以各該運動的反英美性的勝利而推進其勢力。德國電擊作戰現階段的成功，使英國轉落其世界地位。英國自其在歐洲的與國及其前衛國家完全投入德國陣營後，世界支配力為之中斷，英本土的運命隨之緊張，而東方亞面所，以阻礙日本前進的英國勢力，也就如退潮般潰退了。至法國在中國及其周圍的勢力，因本國之對德降服，不單是減低了本國以外的勢力，且以其性格之變化，東亞方面已不為日本的妨礙。荷蘭殖民地的荷屬東印度，同樣的不能強調反日的性格反而不得不轉過對日親善的傾向。

以上現實，打破了英國的世界支配網。又因為英美的世界支配，就是世界舊秩序的內容的緣故，東西二大新秩序運動，就不能不因其衝突關係而含着反英美的性格，結果使德國世界性的歐洲新秩序運動，有利於日本的東亞新秩序運動；而日本的東亞新秩序運動，也給德國歐洲新秩序運動甚大助力。同時英國所受的打擊，與美國世界地位以深刻的影响；對於日德中心的東亞歐洲新秩序，及其發展的世界新秩序，以唯一最大牽制力自負的美國，其傾向就漸成爲日德兩國共同之敵，而美國之動向，遂爲日德兩國聯携強化決定的要素。

日德兩國的東亞，歐洲新秩序運動，以構成歐洲集團與東亞集團爲基礎，此二集團運動引起了其他二集團運動——在歐亞兩集團中間，屬於蘇聯支配下爲一集團，南北美州在美州支配下爲一集團——世界遂以四大集團化爲世界新秩序運動的基礎。然而歐洲集團爲欲支配美州的緣故，預將美州包括在內，成爲德意中心的大歐美集團。東亞集團則以中日滿三國的連環互助，包括了法印荷印等西南太平洋與亞洲東大陸的範圍。蘇聯集團，則以芬蘭之分割，波羅的海諸國之合併，巴爾幹近東之進出，其範圍殆有自東歐及北冰洋擴大至於印度洋之趨勢。美州集團，則在

況美會議上以美國支配美洲爲目標，激急構成了驅逐德意勢力退出神州的戰線。此四集團除神州集團外，其他三大集團，無論直接間接，程度強弱，相等的抱着反英的性格，以完成其集團運動而展開其新秩序建設。且也，此四大集團，不單是含着反英性，其內包地域問題，顯著地將與英國衝突而加以分割。即此可以決定了英勢力之衰落了。至於四大集團之建設世界新秩序，應以地域主義，與其他地域共存共榮，作和平之建設；然而現實上，爲確保各該集團的自衛性，而進行對其他集團之攻擊，蘇聯及神州集團運動，即含有此種性質。此種性質，在集團運動進行中的過渡時間，無法消除，非有高度的人類和平手段，以集團的大地域主義，與其他大地域謀共存共榮不可。否則世界之集團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變相的英國交替暴力而已。與彼得大帝拿破崙等有何差異。在中國事變及此次歐戰當中，所產生的世界集團的性格，應以大地域主義維持永久和平爲目標的。其意義僅使英帝國集團分散投入於四大集團，才是人類進步的大道。

二、有田聲明與大地域主義和平圈的主張 日本鑒於世界四大集團化的必然趨勢，期望將由世界再組織當中確立永久的和平與繁榮的世界新秩序，遂發起作大地域主義和平建設的提案者，於是有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有田外相聲明。聲明播送之後，博得世界人士之好評，此種主張實爲最公正不過的。該聲明爲日本東亞自主宣言，同時爲世界和平的歷史性的提案，其意義至爲重大，茲將原文敘述於左：

國際情勢與日本立場（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有田外相播送）

我國（日本下同）立國以來之理想，既在萬邦各得其所，我外交方針，亦基於此理想。基是故，曾不辭與敵人以國運爲賭，而與之戰爭。世界和平，乃人類所共仰。世界和平而萬邦未各得其所，則和平難以永久，自不待言。世界和平之確立，在人類進步的現階段上，不無遺憾。實現此大理想，非一舉可得完成，應由地理上種族上文化上經濟上有密切關係之各國，作成共存共榮的分野，先在其範圍內確立和平與秩序，同時在分野與分野間，樹立共存共榮的關係，此爲當然之理。然人類鬥爭之原因，每不盡循如此自然的建設體制，或不糾正過去之不合理不公正之處，此乃世界在過去與現在所得之經驗，此次歐戰，更爲明澈。故爲確立永久的國際和平，應以最大努力

，改正如此錯誤，日本向建設東亞新秩序途上邁進者，實賴有以上之精神。日本對收拾中國事變之態度，迭經聲明，善鄰友好，共存共榮，然現有某國家未能理解日本之對於再建東亞之大業，反而援助渝方政府，誠為遺憾。日本迭次促其返省，現復促其醒悟，同時決盡所有手段，以斷絕援蔣行爲。世人往往不問理由如何，否認以武力打開現狀，日本在過去三年間進兵中國，實為致力和平，而不得不發動大量之武力，此外別無他意。東亞諸國與南洋各地，在地理上、歷史上、民族上、經濟上均有極密切之關係，彼此互助，以資共存共榮，此乃有增進和平與繁榮之自然運命，故包括此等地域而發生共存關係之一切，吾人以為圖其安定，乃當然之歸結。由建設局部公正之和平，而推廣至世界，確立全面公正之和平，此點即在歐美諸國亦曾考慮及此，這種思想之內容，係在各個分野勢力安定後，以其勢力為中心，在其分野內確立各民族之共存共榮與安定，同時各分野應互相尊重其他分野之特有政治，文化，經濟，有無相通，互不相犯。此次歐洲戰爭爆發，日本政府即聲明不加入之方針，此乃日方不欲戰禍之波及東亞，而決不參戰。日本政府頗期望歐美諸國，勿以險惡之影響波及東亞之安定，目下日本，正向建設新東亞之途邁進；同時對於歐戰趨勢，能否波及南洋東亞各地帶，施以深刻的注意。日本為負有安定東亞勢力之使命與責任，對於此等地方將來之命運，不能不有重大之關心。

有田外相並解釋日本之主張如下：

- (一) 謀世界和平，應先確立凡地域、種族、文化、經濟有密切關係的各民族共存共榮之分野，在此分野範圍內樹立和平與秩序。即是說明世界有成立數個集團之必要，而在各該集團內建設新秩序，作為各該集團的中心安定勢力。
- (二) 各分野完成各該分野的新秩序後，須緊密與其他分野間相互共存共榮關係，於是世界和平始能確立，此為世界新秩序之大綱，循此方式以建設世界新秩序。
- (三) 日本在中國事變中所進行之目標，即為大地域主義的共存共榮體制。所謂東亞新秩序，即在東亞分野內的和平與秩序。為世界和平的一個出發點。
- (四) 以歐洲情勢的變化，東亞新秩序，決不止於中日滿三國共榮體，勢須包括南洋在內。即是所謂東亞新秩序，含

有指導著廣地域(包括南洋)的地理、種族、文化、經濟諸民族共榮分野的確立，與凡循此目的的再組織。今日所謂東西生命圈，東亞安定圈，或東亞共榮圈等，就是東亞的新秩序。

(五)東亞新秩序，為世界和平第一階段，任何人都不能作為其阻礙，日本對於破壞東亞新秩序者決澈底剷除之。東亞新秩序為日本生存權的主張，為世界和平的前進基礎。東亞新秩序以確立東亞圈(包括南洋)為目標，為在東亞領域的世界新秩序，不容任何人作為其障礙的。

以上主張，在世界的客觀情勢與日本的東亞立場上，求安定之點，極其正當。為日本任何人物擔負政治外交所不動之需求，同時為任何國家設身處於現實世界情勢，與日本之立場上，所必須主張與實踐的。該聲明為日本世界大地域主義和平宣言，第二次近衛內閣亦循此方針而不變的。同年八月一日，松岡外相又作闡明辭如下：

「……日本現在的外交方針，先之非確立中日滿一體的大東亞共榮圈不可，不久將繼續貢獻王道之精神於世界和平之樹立途上，國民須以更大決心與友邦提携掃除前途之障礙，堅信無疑於天賦的民族的理想與使命之達成。」

松岡外相嗣又追加說明，以這裡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係包括荷印與印法的。不消說松岡宣言所指的大東亞共榮圈與東亞生命圈，東亞安定圈，東亞經濟圈，東亞自給自足圈同一意義。以日本所求的真意言，則東亞共榮圈名詞為最透切，如就東亞共榮圈為關係於日本的生命的點切實言之，則亦不妨稱為東亞生命圈。筆者以此生命圈既以東亞共榮為內容，則謂為共榮東亞之生命圈，或簡稱為東亞共榮圈亦無不可。關於此點，後文再為伸說。

有田松岡之前後聲明，為日本確立「共榮東亞之生命圈」的大宣言，為日本的國策。反對如此主張的美國，無疑地為其門羅主義心理的影響。當德國反駁美國以「堅持門羅主義則不應干涉歐洲之事。」的時候，(同年七月六日)，羅斯福在海納克私邸，由秘書亞爾作門羅主義的解釋如下：

「美國無干涉歐洲及亞細亞領土之變更的意思，對於法屬印度中國之處置，亦無何等的發言權。法印為亞細亞勢力範圍，可由亞細亞諸國決定之。」

羅斯福之見解，雖未提及荷印問題，然就其見解的精神上言，則荷印當與法印一樣，如是方能適合其門羅主義的主張。不然的話，美國之門羅主義，不過爲利己的打算，爲世界和平之敵。然在東中的新事態與日本的決意上，美國雖曾有如羅氏之見解，而素來獨善利己的美國，決不肯承認日本之東亞自主的。關於此點，新聞紙上不時有反對羅氏此種見解之論調，赫爾長官又作修正的聲明，這些都是事實。有出聲明的主張，即針對美國的態度，強調補足羅斯福見解之不備。七月十日，須磨情報部長在會見外人記者團席上，有云：

「美國之門羅主義，不過爲美州大陸不願受任何人干涉之意，羅大總統不外謂：東洋之事應由東洋諸國處理之。此與日本外交方針根本相同。法印至於荷印的處理，應由東亞諸國自行處理之點，日本誠重大關心，予以注意云。」

須磨的見解，爲表明確立東亞共榮圈之範圍，且強調美國門羅主義正當界限及日本的東亞生命圈運動之合理性。

美國在門羅主義上，廣義的承認有田主張及須磨見解，確立日本東亞自主的東亞生命圈，實爲日本朝野之大要求。米內內閣已將此歷史性之聲明付之實行。至於第二次近衛內閣，更指定日本求安定與前進的前途，要求國民以全力致其實現。第二次近衛內閣，不僅以有田聲明爲對外主張，且以松岡聲明不爲動之國策。強化與集中日本全力以實行此國策，即爲第二次近衛內閣登臺的歷史性之意義。即是第二次近衛內閣之綱領，以處理中國事變及確立「共榮的東亞生命圈」爲最高度實踐的中心任務。而因此之故，在情勢急轉之場合，不必爲阿部內閣以來的「不加入歐洲戰爭」的原則所束縛。過去在米內內閣末期，對於「不加入歐洲戰爭」，已顯示着彈性，有田外相七月七日的演詞內，已見不到「不加入歐洲戰爭」的字句了。這雖非完全抹殺「不加入歐洲戰爭」的原則，而不過對於「不加入歐洲戰爭」的方針，不必爲所拘束，顯示國民對此方針原則，無拘泥之必要而已。此不獨爲日本之意向，即世界情勢亦不斷變化，日本僅知向處理中國事變及確立「共榮的東亞生命圈」之大目的前進，堅決地以求達成此大目的的有效之處置而已。

三、滿州事變與東亞共榮圈之關係 日本當前的處理中國事變，與東亞共榮圈之確立有關聯的。爲謀東亞之真正自主，解脫歐美的羈絆，而決定東亞政治、武力、經濟安定之地域，與同地域內安定之組織，於是有東亞共榮圈之確立。關於東亞共榮圈地域之規定，包括中日滿及法印荷印其他地域，自不待言。這些地域之經濟、政治、文化、共存共榮體，不僅求增進該地域之安定與繁榮，且須構成東亞各國不依存其他地域而能得到生存發展的限界。如此地域限界，爲相當廣大的。至其具體編成之活動，過去以世界情勢尙未或熟，故居狹小，在現狀之下，已可逐漸廣地域化，將來因情勢變化的機會，更可擴大至亞細亞圈爲止。在今日所規定地域之圓周內，亞細亞人居住區，依然屬於歐美勢力下，故解除此重壓，誠爲必要。將來解放運動成功，同時世界其他分野現實形成的時候，則東亞共榮圈屬於地理上、種族上、文化上、經濟上所有連繫的關係，將有自然的明朗之系統。

東亞共榮圈的精神爲東亞自主，東亞自主的目的爲解除歐美支配，滿州、中國兩事變，即含有如此意義之第一步與第二步之現實化。

解放東亞，須先構成東亞自身的協力關係，進而打破以東亞作爲殖民地化的舊秩序。中國在歐美勢力支配之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然而中國之執政者反而依存歐美勢力，而與東亞安定勢力之日本抗戰，中日兩大國家糾紛已久，似乎站在將受歐美法庭裁判的關係，如此祇有加深中國之殖民地化，阻礙日本之自主前進，同時助長歐美之支配東亞勢力。

中國之歐美依存與排日運動，激成了一九三一年的滿州事變，中日戰爭開始實現。在滿州事變當中，日本決行如下的事業：（一）使滿州與依存歐美之中國分離；（二）增進滿州地帶和平與繁榮；（三）以東亞自主爲共同目標，與滿州國結成政治、經濟、軍事之共同戰線；（四）在東亞問題上與歐美以現實的打擊。以上四點，爲日滿圈發生的關係，就是確立東亞共榮圈現實化的第一步。同時又爲東亞共榮圈的關係，而阻止蘇聯之南進，爲日本北守南進的出發點。雖然日蘇關係其後愈益惡化，然倘無滿州事變，則滿州的軍事與思想將益進於蘇聯化了。日本爲實行安定東亞的使命，對於本身的防衛過於消極，無疑地將受異常的威脅。滿州不特爲日本經濟的利益，實爲日本生命線的關

係。日滿圈之構成，雖則北方仍不減少威脅，而日本已成功了歷史性的某種程度之北守工作，得以進行南進以完成安定東亞的任務。

日本以滿州事變，與英美的支配世界機構衝突；與凡爾賽體制及華盛頓體制衝突；與克羅吾（Frank B. Kellogg）非戰條約及九國公約的英美利己法則衝突；與英美利己支配的偽和平組織即國際聯盟衝突。美國以遲於參加帝國主義之支配中國，於是改以金權的帝國主義作經濟的侵界，所謂對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外交原則，實則與支配中國勢力達於飽和點之英國及其他各國勾結，作新興日本之中國大陸前進之阻礙，對日壓迫之共同原則。美國之遠東外交原則，為無視中國之主權，謀各國之諒解，而九國公約，即建在美國以經濟對華侵略，及對日障礙，含此二大目的之遠東外交原則的基礎上的。此公約也就是日本參加第一次歐洲大戰的代價，以英美提攜至於日英解約而成立的。而在此（一）廢止日英同盟（二）日本交還青島助長中國親美反日性（三）日本海軍力以五，五，三比率，永久的對英美劣勢化之下，美國完成了障礙日本的遠東堡壘。美國自斡旋日俄戰爭的和平以後，事事施予日本以壓迫，以美國排斥日本移民而引起了神州對日本移民之排斥，甚至凡美國支配勢力或與美國有影響之地區，均阻止日本人之進出，且設法阻礙日本以人口過勝對於東亞大陸的發展。滿州事變後，美國態度，藉九國公約與國際聯盟，站在反日勢力之頂點。

日本以滿州事變與滿州國之成立，公然反對英美中心的歐美勢力作遠東之干涉，無視此惡勢力，邁進於日滿圈之構成，作為小範圍東亞共榮圈的初步工作。為此日本退出英美支配世界的國際聯盟，表示東亞自主的決心。東亞自主之大宣言，可說是在退出國際聯盟時已發表了。日本曾以美國式之東亞門羅主義向世界呼籲，然日本之主張為東亞自主，為構成共存共榮之東亞圈，非如美國之獨善與利己的主張。

日本以滿州事變來發展東亞共榮圈，就是給無生產的國家燃起向世界前進的火炬。那個時候，前次歐戰失敗的德意志，遂自凡爾賽體制束縛的最困苦底層翻身起來了。同時無生產的國家的意大利也起來了。意大利在前次歐戰的時候，與日本一樣的參加聯合國方面，在英法利己的歐洲組織凡爾賽會議當中，他的地位還不如被人無視為國家

的中國。滿州事變為歐洲兩個無生產的國家開了前進路向，以日本之敢於打破英美的世界支配，德意方面當然增加了不少勇氣。日本退出了偽裝神聖的國際聯盟，國聯的地位遂一落千丈至於一蹶不振了。德、意、蘇聯、西班牙，繼續宣告退出，英美所以利用為世界支配恒久化之國聯組織，至此以至其虛偽之暴露，遂至破壞不可收拾。於是意大利伸手於地中海菲州一帶，開始建設地中海新秩序，德意志脫却凡爾賽體制，開始建設歐洲新秩序。

總之，滿州事變，為打開世界現狀，建設世界大地域新秩序的出發點，為示世界以勇往前進的警鐘。日德意為世界貧窮的國家，而以滿州事變，遂發生了緊密關係的運命。

四、中國事變與東亞共榮圈問題 含有上述重大意義之滿州事變，在東亞共榮圈的觀點上，為東亞自主現實的出發點，其所為人注目者，則在意識與非意識之中，日德意相互作用，進行着其反英美性的趨向。其後日德成立防共協定，又以意大利參加成爲日德意防共協定，又以親德意的國家如西班牙、匈牙利等加入，無生產的國家群於是結成了橫斷世界的緊密關係。在由滿州事變發展的中國事變當中，此防共國家群均站在日本的方面。中國本土，英美支配性較滿州爲強，英美依存性較滿州爲大，爲求東亞自主的實現，握有東亞安定力的日本，非要握有實力之東亞龐大國家的中國協力不可。然而中國與日本對立，以英美依存爲自力強化，對日備戰日亟，滿州事變後的中日關係，日陷於險惡化，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的戰爭，中日兩國遂陷於東亞未曾有之大戰禍的漩渦裡！

中國事變，爲滿州事變的發展，與滿州事變同樣含有東亞自主，打破英美支配世界現狀，世界新秩序發展過程的世界史的意義。關於此點，與德意發展有深切的關聯。且成爲確立東亞共榮圈的重要階段。

英國支配遠東的重點，地域爲長江流域，地點爲上海與香港。美國的遠東支配亦以長江流域爲中心。歐美之中國勢力集中於長江，而以長江流域爲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地盤之渝府，復依存於以英國爲中心之英美國際金融資本，或利用以謀強化發展。滿州事變後之中國抗日運動，與利用此運動之渝府統一中國運動，其一切排外中心均集中於日本，同時英美兩國，鑒於日本前進，將弱化其遠東支配之勢力，爲謀確保其遠東地盤；及強化資本之支配力起見，遂極力支援蔣氏，同時欲利用蔣氏之反日性，以阻礙日本之前進，爲之策劃幣制之改革，重工業之支援，交通之

整備等等，以延長中日戰爭。蘇聯則以擴大中共勢力同時阻止日本強大化為目的，以與英美不同的方式，誘導濱府以對日抗戰。曾以解脫歐美勢力以求中國自主為口號的蔣氏，至此遂以反日聯歐美政策而自畫其中國自主可能性。

蔣氏日益進於對日抗戰之途，成爲中日滿協力以求東亞自主的障礙者，與日本起了正面衝突，誠爲東亞共榮圈過程中不幸的現階段。

中國事變，不單是對於抗日之濱府而戰，爲由東亞共榮圈的觀點求東亞自主而戰。推翻歐美的東亞勢力，打倒蔣氏抗日之背景，改造英美利己的東亞舊秩序，以求東亞解放而戰。此爲日本處理中國事變之政治目標的東亞新秩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衛聲明，對於東亞新秩序，雖未有鮮明的說明，然而關於該問題前提之提供，不曾已示引其大綱；指明處理中國事變之政治目標，而標示以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爲中心的日本前進路向。

關於中日新關係的近衛首相談話（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日本政府本年度屢次聲明，以終始一貫的武力，澈底掃蕩抗日政府，並與中國同憂具眼之士，互相提携，邁進建設東亞新秩序。現在全華各地，已有澎湃更生之勢。日本政府，將與中國根本調整方針，闡明於中外，使各方徹底了解。日本之真意，以中日滿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爲目的，要求三國互相結合，善鄰友好，至於共同防共，經濟提携，務須使其實現。故希望中國，不論如何，必須先行拋棄從來偏狹之觀念，及清除抗日之劣策。而中國人民對於滿州國之芥蒂，亦要棄擲。換言之，即日本率直希望中國親自與滿州國修正國交。並絕對掃除東亞方面之共產赤化政策。如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以進行締結中日防共協定。此乃中日調整方案中之最吃緊要件。然而鑒察中國現在之實狀，如欲達到十分保障防共之目的，不得不要求在該協定繼續期間中，中國之特殊重要地點，日軍認爲有駐屯防共之必要。及要求內蒙地方爲特殊防共地域。就以中日經濟之關係而言，日本對中國並非存有獨佔經濟的行爲，亦非要限制理解新東亞行動之第三國在中華所尋求之利益。只有期望中日提携合作之實效，使中日兩國立在平等之地位。中國須要容許日本臣民在中國各地自由居住或營業。以促進兩國國民經濟之發展，且鑑察中日兩國間從來歷史經濟之關係，要求中國予日本以便利，特別在華北及內蒙地域開發，利用其資源。日本

對中國所要求者，即上述大綱之點。日本調兵來華之真意，並非有佔領中國領土之野心，亦無要求中國賠償戰費之事。中國民眾必須澈底認識，日本是希望中國分擔建設新中國秩序之責任，此種責任亦為中國所應負者。日本尊重中國主權，固屬勿論，並希望早日完成中國獨立之大事，而對治外法權之撤廢，及收回租界之事，亦當積極研究考慮。

以上近衛聲明，即具體表明日本處理中國事變之原則，不外為（一）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的而結合，相互實行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之事實。（二）中國承認滿州國。（三）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及日軍防共駐屯。（四）經濟提携之具體化。（五）日本不求領土割讓及賠款。（六）協助中國撤廢治外法權及收回租界。

據上所述，中國事變，實含有東亞自主戰的要素，及以中日滿三國共存共榮的再組織為目標。在此組織內，首先切斷歐美根本勢力，撤廢治外法權與收回租界。推而論之，則東亞新秩序，應作如下的見解：

「體現中國事變歷史性之意義，非以東亞共同防衛，廢除歐美帝國主義的擴張支配機構，樹立亞細亞共同體制與新東方文化，為東亞新秩序之根本性格不可。」（見昭和研究會事務所編東亞新秩序建設之理論與方策）

在上述東亞新秩序的理念中，作進一步的觀察，即可瞭然中國事變實為日本與歐美侵略中國勢力及中國抗日主義相衝突。在中國事變三年間現實之經過，更為顯然。日本軍事前進，在中國各戰場上，直接間接，皆與歐美美勢力發生衝突。國聯、英、美、法等外交、經濟、文化、思想的對日壓迫，竟至將以軍事手段來相周旋，並在中國所不能收回之各國租界內，盡量發揮其機能以妨礙日本之軍事行動。日本為尊重第三國之立場，忍受所不能忍受者，謀先消滅渝府的勢力之故而已。滿州事變當中，日本無視英美一切勢力，至於中國事變，在錯綜複雜美勢力下之中國本土內之行動，所有軍事、外交，均過於尊重列國之立場，故中國事變的歷史性的意義，與其意義闡明之行動化，現實上發現矛盾，日本不能不承認當時對於第三國行動，過於懦弱。且其結果，反使英美法加深激化其援蔣反日之行為。

那個時候，德意防共國家羣，以日本爲同盟關係，加以精神上之協力，雖犧牲本身的中國市場的利益而不恤。在中國事變當中，日德意均打開了現狀推進世界的立場。在此情勢之下，日德意關係之再強化，久已成爲問題，在未得決定結果之時，德蘇成立了協定，第二次歐洲大戰發生，日德意間遂成了今日之關係。

中國事變的進行過程中，日本反覆與英美及蘇聯二重勢力激鬥，廈門、上海、天津租界問題之發生，日本及中國被佔領地區之反英運動之開展，中國內外援蔣路線與據點之作戰，使歐洲情勢急轉下的英國慘急潰退其遠東之勢力。唯其如是，中國事變，爲東亞自主之發動，其性格漸次明顯，並以伸手於中國國境之外，使關係於日本運命之東亞共榮圈之確立，進了新的階段。

…未完…

過去支配青年之思想的有兩種主義，一是世界主義，一是愛國主義，世界主義太廣汎了，自上次世界大戰以來，中國有人提倡國際主義，不知不覺把中國成了歐美的附庸，又有人倡共產主義，要將中國赤化，最近事變導源於此，兩種主義已是顯著的事實，愛國主義是當然的，不能愛自己的國，何能愛他人的國，然而國不能孤立，不能不有集團行動，現代尤然，祇知愛國，其結果往往不能救國。

——節錄汪主席告青年書——



孔子畧傳及其學說大旨

革 瘦

東亞聯盟，基於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之根本，當首推孔子之道，故其人其學，不可不知，分述如左：

一、畧傳 孔子牛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父曰叔梁紇，母顏氏，廟於尼山，得生孔子，時維魯襄公二十二年，（此說除史記外，更有杜預左傳注，陸德明左氏音義與蘇轍古史等）或云二十一年（春秋公穀二傳，賈逵左氏解註，服虔左氏傳解註等）聚訟二千餘年，嘗聞韓非有言：「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其一人曰吾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外儲說左上）竊謂孔子生也，早晚一年，殊無大闕，亦不必以後息者勝，仍取前說可也，生而首上圩頂，故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父母均相繼早亡，丘爲兒時，常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魯大夫孟懿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卽沒，若必師之，後弟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果往學禮（史記繫此事於孔子十七歲，然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一年，孟僖子卒於昭公二十四年，故是年孔子應三十四歲，參觀錢穆先奏諸子繫年三）孔子嘗爲委吏乘田，（孟子）蓋在既婚之後，（國里志年譜云，二十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案隨引家譜）伯魚名鮒，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語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史記孔子世家原文）關於適周之年，閻若璩四書釋地續，謂在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歲，莊子則謂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子，實定公九年，水經注則云昭公七年，孔子十七，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應爲昭公二十四年，（錢穆說，見前引）孔子適周之事，近人多疑未有，然史記本於莊子，莊子未言問禮，史記云，適周問禮，蓋見老子，蓋著未定詞也，愚意孔子適周問禮爲一事，閱書爲一事，周爲宗廟，禮自備於魯邦，就而問禮，亦固

應有之事，老聃果爲周室藏書史，孔子因借閱藏書而致敬於聃，亦爲交際之應有，不必問禮於老子，後儒爲此事而爭論，殊可不必，至今日所傳老子五千言，是否聃作，自當別論，暫不必言，孔子自周反魯，弟子益進，尋以魯有內亂，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不能用，孔子遂反魯，史記未明言在齊年數，但以一年說爲合理（江永總黨圖攷，狄子奇孔子編年，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後說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均主之）時魯定公立，季氏家臣楊虎，囚桓子，專政，（史記之楊虎，卽論語之楊貨，見論語注邢疏及孟子滕文公篇趙注，）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遠方至者，莫不受業，定公九年，楊虎以罪奔齊，公山不狃（論語作公山狃弗）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旋任司空，復擢大司寇，定公十年，齊以魯用孔子，懼勢危，乃與魯爲好，會於夾谷，孔子從往，魯公舉動合禮，齊景公歸而大恐，（史記述此會，最後有斬侏儒事，江永總黨圖攷謂史記、穀梁、家語，皆有此事，係後儒僞造，梁玉繩史記志疑亦謂後人侈論之，按此事仍以左氏傳爲可信，故從之而簡其文）乃歸所侵魯之鄙，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卽三家之邑也）以統一政權，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孔子使人伐之，卒墮費，孟氏之成，不欲自墮，公圍成，亦弗克，（自宋以來，如章如愚山堂攷索之三家墮都辨，滹南集五經辨惑，梁玉繩史記志疑，姑際恒春秋通論，皆主其謀非出孔子，然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記當有所本，且孔子相魯，自顧削三家之權以尊公，雖成終未能墮，不能以成敗論也，况已墮二都乎），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荀子宥坐篇云，孔子爲魯攝相，晏子春秋則云孔子聖相，史記本此，然史記下有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蓋亦本荀子，崔述梁玉繩均辨之，謂孔子無此事，故不取，）魯以大治，齊人懼，歸女樂，魯公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論諸微子篇，翰非內儲說下，史記均載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淵鄰家，十日去衛，過匡，陽虎嘗暴匡人，孔子貌似楊虎，遂被拘，尋脫難過蒲，月餘返衛，主蘧伯玉家，衛靈公夫人南子，欲見孔子，孔子見之，子路不說，（史記此事，蓋本論語，）孔子醜之，去衛過曹，後去曹適宋，司馬魋桓欲殺孔子，孔子適鄭，未久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居三歲，會晉楚爭強，陳常被寇，孔子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

，（史記蓋本論語及孟子，）遂去陳，過蒲再適衛，靈公郊迎，然仍不用，孔子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矣，三年有成，（論語）衛既不用，後如陳，時魯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冉求召孔子還，欲終用，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還蔡，又明年，自蔡如葉，旋後返蔡，三年，吳伐陳，楚救陳，楚使人聘孔子，將往，陳蔡大夫相謀，發徒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得免，昭王將與孔子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曰，「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率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之福也」，（史記孔子世家引，而朱子語錄及崔述皆不信其事，）昭王乃止，於是孔子再反乎衛，時魯哀公六年也，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史記引論語）其明年，冉有季氏將師，克齊於郎，季康子因之孔子之能，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蓋去國已十四載矣；然魯終未用孔子，孔子乃退而序書傳，徵禮記，正樂章，釐重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爲三百五篇，皆合韶武雅頌之音，晚年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一）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人，而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以道不行，無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乾哀公十四年，共十二公，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卒日，春秋經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皆同，迄杜預左傳注，始謂四月十八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傳東家雜記，卽改己丑爲乙丑，愚按乙巳二字易互誤，改己爲乙是也。）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心喪，唯子貢處於塚上，凡六年，葬年五十，先孔子卒，葬子伋，字子思，作中庸，克紹先德云。（二）

註一，論語，「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自來解者不一，易乾鑿度卽主孔子五十之年學易或云，「古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時謂孔子以七十之年學易，俞樾續論語駁校云，「此當以加我數年爲一句，五十爲一句，以學易爲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數年而言，言或五或十也」此則不言年而與史記晚而喜易之說意同，愚取史記說，最不通者，卽古五字如七說，查東周金文，五七二字，絕不能混，蓋「五十以」三字，金文作「五十」若聯書之，則爲「五十」故初本「吾」字，後輒轉鈔錄，而變斷爲「五十以」三字，「五十以學易」卽「吾

學易」也，且古文一字二分者有之，如白家故廣字分爲牋員，是一字兩分也，又有六字，分爲十八，（史記晉世家索闕引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王國維竹書輯校謂此十八，乃六字誤譯爲二者，）是亦一字而兩分也，既可兩分即可三分，要視字之形象若何耳，此又吾說之旁証也：

一、學術之要旨孔子教人，雖因才不同，有德行、言語、文學之分，然均係爲人之道，絕無怪與神的超人哲學，故孔子之道，皆入世的，非出世的，即「如何作人」「人當如何」之道，茲分述如後：

甲、恕與人「孔子對於作人之道，第一即係「恕」，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下二句即解釋「恕」的內容，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恕與仁本爲一體，是以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不過「恕」爲消極的「仁」爲積極的，故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人之方也矣，」（論語雍也）故恕以律己，仁以立人，要之，皆爲作人之道，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非恕與仁，不足以成就，故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荀子云，「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效篇）由此以觀，仁卽人，亦卽道，合之，則「爲人之道」也，故論語有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樊遲問仁等之不同，孔子所答，亦各有異要之均不外爲人之道，然人之地位不同，故須各盡其道，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此卽言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其道如何，大學釋之頗詳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並加「與國人交，止於信」人與人之關係，不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後世無謂之五倫，（曲禮注，倫猶類也）五倫相處，各有其道，孟子曾言之，此外左傳所舉之六顧，禮運所舉之十義皆係五倫之道後當詳論，然其發端，皆不外孔子之「恕」與「仁」蓋此乃爲人根本之道，不可須臾離者也。

乙、正名，恕與仁乃孔子認爲作人的第一要義，由此而生出五倫，已如上述，次則爲正名主義，論語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全文見前畧傳引）孔

子又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故凡正即當正，春秋時之君臣，皆不能正，故雖爲政，亦非政也，亦如角形酒器爲觚，（見漢書律歷志及師古注）後凡盛三升之酒器，皆名觚，故孔子有「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之歎，器名不正尚不可，而政不能正，如何可耶，政者正也，正名尤先，但終孔子身，而不能爲政，雖爲魯之司寇，時間既促，主義未行，不得已晚而自作春秋，其事雖因魯史，其正名主義，則借以表見，故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其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爲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莊子亦云：「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董仲舒亦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此數子皆知春秋深意者，皆謂春秋以正名爲主，孔子一生未掌政權，未能率人以正，故作春秋以率當時，以啓後世，至其正名之點，約有三端。

A. 正名字 乃訂正一切名字之意義，例如春秋云「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穀梁傳「隕石於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公羊穀梁兩傳，均注意名字之訂正，詳閱即知。

B. 定名分 春秋時，王室衰微，諸侯稱霸，滅國者有之，稱王者更有之，周室不能控制，聽之而已，孔子於春秋，則釐定名分，按吳楚早各稱王，而春秋則但稱子，齊晉早各稱公，而春秋則但稱侯，宋雖弱小，孔子書公，職士之會，事實爲周天子，就晉文公之召，而春秋則書「天王狩於河陽」，他如「春王正月」之類皆係正名分之意也，論語八佾所載，如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室，又子貢欲去告朔之餚羊，子曰賜也，爾意其羊，我愛其禮，皆與春秋定名分之意相同。

C. 寓褒貶 寓褒貶，卽別善惡之意，卽將褒貶判辭，寄託於記事之中，故董生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

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惡惡賢賤不肖，」（史記自序引）善惡惡即褒善貶惡之意，所以示後人，趨善避惡也，例如春秋書弑君三十六次，（參觀拙著中國史綱卷一緒論引）而書法則大不同，例如「衛州吁弑其君完」（隱四年三月戊申）乃指州吁有罪也，「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此則屬褒貶與君同死之大夫之意，「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文元年冬十月丁未頽，公穀作堯）此則不但弑君，且以世子而弑父，「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十六年）此則宋國有人弑其君，可見其君之不善，「莒弑其君庶其」（文十八年冬）「晉弑其君州蒲」（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此則書國而不曰人，卽國人皆曰可殺之意，雖弑君，而君之罪大矣，「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此弑君者乃趨穿，並非趙盾，以趙盾身肩國政，亡不越境，反不謝賊，故以弑君之罪加之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要之不外正名主義，但對魯國弑君之事，則未直書，後人以爲孔子「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等推測，實則恐致權門干涉，或孔子沒後，被迫改變，否則絕不能自亂體例也，春秋義在正名，故往往稍違事實，若以史論，實應據實設載記故後日作史者，若仍如春秋書法，殊不可也，（此段參觀胡適中國哲史大綱卷上第四篇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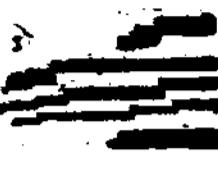
丙、政論，孔子政論，主要在於人治，而輔以禮治，但亦不求速効，故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論語子路）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子路）後儒所謂「王道無近利」，亦卽「欲速則不達」之意也。

A人治「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孔門之主張也，又云「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云「待其人而後行」（以上皆中庸語）故爲政者關係最大，是以其人必正，所謂「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故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卽論語云「子欲善而民善矣」，「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故在上者必以身先，亦卽「子帥以正，教敢不正」之意也。

B禮治 孔子主張人治，法家以此不足以長治而久安，倘無賢者在位，則社會人民，豈不危險，故不若立法常

存，卽無賢君，亦有常法可遵，不至爲亂，但孔子於此，不主法治而主禮治，并作比較其短長之語曰，齊之以刑，民免無而耻，……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論語爲政〕「凡人之知能見已，已然，不能見將然，禮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得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禮記禮察篇，小戴禮記經解篇〕此言禮之大用，可謂深切，在上者如能率天下以仁，更以仁信禮義之教育，施諸百姓，則法卽無用矣，孔子曰，「禮義以爲紀，……示民有常」〔禮記禮運〕卽指平日教育而言也，其實仁義禮信，皆係教育宗旨，不過以禮爲主要者耳，蓋人之語言動作，有關於人之品行最大，非禮不足以限制，故禮之用途較大，人人能非禮勿言、聽、視、動，則天下平矣，奚以法爲，此禮治與法治之根本不同，亦卽東西洋文化根本不同之點也。

我們遵奉 總理主張，一直到民國十七年，十七年以後，因爲事實上的變遷，就沒有能把總理的主義，切實奉行，却只走上依賴國聯的一條路，於是與日本的冤仇，越結越深，這是無可諱言的。爲了這種冤仇，纔有這十多年的糾紛，纔有這三年來空前的浩劫，如果能夠遵從 總理遺教，明白冤仇宜解不宜結的道理，不結冤而去解仇，不至於將中國糟蹋到如此地步了！



美國參戰與軸心國家

前原光雄著
陳應榮譯

1. 美國參加歐戰與否，這個問題，是現在世人集中目注標的焦點，假如美國要援英至到參加戰爭的話，那麼日本必定根據三國同盟條約第三條規定，便造成不可不陷于對美戰爭的狀態，而且美國雖然不以參戰的形式來援助英國。但倘若日美間發生戰爭狀態時，結果依然和前項同盟條約所規定的沒有差異。從這點看來，便能究明白美國和德意間會惹起戰爭的狀態。因此；無論美國用着任何方式來參戰，都是含有全和軸心國間交戰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參戰的結果，當然會惹起日美開戰。

美國為什麼一定要和樞軸國家開戰呢？此點就羅斯福提出于第七十七次議會上的教書而論，力說從獨裁者

。但實際上，不能否定美國是違反中立義務的。例如：美國以五十隻老朽驅逐艦讓渡與英國時，在表面上，美國突然將該項驅逐艦先賣與美國內個人的商社，然後由商社賣渡與英國。這樣糊塗的表面，不用說也可明白了。這樣非中立的行爲，和更有甚于這種行爲的露骨化援英行爲。如果真正實現的話；那麼美國必定會捲入歐戰的漩渦。換句話說，美國非中立行爲，當然會惹起德義對抗的手段。在對抗的一端，德意是認定美國併入英國方面來參戰的。進而聯想到對美戰爭的意思，敵對行爲的手段。這個時候不管美國願意與否，美國參戰，便是不能避免展開實力與全樞軸國抗爭。既與樞軸鬥爭而參戰，它的理由，已並非是爲着防衛民主主義而鬥爭吧。況且世人認爲因爲美國開始援英，對於參戰上，是含有最濃厚發展的可能性。

2. 此外美國參戰還有兩個場合，會惹起實現的可能性。第一個是因爲企圖防止南進的起見，而訴諸于實力的時候，同時因爲日本要確立東亞共榮圈爲前提，日本的健鬥的精神是不用說了。因爲位于東亞共榮圈西南太平洋各島嶼當然已經包含在內。故地理上，歷史上，經濟上和文化上，亦當不用說明了。在西南太平洋各島嶼

來說，尤其是荷屬印度美國不獨要仰給其軍需資源，而且美國假使以攻擊日本爲目的的話。則在太平洋作戰，荷屬印度諸島在戰畧上是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又假使日本積極試行南進政策的話，若果美國阻止日本南進，那麼日美間必然地潛着開戰的危機。首先美國參戰是以日美開戰爲始；進而或與其他樞軸國開戰？全英美爭霸和因爲援英參戰，是沒有分別的。這個時候參戰的理由，並非單獨援助民主主義國家荷蘭，實際上是爲着美國自身國防充實起見而參戰了。日本南進的結果，是日本擴大發展，是影響美國壓力的預防措置。

其次：美國若要參加戰爭；即是說美國顯明地要向作戰基地前進，以圖完全封鎖日本軍事行動的實行。若果在這個時候，日本要是拱手傍觀的話；那麼日本軍事行動，是會失却活動能力的。而且禁錮在不利的立場上，對美作戰並沒有勝算的希望。例如美國在太平洋中，英美荷蘭中國的領域內，設立空軍基地，在基地上實行駐屯海空軍部隊的時候，那麼日本一定要預防對日攻擊的基地或者不得已將訴諸武力。而美國撤回各駐屯軍，故可說美國由日美開戰形式進而對樞軸國加入戰爭的可能性。這時候美國參戰的理由，從日本方面看來，美國

是成爲對日包圍陣勢或者是對日攻擊態勢。但美國不承認這個參戰理由，美國對日攻擊態勢是開戰的直接的動機。

總括以上所述：美國參戰可分作三個場合來看：

(一)便是援英行爲惹人參戰的場合。(二)以實力阻止日本南進的場合。(三)對日攻擊態勢威脅日本獨立的場合。這三個場合上參戰的理由，並不是同一樣的。上項已經述過。美國認爲在民主主義上當有防衛之必要，因而挺起援助民主主義者，這是可以理解的。羅斯福說：在樞軸的勝利不久便威脅到美國護衛下民主主義最後的牙城也未可料。故當在事態尚未發生前，便要起來援助民主主義。這番說話或能得諒解。但美國因爲阻止日本南進和對日攻擊勢，結果，雖然同時參戰。但這樣參戰，美國是以自身作孤注一擲。而且因爲政治上一主義，即是說爲着護衛侵畧他國的主義而戰。更或因爲防害並非對自己進攻的外國發展，也致身于存亡之道作賭博而戰。

我們可以說這是最危的而且輕率的政策。相信美國未必會採取這樣無謀的政策吧？但美國真要參戰的話，就三項中以何者爲最易看破而論，那麼美國是自信不會打敗仗的。算是戰敗，自信在資源上，地理上，也不會受到重大打擊。但我們不管他怎樣自信，我們就羅斯福所言而論，謂美國絕不會戰敗……。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便可理解到羅斯福打仗是屬於大賭博的性質。

3 羅斯福之所以自信美國絕對不敗的必要條件，因爲自信有大運艦計劃造成無敵大海軍，用以護衛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美國利用德國在歐洲大陸作戰得到驚異的成功時期，便得到成立作戰部隊長史達克氏提出的大建艦法案，美國的空前建造大海軍；決于今後七年間新建艦艇四百隻，加上現存的三百五十隻，已經成就出現空前大海軍。

德國向英本土登陸作戰，其困難的一個原因，是英海軍尚還健在的原故。況且居于一衣帶水的法海峽尚且如此，何況美國處于獨一無異的優勢國防地位。假如更持有強力海軍的話，那麼可說美國的安全，卒幾佔整百分率呢。所以美國持着這個信念，因此自信不敗。

英美怎樣對樞軸國家展開戰爭呢。在歐洲沒有交手的美國，可以確定它沒有派遣軍隊援助英國的。因此美國參戰，是實行援助英國物資，公然由美艦隊掩護物資運送英國。一方面因爲意國海軍不能進出地中海，同時德的劣勢海軍，在海上沒有邀擊的能力和現在一樣，

德國除了利用潛水艦或飛機來向輸送艦團攻擊外，想是沒有其他方法了。因此；歐洲的交戰和德國未實現成功向英國本土登陸時，欲想避免長期戰爭是夢想的。算是成功的話，英國也不會單獨屈服于樞軸國。既不屈服，便只有逃向加拿大與及其他自治領或殖民地；依然繞于長期戰爭，這是可以預想的狀態。而且美國因為派遣海軍援助英國後，德軍幾不能在英本土登陸作戰，從此點看來，美國參戰，實在是擴大歐戰的一個直接的影響。

其次挾于太平洋中的日美爭霸，現在美國以其海軍勢力繞于太平洋數千哩。但美國自身亦深知它的海軍實力不能向日本挑戰吧。

這樣看來，美國參戰的晚，是歐戰和中國事變相合。即可擴大強化或為世界戰爭。是採取長期經濟戰爭的形式上有極濃厚的可能性質，故我國民要有充分的決意。

那麼因為美國參戰，至弄到全樞對軸英美爭霸，無

論在歐美戰場上也是，在東洋戰場也好，但都可以明白它都是採取長期作戰的方式。那時候在日德意各樞軸國，因為德意和日本在地理上遠隔的關係，用不着說共同作戰是大大不方便的。假如德意海空軍在地中海與大洋上，不能握着制海制空權的話，德意對美武力戰是不可能的，而且日本和德意對美以武力戰的實現性，是非常薄弱。此點看來，樞軸國對英美作戰和對蘇作戰的趨旨，完全不同。



泰國與法屬安南的紛爭史

—守禮—

在中日戰局還在膠着狀態，歐洲大陸的英德爭霸還未終結的時候，亞洲南方的一角却又發生一個小小的波動來了。那就是泰國與法屬安南的戰爭，從這次戰爭的各方面看來；雖然期間是短促的，然而牠所含蓄著的意義却很偉大，能使我們興奮而不會忘懷的，正是東亞弱小民族抬頭的時日，也是黃色人種對白色人種得到一個絕對勝利的機會，爲着這次戰爭而更增強東亞民族的聯合途徑，表現着將來臨世界最終戰的有色人種勝利的先兆呢！所以值得我們去研究研究的。

一、泰國與法屬安南的位置與我國的關係

在亞細亞大陸的南部，界於中國與印度之間斜出一個大半島，就是印度支那半島。扼着這半島中的政治權的。可分法屬安南，泰國，英領馬來半島，緬甸，海峽殖民地等數部。

泰國本名暹羅（于一九三二年暹羅王國改君主立憲政體時，定國名爲泰國，取國泰民安之意）。東與法屬安南相

連，南與馬來半島爲界，西與緬甸接壤，北距安緬國境；遙遙與我國雲南相對，領有一千五百萬人口，面積有五十二萬方公里，是一塊肥沃土地。氣候爲熱帶性氣候，產物以米爲最著，是一個天府的和平國度，首都盤谷，在湄南河下流，南臨婆羅洲海，海運甚發達，是具有現代型的都會，王宮與壯麗的寺院也建築在裏面，人口達九十六萬之多。泰國因爲地處法屬定南，英屬緬甸之間，兩國爲着折衝摩擦，和利益衝突起見，便以她爲緩衝國，於是一直到現在還站在亞細亞洲的獨立國羣裏。

法屬安南在印度支那的東部，東南方臨東京灣與婆羅洲海，西接泰國，北與我國的廣東廣西雲南爲界，內分東京地方，安南地方，老撾地方，柬埔寨，交趾支那等數部，面積比泰國大，人口二千餘萬，氣候爲熱帶性，也是天府之國，產米特著，省府河內，在紅河下流右岸，爲米糖輸出地，大都會如西貢，握交趾支那的政治中心，亦爲法屬安南的海陸交通中心，爲有名西貢米的產地及出口地。

泰國與法屬安南和我國接壤，既然是這樣的接近，那麼便有很密切的關係了，歷史會告訴我們；明朝的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時候，經過暹羅，當時暹羅王便向我國進貢，冊爲臣國，因此鄭和帶去的兵士，見得那裏有着豐富的資源與產物，很多都滯留在暹羅，安南在清朝是屬於我國的領地，且在清期初年安南內亂，中國也會派兵平亂，又明代末祚南遷時，曾有許多中國人爲着避免兵災之禍而到安南去，然而自一八八四年中法之役，於是安南由中國的屬國一變而爲碧眼的勢力支配了，因之暹羅亦漸與中國斷絕交情，雖然牠們都與中國的關係脫離了，但是我國的華僑在那裏都佔很大的勢力，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無形中握在華僑手中，這次汪主席脫離重慶時，也會逗留於安南的河內，這是誰也不會忘懷的罷。

二、紛爭相遠因和近因

凡戰爭並不是一朝夕發生的事情，必定經過很長久的醞釀，和許多宿怨新仇的根子而釀成的，這次泰國與法屬安南的戰爭，自然也同樣地不能脫這公式之外，那麼我們從牠們的遠因和近因上看來，就可以知道這次戰爭並不

是偶然的了。

十九世紀中葉法蘭西的東侵政策逐漸開始了，先於一八六二年向安南國王割讓得交趾支那地方以爲基地，翌年（一八六三）又將柬埔寨置於自己保護之下，自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的結果，整個安南便全在法國的統治下了，但饕餮的法國，並不因此而滿足，於是貼近安南邊境的泰國便成了魔手下的好餌了。

這貪得無饜的侵略者，不時在找尋機會的來臨，終於一八九三年因國境守備隊的衝突，便啟發了兩國國境的紛爭問題，當時泰國是衰弱不堪的國家，且人民還度着中世紀的生活，軍備又不十分充足，那能抵抗這如猛虎似的強大的法軍呢！所以一敗地塗地，因此老割據地方及湄公河上的島嶼，並賠賞軍費三千萬支格魯（泰幣名），又定了法軍在占特布里駐屯等十條條件而媾和。這樣安然地度過了十年光景，在一九〇四年，法國以泰國不履行一八九三年的條約（即賠償費不能完全清付）爲理由，於是進兵泰國與法屬安南國境相接的南端要衝占特布里地方，這裏若給法國佔領了，對泰國的國力消耗是很大的，且又爲泰國國防要衝，爲着有這樣的障礙，故泰國向法國要求撤兵，然而狡猾的法國，並不會順順利利的撤退，便乘機要挾以相當利益作交換條，於是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泰國含淚的以巴克塞，蘭普拉邦等兩地方（合計六萬二千五百平方公里）割讓與法國以作交換物，直至一九〇六年法軍纔撤退出來，但還佔據着占特布里南方的德老特及古老特，同時又占領孤峙島，常常向泰國施以恐嚇手段。於是在一九〇七年某法人提款主張向泰國設領事裁判權，及外人參審官倡議向泰要求割讓柏特盤地方，泰國爲着嫌惡這種領事裁判權的行使，故提出撤廢治外法權的交換條件，在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泰國將柏特盤與燒勒特，土蘇洪一帶（共五萬一千平方公里）割讓與法國。

如上面自一八九三年契機於國境兵隊衝突之微小事情，致令泰國却失去了如許廣大的土地，且泰國常受法國種種的壓迫，這就是蘊藏著今日戰爭的遠因。

泰國自一九三二年實行立憲革命後，逐漸向近代強盛國家之途邁進，國力也有相當的充實了，愛國的思想強烈地刺激着每個泰國人的心中，於是每念念於失地的收回，這種希望在今次歐洲戰爭的情勢反映下更增加熾烈化了。

際於法國戰敗于德國的時候，泰政府曾經有向法國歸還湄公河中島嶼的要求，但沒有十分的好結果，繼着去年九月日本軍隊進駐法屬安南的情事發生後，更給與泰國收回失地一層刺激，且一方面英美爲着引起遠東戰爭的烽火，以阻止日本南進政策，於是極力在泰國，法國方面煽動，因此這戰爭便開始了。

三、從要求而到紛爭

泰國受着英美的煽惑，且目擊日本的順利進駐安南，一面法國對牠所提議的收回湄公河島嶼置諸不理，於是在老羞成怒之下，去年（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三日，更擴大的向法政府要求了，其條件如后：

（一）老撾（一八九三年泰國失地）的一部份，及湄公河最深處爲國境其中四十餘島嶼，返回泰國。

（二）歸還一九〇四年泰國割讓與法屬安南的巴克塞，蘭普拉邦兩地方。

（三）一九〇七年泰國割讓與法國的柬浦寨的一部份（包含柏特盤，燒勒特，土蘇洪一帶），歸還泰國所有。

上述條件泰國在六月調印的法泰不侵犯條約批准當兒向法國提出了。但戰後法國後面有着英美的煽動，且有點藐視泰國的緣故，也不甘示弱的向泰國拒絕了，理由是這樣：

「不論法國政府發生怎樣事情，及遇着如何的企圖的來臨，但對法屬安南的領土防衛是決定的」。

從上面的法國回答上看來，可知其意思是一寸的土地也不讓與泰國的。又十月十七日，維希政府更用狡猾而强硬的聲明提出了；

「法國及泰國現在的國境是最後的國境，因在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締結條約時，曾論及兩國領土問題，以後便沒再有事情發生的意見一致提出了，因此之故，法國對於如何要求安南的政治現狀，安寧及主權的威脅或攻擊，只有斷手防衛而已」。從上面可知道法國政府一再聲明拒絕回答了。

泰政府接到法國的拒絕回答後，更重於十月十八日再次提出，在第一次要求提出以來一個月間，兩國會發生了衝突，和積極備戰的事情；泰國軍用機的法屬安南越境事件；泰國的海陸預備兵召集，九月下旬泰空軍一編隊受到

法屬安南高射砲的射擊等。同時法屬安南的大型機也侵入泰國的境內，又在國境配備部隊，勸附近居民遷徙，實行燈火管制等，於是兩國關係就緊張起來了，湄公河的國境漸漸孕着火藥的氣味。

泰首相籃皮蓬于十月二十一日在播音機裏向國民放送裏曾說：

「我們最希望的是無血解決領土問題。然而事實上却漸漸進於戰爭不可避免的狀態。慘禍在最小限度不能終止，只有實行戰爭罷了，除了老撾地方的蘭普拉邦，巴克塞等地域回歸我國，及妥當的以湄公河的新國境劃定以外，怎樣的解決策是不接納的」，他決意的說明出來了。

這樣雙方的宣傳戰開始了。盤谷的熱血青年舉行市街遊行示威運動，新聞方面揭載很多反法論調以喚起民眾，又如泰國宣傳部所說的；在安南經商的泰國人，每日都有被逮捕的。湄公河航行的輪船也不准泰國人到安南國境，武裝安南兵一隊越過湄公河解除泰國官憲的武裝……等等，這樣戰爭的氣味更為濃厚，迫切了。

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泰國利用急襲佔領了柬埔寨的婆皮特村，在國境的高崇河架橋的當兒，法軍便先向泰軍射擊，於是泰軍用機槍還擊，戰端便開始了，泰國與法屬安南醞釀很久的戰爭，在這個時候就正式的開始衝突了。一直到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戰爭才算告一段落，現在且簡將其戰爭情形分述如后：

起初兩國利用飛機作國境附近的轟炸，繼而互砲擊，同時陸軍亦出動了，主要戰場是北部的威安占，他奇古，南的東埔寨。起初兩國戰爭在緩慢的進着，但是時間久了，戰爭程度越加濃厚，十二月中旬戰爭更變得激烈化了，十二月十六日維希政府對泰軍猛烈的攻擊，自己抵抗不了，還老着臉及，向世界作掩飾聲明說：

「斷乎必要報復手段的決定」。

同時總督德古，爲着響應維希政府的意旨也說：

「法屬安南還沒有做到積極的地步，只隱忍自重的注視泰國的動向，在迫不得已中不能不採取暴力行動，於是目前受命而採取報復行動了，由這兩三天來我空軍數隊和砲兵的活躍，就是上面決意底表現……」

在這樣激戰中，法軍仍是戰敗國之本色，機運一點兒沒有進展，泰國仍然握着牠底新興國的勁力，一勝再勝，

在一月上旬突破柬埔寨國境，占領婆皮特市，老撾地方的國境也突破了，失地要求的一條湄公河岸的三角地帶也完全占領了。戰線從婆皮特到老撾國境延長至二百五十公里的地域，泰軍却在二十公里至三十公里的法屬安南境內進出着，這樣法國軍威一蹶不振的形勢可知了。

四、停戰與和議

十二月初旬日本當局曾向駐東京法大使安里，非正式的提出停戰與和議。但後來因為兩國紛爭更激化了，所以法使沒有什麼意思答覆，然而日本對東亞不幸事件的和平要求，一刻沒有放心下來，在一月二十日，松岡外相，正式向泰法兩國政府提議戰爭即時停止，以居中調停人為自任，後經兩國一致的允諾。於是在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便開始停止戰爭了。

兩國真確地認識日本的調停提議，明顯的表示牠對東亞共榮圈的指導地位，同時又認識英美在這次紛爭機會裏；漸漸兒策動與伸長牠們的魔手，使紛爭漸進至擴大化與深刻化。於是在兩國的諒解與認識中，一月三十一日三國代表在定泊在西貢洋面的日本軍艦裏，開停戰會議，一直到太陽向湄公河西面沉下去的時候，這紛爭底停戰協定十條規定的調印才完畢。

協定的內容是這樣；雙方軍隊由一月二十八日午前十時起，開始各後退離現在戰線十公里的地方。明確劃定兩軍占據地域，決定兩國軍艦在邊疆線上不得越過境界線，日本代表為協定實施的監視，目的在為兩國利益均沾的供與……等。

停戰協定雖然終結了，但仍不能對泰國的要求滿足，一方面必須要處理今後的永遠和平，為從長計議起見，於是再次相約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二月初旬，泰法兩國代表便搭日本航空會社的飛機，楠，磯風，櫻等各號，先後抵達日本首都東京，會議終於在二月七日舉行於首相官邸裏，當日松岡外相為調停主席委員，首先闡明此次開會的理由：

「我方爲着東亞全局關係，起而執行調停的勞役爲已任，發生此次調停，上面的意思是我國的決意及責任上問題解決的努力意向」。

繼着法國全權亞盧錫腦，安里公使，泰國全權旺威，哩也曼，哇拉宏殿下也說感謝辭，及希望協定的早日成立。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東京講和會自月一七日起，舉行了數次正式的會議和非正式會議，並且個別折衝協議，但是沒有得到完滿的結果。起初法國的態度十二分強硬，後來漸漸兒得到了些少諒解，認識強硬的要求並不是現在法國所採取的，於是在無力之中，仍以狡猾的手段，延宕這會議，想弄成僵局，停戰協定到現在止已經延遲了三次了，法當局的狡猾手段是這樣：

「去年夏，松岡及安里的協議結果，是對法屬安南的領土保全及安南主權尊重的意旨，但是今次的泰國向安南要求割讓，這不是與松岡及安里的協議的意趣相抵觸嗎？然而法國對這次協議却並沒有異議，且希望日本以公正的手段去交涉」。

戰敗的法國還是這樣狡猾，但這深謀遠慮的思想請可太苦了，然而日本當局對牠威脅脫行爲，一定不會放過他罷，且對於這會議一定要完滿的解決呀。

五、尾聲

這次的紛爭，日本爲着以指導東亞共存共榮的原則爲已任，及謀東亞永遠的和平，於是出面調停，欲使東亞各民族得到互相的諒解，又法國能夠施用狡猾的手段來延宕時日，這也是因日本抱有東方道義（王道主義）的表現。

法國的延宕會議也不是無因的，且看在東京會議的當兒，英國於緬甸及馬來半島的泰國國境集結了很多的軍隊似乎威脅泰國，不，那根本露出了向泰國停止議會的威脅，和援助法國的鬼面具來。又法國以保護安南爲名義，向美國要求飛機的供與……等。這種種援助法國的情勢，泰國會因此而畏懼嗎？不，東亞人已經看慣英美底威脅政策了，他們對歐洲戰爭中，自己還在岌岌可危的狀態中，那能再有力量來顧東亞方面呢。

然而法國執迷不悟，一味施行牠底延宕政策，以冀望東亞情勢的幻變，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若戰爭結束一遲，則安南人對此次的戰爭意義明瞭了及感到戰爭而發生的慘禍，和生活的恐慌，他們必定會掀竿而起，那麼國際情勢還沒有變幻，而自己却弄得手足無措，那麼深謀遠慮的結果，反落得一個弄巧反拙，因小失大的禍害。且這次法國的遲延，對東亞和平有極大的障礙，法國既不是東亞人，安南所以給牠領有，也只是軍事上奪得而已，所以在大亞細亞主義裏說「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那麼法國人應速解決會議，更且要退出這土地才行呢。

我們且再來談談泰國的要求，那是名正言順的一種要求，本來在他一提出時，法國應刻立即返還牠才是，反正自己已失了管理的力量了，且他也並不是過份的要求，這些土地，他們也會含淚吞聲，隱痛失去的，所以他們能夠勝利了，也正是東亞民族復興的星火，慢慢兒可以遼闊的發展開來。

為調停主持者的日本對此次會議有怎樣的思想呢！他們能看出法國的延宕是第三國的搗亂行爲，所以他們會發出很堅強的言論：

「若散布遠東危機，攪亂東亞和平策畧，牽制和平的調停底第三國，日本必抱一貫主義，努力將此魔手排擊，邁進東亞和平，與理想的貫澈。」

果然折衝凡一月之泰越調停東京會議，藉日本真摯之努力，卒於三月十一日完畢最後一次的會議後，於同日下午四時三國代表便舉行簽約。這歷史的糾紛的解決，不但是泰越兩國人民免除戰爭的痛苦，而且是東亞共榮圈各關係國走上光明之路的一個鉄証，也是東亞全面和平的更加發揚的光輝。

泰國之復境運動

菊生



一、

泰國爲南洋地方唯一的獨立國，不過是以緩衝的資格而保存的。泰國的國土，實爲英法二國侵削的殘餘，在英法勢力均衡下，確定以中部地方爲中立地帶，泰國就在這樣侵削之餘緩衝勢力下而存在着。稍明泰國歷史的人，誰也不能否認此事實。然以今日的弱小國家民族，處功利主義下的歐風美雨當中，求獨立與生存，其困難尤甚於春秋時代的魯鄭，春秋時代的魯鄭，介於齊楚之間，一方固由於魯鄭使聘折衝之力，以周旋於兩大；一方則以齊楚等霸國，仍未盡泯王道主義，對於弱小國家，倘能稍示就範，無敵對行爲，則亦未敢加以滅亡，現代則不然，自航海術與產業工業發達，歐人挾其砲艦與貿易政策向東南發展之後，菲洲及大洋洲一帶大陸島嶼，幾無當地民族獨立的片土，泰國雖則在緩衝之下而存在着，倘能一方利用國際錯綜複雜的環境，善爲外交上的周旋，一方激揚民族意識，根本剷除遺傳的封建勢力，同時瞭然於大亞細亞主義，與亞州民族切實提携，則雖在萬分艱難困苦之中，未始不可踏上復興的途徑。孟子說：「無內憂外患者，國恆亡。」泰國人民固也深明於此，察其前後復境運動，可知其民族

意識正在昂揚，一個國家，倘能保持其民族意識，必無被人顛覆的道理。今日因緩衝而獲存在的泰國，他日自有真正獨立自由的一天。本篇引述泰國復境運動，藉以闡揚大亞細亞主義，使亞洲弱小民族國家，明所以去就之道。

二、

一九三二年，泰國立憲革命成功，當時革命的對象，內爲封建勢力之專制王族，外爲帝國主義勢力的英法壓迫，以泰族民族國家主義爲基礎，求真正獨立與自由，廢君主專制爲立憲政治，當時泰人的革命口號，爲「泰人的泰國」，革命政府頒佈施政綱領六項；一、維護法權及財政經濟的獨立（獨立），二、維持國內治安（秩序），三、增進國民經濟福祉（經濟），四、確立國民平等權（平等），五、確保國民自由（自由），六、普及國民教育（教育）。一九三三年二度革命之後，操政權者似近於保守派，然而內謀復興外除重壓的運動仍不稍歇，內閣三迭，施政方針仍不變。

泰國以外的刺激，強化內的民族結合，其「收復失地」的概念，逐漸擴爲具體化，事實化，無任所大臣答侃氏，曾解釋泰國復境運動的理由——該氏以受到以下質問：「泰國內有未開墾的廣大土地，未暇致力建設，何以堅欲收回無鏽產及資源貧弱的土地？」，該氏爲泰國政府的發言人，其言辭即是代表政府的意見——其言如下：

1 吾人所失土地，並非外人的殖民地，完全爲我同胞所居住，同一宗教，同一文明。

2 此爲名譽的關係，吾人領土及財產爲法蘭西所奪，無論何時，不能承認。

3 平蒙首相有言：「吾泰人在此時期，如不能奮興，必遭滅亡。」此語誠感沉痛。現在的戰爭，到了結束時候，世界已無小國存在，所有小國將悉爲大國所併，吾人現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自己變成強國，一條是併入大國。如果收復失地，則有成強國希望，希布遜泰北部，有二千四百萬泰人及泰係國民，彼等皆意識着泰國國民，操着泰國語言，倘若收復，則領土與人口將大量增加。

4 領土收回後，若不亟謀如法蘭西那樣强大，他日又將被人奪去。

以上爲泰國激揚民族意識的過程，此次歐洲大戰，法國首當德軍電擊作戰之衝，客觀情勢的變化，不消說助長了泰國復境運動的動力，巴黎陷落四日前，泰國承認英法間不侵犯條約，而以要求鑑定新國境線爲交換條件，英國首先承認了以與緬甸交界的最深路水爲國境線的原則，並即時讓渡極小面積的地方，巧妙地避開泰國正面的刺激，法國亦承允交還湄公河上的小島嶼，然而因無誠意履行，結果使泰國追加了四個條件：

1 所有湄公河上的島嶼，一律交還泰國。

2 交回湄公河右岸之琅勃刺邦及帕克金兩地。

3 在老撾北部及附近，法蘭西如無能力統治而有讓渡於他國時，應先議與泰國。

4 老撾遇有困難事件發生，泰國官憲予以協助，法方應予泰方以審查此問題的參加。

然而以上要求被否定了，泰國的民族國家主義運動，對法在感情上對抗的意識，於是由思想進展爲實力的具體的實踐，而泰越國境紛爭，遂訴之戰爭行爲，戰線北自維田南至南海岸，蜿蜒數百公里，兩軍對峙，勝負未決，法印利用錫道山路水路的交通網，以巴塔邦爲一道防線，配置重兵，堅守柬埔寨，泰方則積極展開攻勢。

欲知泰國復境運動的開展情勢，不能不先明瞭泰越國境紛爭的原因，這裡有關於泰國歷史上失地的經過，界爲引述於下：

二、

泰國原爲暹羅國，即暹與羅斛二國所合併，暹與羅斛原爲占臘（西人稱爲吉箇帝國）國土，南宋後半期，始相繼崛起，羅斛人究爲何族不可考，暹即速古台，屬另一種族，其名爲歹夷（Tiba），自以爲來自北方西藏高原，元末明初，公元十四世紀中葉，暹併於羅斛，合建暹羅國，清乾隆時，曾爲緬甸所侵略，後由國人鄭昭復興，奠定暹羅王國爲基礎，受我國的冊封，列爲藩屬。暹羅與法人最初交涉，始於猶地亞末期，一六五七至一六八八年，布拉業王時代，即西歐勢力東漸最盛時代，當時荷蘭已在法國之先，壟斷貿易達四十年，一六六四年，荷蘭以通商特權的交

涉糾紛，派艦封鎖湄南河，泰國隻艦均無，迫得無條件承受全部要求，惟對荷極其惡感，祇以實力未備，捨利用第三國牽制外，無他途徑可尋，於是求之英國，不得要領，與葡謀無結果，最後，法國遂利用此機緣而着手覬覦了。

一六六二年，法國派宣教師模特 (De La monte) 到泰二年後又派柏魯 (Pellu) 前來，當時同行中有築城技師勞瑪斯 (Father Thomas) 為泰所知，遂大受招待，嗣後依其計劃，築盤谷，猶地亞，一名大城，謬塔布里數要塞以防荷蘭。當時泰灣深，巨艦可入盤谷附近，泰國以猶地亞近海，恐受威脅，遷都於羅布里，又依計建望樓。泰王且感其意，封以土地建築物，並准予建築教堂。法人誤以為國王信仰基督教已深，擬藉基督教以施侵略，說王廣佈宣傳，使泰民遵奉基督教，然而結果失敗了。法人更與權臣意亞森結托，藉防荷為名，派艦十六，載兵一千四百名，要求登陸盤谷，並駐防法人駐地之瑪爾維島，王不允，於時泰人深惡法人，指意亞森為賣國奴，且怨王，以拉亞為首，大起革命，捕殺意亞森，盡逐法兵出境，迫害基督教徒，法人慘淡經營的侵略基礎，至此受一頓挫。

十九世紀以來，法泰關係日趨惡化，泰國前後受法蘭西五次侵略，土地日削，失了國家自主性，今日不過在第三國勢力均衡之下，以緩衝的資格而成爲獨立國。

泰越第一次紛爭，爲一八六三年，發端於柬蒲寨（原名柬蒲寨國）。先是法人向柬蒲寨國王拿羅德穆請求，使柬蒲寨全境及湄公河上六個島嶼，併入爲法國之保護國，柬蒲寨王知無以拒，遂降法，與法締結條約，四年之後，於一八六七年，泰法遂訂立九項不平等條約：（一）泰承認柬蒲寨爲法保護領，（二）泰柬原約廢棄，（三）泰不得對柬征稅及要求朝貢，（四）塞木拉島及怕唐旁島仍屬泰，（五）泰柬雙方人民有旅行自由及貿易自由，裁判所各有裁判權，（六）法船有湄公河及海上航行的便宜，遇有困難問題，泰應加以援助，（七）法方有監督柬埔寨履行此條約的責任，（八）（九）略。此次紛爭結果，除塞木拉島及怕唐旁兩島外，泰國失了全柬埔寨及沿岸六島嶼，面積約一二四，〇〇平方公里。

一八八六年，法設置領事館於泰境，帕維民 (M. Pave) 任首任領事。同年，老撾邊境流寇作亂，在泰領內大事掠奪，泰即予以平定。次年，同樣事件再度發生，帕維領事幾罹於難，得泰人救援晚險，法人遂藉口保護，出兵佔

領邊地，時爲一八八六年，泰國因之再損失約八七・〇〇平方公里的領土。

越五年，帕維任駐曼谷領事，法人又以交涉湄公河左岸領土歸屬於安南爲名，出兵百營奔以沿湄公河此溯而上，破泰軍，加以佔領，泰以兵力懸殊，不得不放棄這些地帶。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三日，法人再以軍艦二商船一溯湄南河而上，泰方開砲轟擊，沉其商船，傷軍艦一，法遂調大軍到曼谷，泰人處此情勢之下，遂作城下之盟，承認湄公河左岸全領爲法領，賠款三千萬銖，成立兩國國境劃定條約，泰又失去約一四三，〇〇〇平方公里的領土。

當時，法以監督履行條約的理由，再佔領千塔濱，於是十年不退，泰國以千塔濱爲國防重要地域，要求法方撤退，結果，在一九〇二年，卒以柬埔寨及老撾境內之帕克金及湄公河右岸之琅勃列邦，與法交換，法接收兩地之後，仍遲遲不肯撒離千塔濱，過了一年，再佔領千塔濱東南約百里之托拉島，泰國一再交涉，始訂立一九〇七年條約，泰國將素木拉島，帕唐旁，希梳封三島割讓於法，收回千塔濱及托拉島。自一八六七年至是，法人前後五次侵畧，泰方共失了四六七、五〇〇平方公里。

一八八六年，英人既佔緬甸的全部，與法訂協商條約，法國對泰侵略史始閉幕，然湄公河左右泰越兩國境紛爭事件，仍迭起無已。泰人爲欲解脫英法兩重重壓，知非利用第三國不可，先之示意日本，設公使館於東京，要求日本作攻守同盟，聘日人爲顧問，而日人以時機尙未成熟，未予接受。於是轉而親德，藉機械工業敷設鐵道，至世界大戰發生，泰爲自身利益着想，加入聯協商國，德之勢力遂崩潰。戰後十五年間，泰國之政治軍事外交，爲英法所支配，文化事業，爲美國所支配，縱橫蹂躪，有獨立國之名，無自主之實，而一九三二年革命遂以發動。然泰越國境，究無確定，泰國之消長國運，正如湄公河的潮汐，無日可得一寧靜的歸宿，關於國境勘定事件，一九二六年泰法新條約雖有較明確的規定，然此不足以抑泰人「收復失地」的決心。一九二六年，泰法新條約計十八條，茲擇要引述於下：

泰法以湄公河爲國境，雙方以二十五哩地域爲非武裝地帶。

右非武裝地帶，雙方以相互維持民衆秩序。僅得設必要限度的警察力。惟如在必要時候，雙方得臨時增強警

察勢力，爲在近接非武裝地帶作警察行動，或與第三國有戰鬥行爲時，自國軍隊或資材輸送，得向自國地域通過，非武裝的軍用機，並可在非武裝地帶停留。

3 菲武裝地帶，不得施設要塞及其他軍事設施，與及軍用飛機場及彈藥庫等，惟日常使用之一般資材及非武裝軍用機必要之燃料貯藏庫之設置，不在此限，非武裝地帶得設置警察官駐屯所，並維持平時安寧秩序必要限度的防備設施。

4 第一項所規定之非武裝地帶，泰法雙方應急行會議勘定其境界線。

5 設置湄公河國境確定最高委員會，以辦理確定國境的事宜，惟該會措置，須得兩國政府的同意。

6 為防止紛爭，兩國應充分了解關於湄公河國境的種種問題，其了解事件如下：

一、湄公河因島嶼而分流的地方，應以本流的河床作爲國境線。

二、湄公河因島嶼而分流的地方，無論分流歲月之如何，應以最接近泰國方面分流之流床作爲國境線。

三、國境線如以土砂崩壞或冲積作用，致原始島嶼與河岸連接，或分流變化的場合，國境線應移於最接近國方面之分流流床。

在變化發生時候，應申請湄公河國境確定最高委員會實地調查，該委員會根據上述協定認爲確保變更的時候，則移國境線于本流最近之流床，惟特定的泰國地域則不得變更。

其餘各條從畧

…未完…



文化之新體制

大政翼賛會岸田國土著
文化部部長

紀江譯

(一)

所謂「文化」這句話，至今是很隨便的被使用着。可是「文化」究竟是怎麼樣的呢？就是到現在，仍有許多人的胸中裏，對所謂「文化」這句話，只不過是感到一些漠然的輪影罷了，且從不見有人將文化的本意加以探討和推敲。時至今日，能真正領略着所謂「文化」這件事的還不多，所以遂不能貫徹到國民生活裏的每一個角落裏面去了。尤其是最近有將「文化」嵌上一個可疑的名稱，即是「文化是怎樣的」，「文化是如何的」等等的一種虛構。不但止這樣，更有一些好自認爲先覺者之輩，往往巧立一種輕薄的語調，甚至在一些頭腦稍爲清澈的人們內面。也是感到文化是指生活富裕的有資階級，跨耀着近代趣味的一種裝飾，倘若說文化是沒有染着奢華的慈善行爲，沒有帶着麻醉的作用，這便是有價值的被聯想出來了。

但是「文化」的真正意義，並不是這樣的說法便算了——且是隨着我們身旁而是怎樣的使國民生活進展，自於那「生活的預算和生活的方法」是怎麼樣的呢？不用巧加修飾，實是文化的一種反映。

我們日常聚餐時所用的碗箸，便是我們的文化了，不過就算沒有此項碗箸，也可以隨意的吃着飯，並不因欠着某一些便不能彈動，但是這裏所說的使用碗箸等事，是世間生活文化姿態的表現，同樣的務須善於使用，若能臻至好便算是出衆的文化了，同樣的對各工具使用得宜，保管得法。則聚餐時是如何寫意的一回事啊！只是這樣已是一個優良健全的文化了。

(二)

照這樣的說法看來，便容易感到所謂文化是隨着我們日常生活左右的，文化若能健全的進展，則國民生活也隨之進展了，由此可知道倘若「物」「心」兩方面增強，也即是國力增強。

因為這個原故，大政翼贊會文化部由各方面，不論直接間接，以培養現代的缺陷文化，同時保守着日本固有的優秀文化，養育着日本固有的優秀文化，以作將來新生活所必要的準備。更進而尋求之，增長之，進而互相勉勵互以必死的努力繼續拓開當前的難局。現今物質雖然感覺得缺乏，那是當然的事情，是不能不暫且忍耐的，可是雖要忍受這樣的困苦生活，但仍希望國民全體，更為之振奮不已，故不能不應付明日的戰爭，為此之故，日本人同志們，不論怎樣也好，大家要互相抱着堅強的信念，切不可見死不救，在這種情形底下，我們集中所有的力量，各盡智謀，準備得更卓有餘，則更感到安心了。不過，大家尚要誠心誠意，不論政府也好，國民也好，明白現今文化的弱點所在而加倍努力，對於這方面尚感欠缺若干力量而覺不敷的原故，所以發演出今日的新體制，這樣的說法可就好了。由現時起，再不能因循了，官民協力，實現經濟翼贊，同時上下一體，使結成文化翼贊的美果，完成強力國防之體制，我們味嚼著這個意義，早些整理我們目前的生活秩序，為永遠計，不能不循世界文化之母胎，創立新國民文化。

日本在曩昔早有着優秀的獨立文化了，這傳統的馨溫的優秀文化，已一度顯現出現代的生活，一方採摘着海外的特長文化，兼之合理的消化，這才誇耀着我們正當的天賦職能，樹立東亞新文化為當前之急務的，而且更應加以反省。對所謂現今的政治，國民大部分所發生的感覺，以為政治只是交給政治家們，國民對政治漠不關心，實是永遠的錯誤。

今在確立新體制之初，政治和民衆的精神至今尚離得很遠，而是沒有政治的念頭，照理說，真正萬民翼贊這個名詞的價值，是一種光明正大的政治。在那裏，首先是應該表現出日本那樣的日本姿態，我們至今は清徹地，令衆

人之力而徐徐使之實現。

根據那種情形，我們有首先改造和樹立我們日常生活的必要，致詳細的具體方法，接着繼續發表之。

(二)

奠定國民生活的根基，使自然而然的進展，所謂學問藝術，雖然各有各部門的專家，為國民全體之責任計，對此實有着助長之意，而使之更發達。

時至今日，不論在什麼地方，學問藝術與國民之一部分裏面是沒有關聯的那種看法看來，則會感到各部門各專家是太狹小了，社會的組織和設施，是有着不普及和不徹底了。但是，一方面國民全體，對重大的事故沒有要求為最大原因。

於是我們互相使生活上更為之豐滿，更使之有秩序化，則必要從根本上改善之。即是有有些是自掃門前雪，也有些是只為着自己家族，而不去開拓之，各人在世界的人格智慧，為國民者，務要修身正德。對這強大的日本，正直的日本。美好的日本為生出強大的信念，即是在世界之中擇選着一件事情，而是盡自己的才能力量做去，注重人類人格，就是對別民族的面局加以幫助，每一個日本入，若不使人類生出尊敬。則沒有分擔國家命運之資格了；這「人間人格」非積有相當學問不可，如沒有相當的學問，則不能說是委身于藝術了。不過，由於自然貫通學問，要使用淳朴的頭腦，很快昧着藝術的感動，發出豐滿的心情的養育力。

在近衛首相的聲明有「臣道實踐」這句話。國民各盡各職，各站各位，赤誠奉公，不得違背，且在那句話的深長意義上，每一個日本臣民，思想和行動上，都要徹底完全表現出國體的尊嚴，和歷史的精華，對于此我們是有著確信的行為的，若換一句話說，是以真正日本人的地位，高瞻遠視，以親切崇敬的樣子，對於自身是「令人欽佩」和「威嚴凜凜」

(四)

但是，大政翼賛會文化部，既然向着這個大目標，仍冀全國民協力起而推行這種運動。

爲着那樣，所有「文化部門」及被稱專門領域之總動員——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宗教，新聞雜誌，播音事業，出版界，醫療衛生，體育娛樂等之廣闊範圍，每個都加上強力的組織，更進而綜合統一之，繩結共同之國家目標，使果能分配及推進國民生活之指導。同時提高各個的水準，獎勵之，指導之，援助其活潑地工作，而要定規着民族永遠的飛躍和發展。

這種理想並不是模倣某某外國的形式便算了，而是祈願我日本之獨自意志，差不多完全是那組織的性質，運用的機微，兼之若非理解我民族性是不可的。

當隨各部門編成之際，不是徒然側重單一個組織，既存的有活動機能的特色團體，必須使之相應純化，且十分尊重各個創造使命的方針。

不過，雖屬同一專門，依舊不墨守孤立，沒有格格不相入的樣子，脫離不合理的狀態，這是感覺到最重要的，一方面謀各專門部門有機能化，而另一方面對各部門自身的一種榮養不良加以注視，原因是使國民文化全體健全的發育，是事實歷然的了，這是不能隨便下去的。

文化部應該更有逐次使各職域部門，縱橫連繫之必要，促進各個緊密的共同作業計劃。

這便是使全文化機構再編成。至于運用方面，使適應國家政策，這不僅是容易辦到，而且是在自主的活動着。國民生活一日比一日安定，一天比一天有規則，時時有着中心思想，刻刻施以刺激，這便是國民生命中的支柱了。

因爲智識在無形中增加了，則有着正確的判斷，工作能率增强，有着充分的休養，娛樂是相當普及，體無疾病，家無憂慮，隣里親睦，像上面所說那樣幸福的日子，我們想信是必有的，而不是鏡花水月那樣虛幻。

依據書物出版配給之合理化，恐怕是容易辦到的吧！紙畫劇和電影更使之趣味化，使誰也喜歡去看的樣子。

在農山漁以村的地方，給興奮的歌謡，向那些邊鄙的地方，時常組織流動演藝隊去巡迴表演。衛生設施，酌加完備。衣食住的問題只是經濟方面時的機問題，貨物平穩，則精神暢快，食物份量雖然少，但調理得美味，而是選擇比較適合身體營養的食物。安然居在狹小的家裏等一切問題，國民際此是應該解決的。

和農賛會生活指導部協力，關於這些事情，在文化部或專門家裏面，已動員開始着手研究的了。

(五)

日常生活若能臻潤達明朗，只是國民各自自努力，想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文化部提供各種各項提案，于是為指導者的藝術家、科學家等，想自有自動參加的可能吧！

國民生活有着秩序的狀態，則是開始開着時代的文化的美事之花了。

我們為完成現在正進行中的戰爭大事業，我們盡我們所有的文化力量，而要將之活用起來。更由明日起，作成巨大國家的配備，由今日起，非立即着手準備不可。日本的世界地位，使其為合宜雄渾的國民文化的原素。

元來我民族(日本)的傳統，一文個化的天才創造，不是相互被挾在財力或受財力所惠給的，像各個時代那樣，依歲月的鑿鑿而被削減，由此可知是憑萬能的双手所造出來的，故積了有許多天衣無縫的名貴作品了。

日本文化的精髓，感到實是心與心間所繫，力與力間相積，是「個」與「衆」中間埋沒了生命的泉源所得的基調。

民族的天才，是衆人的歸宿，寧可說是蘊在國民歷史的一個時期所生出來，若依這樣的看法，在我國發展當中，專門家如是割據孤立，便無意味的了，國民是有一致協力的必要。

大政農賛會文化部，不僅是政府方面和關係官廳的表裏一體，而遂行其職責，而打算是關於文化各職能部門的綜合事務局的責任。



和平傘下的民衆對策

林无邪

一、中日事變的發生，完全是由彼此的誤解孕成，「猜忌」和「疑心」是最要不得的，渝府對日本的敵對觀念，完全是根據這個心理而發生出來；因此往日汪先生所主張和平議論及中日務要誠意合作的理由，都爲了這個惡心理的觀念而無能發展。因而遂結成今次大事變的心理的素因，這是殊堪痛惜的。須知汪先生及其同志的言論是替中國而言的，常包含了警醒與告誡那對於日本有猜疑和排日抗日的謬誤見解。

誠然，國民革命成功以後，蔣氏即利用那倡盛起來的民族意識，以做其個人的英雄作爲，但是，中國國民的對日疑惑，和那日本欲覆亡中國的危詞，完全都是當時政府乘着民族解放運動的風潮而做成的驚人宣傳效果。

根據復活共政策的國民政府，竟公認共產黨爲激揚民族解放意識的絕好幫手，其所謂抗戰建國實甚矛盾，但在今日這正是以爲足以蠱惑和愚弄民衆而生的指導標語了。這以抗戰而建國的標語，驟看來，似乎是有無限的勇武，但這都不過是一種離開國力與國勢科學的省察，而祇是一種文學上的快感而已。其絕無反省地領導國民以抗戰的意識，確是不可思議而又不可能的事。但，這祇在於中國，而且是中國民衆的表現。所以仇視日本的藉口，是以爲日本的侵畧中國是會有滅亡之憾，所以要抵抗侵畧而不得不排除之以救亡圖存，這即其所謂抗戰救國。是渝府對民衆的唯一指導標語，關於這一點，我們是不能不細細加以思考的。

浸透於中國民心的抗戰意識，是擁有那「談虎色變」的原因，共產黨更利用之而獲得那將計就計的狡猾效果。所謂蔣介石的絕對統制力及蔣派軍隊之如何優秀，假如沒有其抗戰意識與民族意識兩方面去籠絡民心時，那麼其微末

的實力，照理是不能繼續到現在的。蔣介石的獨裁力是決不致有多大的效果，同時蔣氏直轄的兵力也決無力作何等的活動。共產黨却又極力煽動起悞的用民族精神與亡國恐怖的錯思想，使之澎湃於國民心裏，並且牢固其一貫的抗日觀念。

這將如何引導其歸的於正當方向呢？怎樣給與其民族的反省？如何才可轉移與擺脫其由抗戰建國而陷於抗戰亡國的現實的民族間大慘事呢？現在是當然有糾正這一點的巨責了。

二、關於這個問題，大約可有兩個方法。（一）是期待着那煽動抗日意識的中樞部的崩壞；（二）澈底矯正國民所誤染的排日思想。

這將採取何種行動，可否兩者併行，及政策的重心將置於何方呢？這是今日的重大問題，而且是必要的課題。

日本是毫沒敵視中國的國民的，在事變當初所屢屢發出的聲明來看，都沒絲毫的敵對觀念，在日本的華僑，我們從多方面的觀察，可以知道，所有在日本的華僑都仍照常的安心樂業，與日本人同一的安居樂業，安閒地去經營其日常生活，如最近在日十萬華僑的大同團結，却促進了全日本華僑總會的結成。但重慶方面對日本則似乎不盡明白，祇固執着仇視的態度，而沒有彼此共榮的熱心，反過來看，我們在日的十萬華僑，是自由的居住着，營業着，與自由地旅行着，繼續保存着其產業的現狀，那些在日本各地的華僑會，今次總會結成的事實，我們中國的子弟在日本的小學校裏，都是與事變前一樣地受着與日本人子弟一同的教育，毫沒歧視。所有在日華僑的資產都儲蓄於日本的銀行，完全與日人受着同等的待遇。他們的財產，在這樣狀態下，是完全受到極安全的保護。

、互三年間，在日本十萬華僑的現實生活狀況，不論何處，對於重慶方面，或第三國方面，豈無以真實相傳聞嗎？這種種的事實從來是沒有粉飾的必要，他們祇有安居樂業，與日本國民享受着同一的待遇，這日常的事實，無論那一點都足以給第三者以顯然的認識了，但在中國最高水準的機關報如大公報等，是全不據事實而立論，這是不大的。無論怎樣，這種新聞人員的偏執與讀者們的缺乏判斷，這都是文化低度的表現吧！渝府的執政者與新聞的代表者，對於自己國民，在其絕對敵視的日本國裏，是受着如何的待遇？照理是應該比任何的事還易早點明白吧。所

以日本却不必認為有把這事實通達於渝府及其機關報的必要。就祇恨在渝府的欺瞞宣傳下，國民都無從得着真相，這是最堪遺憾的事。所以凡知得到日本對中國的親睦行爲的，都應該對其在惡宣傳範圍下的家族與親朋戚友們，把鄰在日華僑的安全事實盡量地告訴他們，這就是目前最重要的責任了。

自國府還都以後，尤其中日調整邦交以後，是充實中國國民政權的實力，以完成中日的和平，這是中日有識人士的一向途徑，我們是要繼續努力的。尤其是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去把握民心。如在日本的十萬華僑，在事變中雖然聽到重慶方面的惡辣宣傳，但却絲毫無動，對於日本的真誠友好，都甚為悅服，那正是民心的自然歸向，是以事實去把握民心。倘若民心不能把握，那麼就無論政府的如何設施，你也莫想其效果的優良。

這個重要的問題，當然的是我們今日最大使命啦！同時，日本也應有絕對協力的責任。因爲在某一點的地方，是有共同責任的性質的，所以單獨中日兩方面的任何一方面來說，簡直是無解決的。

三、現在建國的第一個階段已告完成了。國民政府首先是要對重慶方面的國民，使其認識和平達成的事實，今日的和平仍是局部的和平，但，這局部和平的實現，是即給與重慶方面那企求着和平的國民以一種絕大的現實的教訓，所以對於這和平實現化的前提基源，以促使各個國民的反省。

從抗戰建國的自潰政策，向着和平建國的復興作用上，促進國民對於過去及現實的事績，發生出一種自我的批判力，但彼此自己的反省，是比什麼都更爲困難，然和平實現的實際教訓，是即對付這個困難的最大手段，是克服其困難的最強力的武器。如獲得重慶治下民眾的反省與批判力時，這纔是能把握着真正的民心，及能達成和平建國的第一步的時候。這不用說都是我們今日的第一目標。

從方法上來講。則渝府的撤消與民心的把握，是可以分開兩方面來說，但，歸着於確保和平的大局上，那却又是二而一的了。

渝府崩潰後，其所治下的國民，就必然同趨於汪主席的和平建國方針，這是自然的現象。又假如重慶方面一日脫離了人心，那麼，其政權的土崩瓦解，也就必然可期。所以這兩途的終點，是得着同一結果的。所以首先要專

意於民心的把握，而向着這一方向要有拼命邁進的必要。

即是要以事實去糾正重慶治下民眾那抗戰建國的謬誤思想，而引導之於和平建國的大道上。我們假如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要把握着國民的生活問題，換言之，即要有確保民衆的和平的必要。民衆的生活保證，就是以那安全的保護及治安的確保爲先決的問題。

在抗戰建國的欺瞞宣傳下，要引導那民族意識復歸於和平建國的正軌，那麼，是要有事實和時間之必要，事變前一年的廬山會議，是以蔣介石爲中心的「抗日必勝」政策而策定，在事變半年前的西安事件，爲了代價蔣氏獨裁者自身的生命，於是遂復歸於容共的政策，繼而又張開了抗日的共同戰線，從事變一年前，他們軍事首腦部的腦裏，早就以抗日爲時論了，那時即開始了抗日的巧妙宣傳。在完全的統制下，所有的宣傳機關就無論文字上或口頭上都一意指導於抗日，這一種宣傳的效果，正好把國民煽起其熾烈的情緒，把整個的國民完全麻木地浸潤了。從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觀察得到，民心把握，是伴着相當的困難。

但現實的問題，却是以民衆的生活問題爲目下最重大的公案。同時，抱着絕對協力者的日本對於這一點，亦應深加理解，排除一切的障礙，在可能的範圍內，要有忍受多少犧牲的必要。

戰區民衆的生活，如何纔可得到適正的維持與擁護呢？，在戰爭的進行與戰局的擴大中，民衆的生活保證，是殊不容易的事，這個實際的問題，却是真正爲難的課題。但這困難的課題，是無論如何都必須加以解決的。在當事者中國政府方面，及協力者的日本方面，務必要找着現實，在一面戰爭中，不正當地處置和平是不行的。這是一件最難的事，同時又是一件不能不加以解決的事。假如對於那現實的認識有了深刻的印象，那麼，就可以獲得兩全解決的可能。

四、國民政府對內的基調，却是民衆的問題和民衆的生活保證，也即是把握民心的結果。有了民心的把握，纔可以說是有和平救國的可能，纔可以給與和平建國以一種的現實性。

這對內基調的具體政策，汪主席在六全大會，早就向國民揭示了憲政的實施了，中央政府還都後，即又設立了

憲政實施委員會，在最短期間內，即公佈憲法的制定，宣言現在已終止了訓政的時期而轉入憲政時期的旨意。就這一點，比之重慶方面的獨裁的政治，真是有上下床之別，何況實施了憲法，在以立憲民主國的實體上，當然是有其完全的全民政治的實質在，關於這一點，給與重慶方面物心兩面的影響是甚大的。但，這已入了憲政期的基礎體制，當然是在民衆的身上，假如沒有民心的歸附，那麼憲法就仍然是一紙的空言罷了。所以最切要的，是要去把握民心。

汪主席在最近的期間，認爲憲政是建國的第三個階段——第一軍政，第二訓政，第三憲政，他深感個人獨裁的誤國，所以是一刻不猶豫的極力於憲政的實施。而真正的憲法，若無廣大的民主勢力以爲其基礎是不可能的。得到了民衆勢力的基調後，憲政才能開始發達。若蔑視民主勢力而一意強制實施其憲法，那麼不但不能得到憲法之效，反而必會造成其逆效果的。

「以廣大的民主勢力爲基礎」。這是汪主席所言的。那是即要迅速地去把握着民心而造成其強固的基礎。同時，無論如何，這當然都要以那多數民衆的生活保證置於第一步的努力。

近來從現地的消息，都頻頻地傳着民衆生活的不安狀態。這不單是限於南北的戰區，就是重慶方面的民衆，也陷於極度塗炭之苦，與戰區內民衆的不安生活相較，恐怕還慘淡幾倍。但，這都是重慶方面的問題。我們先來說說吧，戰區內的民衆，即在國民政府治下的民衆生活的保全，已成爲吃緊的事了，所以國民政府對內政策的根幹，是要有急速樹立之必要。

在戰事進行期的南北諸狀態的不融通性，是戰區民衆生活的維持上，給與以障礙的事實，如以前維新政府統稅局的突然頒發禁止上海小麥的輸出等，就爲了這個原因，所以北方的民衆就受到了不安的生活。這些都是不圓滑性的代表現象，但，中央政府完整後，這種不合理的事情，當然是可以期其消解的，一方面，又在戰區內的民衆生活，直接間接都受到了不少違反新秩序之流所威脅。與民衆方面浮浪之徒相結托，向民衆行揩取的行爲，這一種人的存在，是爲正義之大敵，斷乎是要加以排擊的。對於這些徒顧私利而不顧任何之犧牲的惡辣暴戾之徒，中日兩國爲

爭共存共榮計，是不能不加以清掃。這正是真正協力者的日本所堅執的最初底態度。

在我國方面的有識之士，是以爲從戰爭所受之禍害，是不於蒼天災，蔣介石苟再抵抗，則日本也定懸軍萬里，而難免進兵於中國的，這是民衆所觀望得到的吧。所以國民都無不怨恨蔣介石。但，在收拾局部的戰爭而招來和平狀態的地區，以其能安居樂業的事實，當然是可以獲得民衆的信賴。

五、汪主席的和平方針，是從局部的和平向着大局的和平移進。汪主席當初在重慶政府時，也曾建議過措置大局的和平旨意。那即是要求渝府放棄抗日政策，而立刻停戰以維持東亞的大局。而重慶方面却不容納這賢明的建議，反益加顯逞其抗戰的意念，夢想其最後的勝利，以抗戰建國的口號而騙其治下的民衆立於抗日戰線之上。是以汪主席不能不棄脫其大局和平的建議方針，親自邁進於其和平建國的新方針，這和平建國的基調，是即保持戰區民衆的生活，這是當然的道理。即中央政府的對內方針，首先是要保證其治下民衆的生活，藉的獲得民心，根據憲政的實施而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全民政治的顯現，爲其目標，對國民所揭示了的實施憲政的精神，也是在於這裡。

但，倘若把握不着民心，那麼憲法就祇是一紙廢詞而已。又若不能保全治下民衆的生活時，則其國民仍是未能入於憲政統治之下。即他們的生活不能保證，則治安亦當然無能維持，民主政治也絕對不能實現，無論如何，在民衆的生活保持上，新政府是一傾其全力的。日本對此，是也決給與實質的協力。其對象的大小不必問，排斥所有的排斥，再開始加以正確的檢討，這是協力者所應有的。民心必然的歸向，在這裡將可見其源源而來。



清代宰輔考略

邱盤根

予向嗜史學，對於清代文獻，尤深致意。曩歲，清史館館長趙次珊氏，（爾巽）於謝世前一載，已將「清史稿」纂成列印。但因奉令中止發售，遂未流通社會。研究清代故實者，莫不引以爲憾。客歲憂居杜門，嘗博考清代官私著述，輯成史料若干則，此篇即其一也。平日陷於見聞，參攷書復感缺乏，罣漏在所不免。爰加整理，陸續發表，以與談清史者共商榷焉。本所紀，祇爲概括之論述，至於諸相之賢奸功罪，具詳正史本傳中，非淺學庸愚所敢下筆也。

節 目

- 一、設職之沿革
- 二、宰輔題名錄
- 三、居位長久者
- 四、協理大學士，與額外大學士
- 五、協辦未晉殿閣者
- 六、遭降革者
- 七、陷刑辟者
- 八、更易最多及最少之年次
- 九、開國宰輔與亡國宰輔
- 十、狀元宰輔與帝師
- 十一、易名及出身
- 十二、人才之地域分布

一、設 職 之 沿 革

清沿明制，不立丞相，即以殿閣大學士充之。當瀋陽建國時，制甚度簡，官秩未備。迨天聰末，設內三院以位降臣，及一般漢籍職官。明思宗殉國，多爾袞領兵入關，清帝世祖，遂主中國。自順治二年而後，經范文程、洪承疇、劉體、馮鋐等所擘劃，就明代政制，斟酌損益，建置日多。而爾時所謂內三院大學士，即朝廷之相職也。第順

、康、雍三朝，名目雖有定額，實際則無定，故缺常不滿。而滿籍漢籍，亦隨時擢用，屢有多寡，不盡按缺授職也。至乾隆中葉，始有以各部尙書，或各省總督，授爲協辦大學士者。於是殿閣大學士爲正，協辦大學士爲副，滿洲蒙古籍居其半，漢軍及漢人居其半，蓋定爲四正二副，世又稱協辦爲亞相，或稱協揆。然自得協辦以後，即以相國稱之矣。入相之資，初不甚嚴，故有以禮部啓心郎，吏部侍郎，翰林學士，左都御史，及各地駐防將軍等職除授者。自有協辦以來，則多以六部尙書或各省總督除授，而理藩院尙書稍次於六部，故以是職晉協辦者，前後祇有一人，其以巡撫特擢者共有二人，實爲破格之異數矣。順治初元，所設內三院大學士職，爲內宏文院大學士，內祕書院大學士，內國史院大學士。其員額歷常，大率六七人，漢滿多半。三院大學士之外。復有建極殿大學士，當時以謝陞任之，謝去後，此職亦不再見。順治五年九月，又改內三院爲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大學士職。十八年六月，仍復舊制，設內祕書院、國史院、宏文院各大學士。康熙九年八月，又改內三院爲內閣，仍設中和、保和、文華、武英等殿職。雍正末，漸有署大學士，額外大學士，協理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等名稱。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裁中和保和二殿，增入體仁閣，定內閣大學士爲漢滿各二人，而協辦尙無定額。至十四年，再更定殿閣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遂相沿爲例。而體仁閣與東閣，或授此缺彼，或授彼缺此，故相臣恒以六人爲足額云。第自設立軍機處以還，國家大計，均由軍機處主持，開臣若不兼軍機處職務者，祇在畫諾而已。宣統間，以各省人民團體，羣請提早立憲，將施行年限縮短。清廷鑒於民情迫切，亦迭次降旨，爲立憲預備之設施，漸將各省官制更易，續設新職。並參照東西各國之責任內閣成例，改組爲新政內閣，先設內閣政務會議處，爲改閣之預備。至宣統三年四月，新內閣成立，授慶親王奕効，爲國務總理大臣，毓朗爲協理大臣，其餘各部大臣，參與內閣會議，均稱國務大臣，是爲當時最高政務機關。其各殿閣大學士，及協辦大學士，僅存職銜，無事可理。尋復有裁，着將各大學士職列於翰林院及弼德院。嗣武漢事起，清廷起用袁世凱，並欲緩和民氣，避免親貴用事，乃罷去奕効，另授袁爲總理國務大臣。且由政院表決，以昭鄭重。至各部大臣，亦多以漢員任之，然大勢已移，各部大臣多不就職，袁氏之內閣，亦祇等於曇花一現而已。

一、宰輔題名錄

滿蒙漢軍所隸各旗諸書互有出入不及詳漢臣群臣較詳故備列
又諸臣得諡者并附注

順治朝 范文程(謚文肅，漢軍)馮林(滿籍)馮銓(謚文敏，順天涿州)洪承疇(謚文襄，福建同安)謝陞(謚清義，山東德州)甯完我(謚文毅，漢軍)祁世格(滿籍)李建泰(山西曲沃)宋權(謚文康，河南商邱)希福(謚文簡，滿籍)陳泰(謚忠襄，漢軍)雅奏(滿籍)陳名夏(江蘇溧陽)李率泰(謚忠襄，漢軍)額色赫(謚文恪，滿籍)陳之遴(浙江海寧)高爾儀(謚文端，漢軍)圖海(謚文襄，滿籍)成克章(直隸大名)張端(謚文安，山東掖縣)劉正宗(山東安邱)呂官(江蘇武進)金之後(謚文通，江蘇吳江)蔣赫德(謚文端，漢軍)王永吉(謚文通，江蘇高郵)黨崇雅(陝西寶雞)傅以漸(山東聊城)巴哈納(謚敏壯，滿籍)車克(謚文端，滿籍)胡世安(四川井研)衛周祚(山西曲沃)李爵(謚文勤，直隸高陽)伊圖(謚文僖，滿籍)蘇納海(謚襄愍，滿籍)

康熙朝 孫廷鉉(謚文定，山東益都)巴泰(謚文恪，漢軍)魏裔介(謚文毅，直隸柏鄉)班爾布善(滿籍)對喀納(謚文端，滿籍)杜立德(謚文端，直隸寶坻)索額圖(滿籍)馮溥(謚文毅，山東益都)莫洛(謚忠愍，滿籍)慤賜履(謚文端，湖北孝感)明珠(滿籍)勒德洪(滿籍)王熙(謚文靖，順天宛平)黃機(謚文僖，浙江錢塘)吳正治(謚文僖，湖北漢陽)宋德宜(謚文恪，江蘇長洲)余國柱(湖北大冶)李之芳(謚文襄，山東武定)梁清標(直隸正定)伊桑阿(謚文端，滿籍)阿爾泰(謚文清，滿籍)徐元文(江蘇崑山)張玉書(謚文員，江蘇丹徒)李天馥(謚文定，安徽合肥)吳琪(謚文端，山西汾州)佛倫(滿籍)張英(謚文端，安徽桐城)席哈納(滿籍)陳廷敬(謚文貞，山西澤州)李光地(謚文貞，福建安溪)溫達(謚文簡，滿籍)蕭永藻(漢軍)嵩祝(滿籍)王拔(江蘇太倉)王頊齡(謚文恭，江蘇華亭)白潢(漢軍)富甯安(謚文恭，滿籍)

雍正朝 張鵬翮(謚文端，四川遂寧)徐元夢(謚文定，滿籍)田從典(謚文端，山西陽城)高其位(謚文恪，漢軍)朱軾(謚文端江西高安)張廷玉(謚文和，安徽桐城)遲桂(滿籍)蔣廷錫(謚文肅，江蘇常熟)馬爾賽(滿籍)福敏(謚文端，滿籍)鄂爾泰(謚文端，滿籍)彭維新(湖南茶陵)嵇曾筠(謚文敏，江蘇無錫)三泰(謚文恭滿籍)徐本(謚文穆，浙

江錢塘) 邁柱(謚文恭, 滿籍) 查郎阿(滿籍) 巴泰(滿籍)

乾隆朝 訥親(滿籍) 趙國麟(山東泰安) 陳世倌(謚文勤, 浙江海甯) 史貽直(謚文靖, 江蘇溧陽) 劉於義(謚文恪)

江蘇武進) 高斌(謚文定, 滿籍) 慶福(滿籍) 來保(謚文端, 滿籍) 傅恒(謚文忠, 滿籍) 阿克敦(謚文勤, 滿籍) 陳大受(謚文肅, 湖南祁陽) 尹繼善(謚文端滿籍) 汪由敦(謚文端, 浙江錢塘) 梁詩正(謚文莊, 浙江錢塘) 張允隨(謚文和, 漢軍) 孫嘉淦(謚文定山西興縣) 蔣溥(謚文恪, 江蘇常熟) 黃廷桂(謚文襄, 漢軍) 達爾黨阿(滿籍) 鄭弼達(謚文公, 滿籍) 劉統勳(謚文正, 山東諸城) 光惠(謚文襄, 滿籍) 楊廷璋(謚勤恪, 漢軍) 劉綸(謚文定, 江蘇武進) 楊應璗(漢軍) 阿里袞(謚襄壯, 滿籍) 陳宏謀(謚文恭, 廣西桂林) 莊有恭(廣東番禺) 官保(謚文勤, 滿籍) 阿爾泰(滿籍) 溫福(滿籍) 于敏中(謚文襄, 江蘇金壇) 舒赫德(謚文襄, 滿籍) 李侍堯(謚忠毅, 漢軍) 程景伊(謚文恭, 江蘇武進) 阿桂(謚文成, 滿籍) 英廉(謚文肅, 漢軍) 姜璜(謚文恭, 浙江錢塘) 三寶(謚文敬, 滿籍) 永貴(謚文勤, 滿籍) 蔡新(謚文恭, 福建漳浦) 伍彌泰(謚文端, 蒙籍) 梁國治(謚文定, 浙江會稽) 和坤(滿籍) 劉墉(謚文清, 山東諸城) 福康安(謚文襄, 滿籍) 王杰(謚文端, 陝西韓城) 彭元瑞(謚文勤, 江西南昌) 孫士毅(謚文靖, 浙江仁和)

嘉慶朝 董誥(謚文恭, 浙江富陽) 蘇凌阿(滿籍) 保甯(謚文端, 蒙籍) 長麟(謚文敏滿籍) 慶桂(謚文恪, 滿籍) 曹麟(謚文勤, 滿籍) 吉慶(滿籍) 琳甯(謚勤僖, 蒙籍) 朱珪(謚文正, 順天大興) 紀昀(謚文達, 直隸獻縣) 劉權之(謚文恪, 湖南長沙) 費純(謚文恪, 浙江錢塘) 祿康(滿籍) 戴衢亨(謚文端, 江西大庾) 勒保(謚文襄, 滿籍) 松筠(謚文清, 蒙籍) 鄭炳泰(江蘇無錫) 曹振鏞(謚文正, 安徽歙縣) 託津(謚文定, 滿籍) 百齡(謚文敏, 漢軍) 章煦(浙江仁和) 戴均元(江西大庾) 伯麟(謚文慎, 滿籍) 吳璵(浙江錢塘)

道光朝 長齡(謚文襄, 蒙籍) 孫玉庭(山東濟寧) 英和(滿籍) 蔣攸鉛(漢軍) 汪廷珍(謚文端, 江蘇山陽) 富俊(謚文誠, 蒙籍) 盧蔭溥(謚文肅, 山東德州) 李鴻賓(江西德化) 文孚(謚文敬, 滿籍) 阮元(謚文達, 江蘇儀徵) 潘世恩(謚文恭, 江蘇吳縣) 穆彰阿(滿籍) 王鼎(謚文恪, 陝西蒲城) 瑚善(謚文勤, 滿籍) 伊里布(滿籍) 湯金釗(謚文端, 浙江蕭山) 賀興(謚文莊, 滿籍) 奕經(滿籍) 卓秉恬(謚文端, 四川華陽) 敬徵(謚文襄, 滿籍) 陳官俊(謚文愍山東濰縣) 看英

(滿籍)祁雋藻(謚文端，山西壽陽)賽尚阿(滿籍)

咸豐朝 杜受田(謚文正，山東濱州)裕誠(謚文端，滿籍)訥爾經額(滿籍)禱恩(謚文莊，滿籍)賈楨(謚文端，山東黃縣)文慶(謚文端，滿籍)葉名琛(湖北漢陽)桂良(謚文端，滿籍)彭蘊章(謚文敬江蘇長洲)柏陵(蒙籍)翁心存(謚文端，江蘇常熟)瑞麟(謚文莊，滿籍)官文(謚文恭，蒙籍)周祖培(謚文勤，河南商城)肅順(滿籍)

同治朝 欽魁，(謚文端，滿籍)倭仁(謚文端，蒙籍)瑞常(謚文端，蒙籍)曾國藩(謚文正，湖南湘鄉)駱秉璋(謚文忠，廣東花縣)，朱鳳標(謚文端，浙江蕭山)李鴻章(謚文忠，安徽合肥)文祥(謚文端，滿籍)單懋誥(謚文恪，湖北襄陽)全慶(謚文恪，滿籍)左宗棠(謚文襄，湖南湘陰)寶鋆(謚文靖，滿籍)

光緒朝 英桂(謚文肅，滿籍)沈桂芬(謚文定，江蘇吳江)鈞桂(謚文勤，滿籍)載齡(謚文恭，滿籍)文煜(滿籍)李鴻藻(謚文正，直隸高陽)額勒和布(謚文勤，滿籍)恩承(謚文恪，滿籍)崑岡(謚文端，滿籍)閻敬銘(謚文介，陝西朝邑)福錕(謚文端，滿籍)張之萬(謚文達，直隸南皮)徐桐(漢軍)麟書(謚文恪，滿籍)榮祿(謚文忠，滿籍)翁同龢(謚文恭，江蘇常熟)孫家鼎(謚文正，安徽壽州)剛毅(滿籍)王文韶(謚文勤，浙江仁和)崇禮(漢軍)徐鉉(江蘇常熟)敬信(滿籍)裕德(謚文慎，滿籍)張之洞(謚文襄，直隸南皮)榮慶(滿籍)瞿鴻禡(謚文慎，湖南善化)邢桐(滿籍)鹿傳霖(謚文端，直隸定興)世續(滿籍)

宣統朝 陸潤庠(謚文端，江蘇元和)戴鴻慈(謚文誠，廣東南海)徐世昌(直隸天津)李勉林(山西大同)共計五百二十二人，漢籍一百二十三人，滿籍九十八人，漢軍二十人，蒙籍十一人。

三、居位長久者

清代十葉中宰輔，居位最久者，當推李鴻章。自同治七年，以湖廣總督督辦，後爲直隸總督，十三年授文華殿大學士。以後或持節在外，或參政樞垣，晚年更拜勳督之命，但不久仍被召入京主持辛丑和局。計自協辦以迄辛丑，凡歷三十四年，洵屬一朝無兩矣。此外馬齊則任職三十一年。李鵠、張廷玉各二十五年。傅恆、曹振鏞，各二

十三年。圖海二十一年。王熙、阿桂、託津，各十九年。洪承疇、史貽直、長齡、來保、瀦世恩，各十八年。陳世倌、劉統勳、和珅、慶桂、賈楨，各十五年。鄂爾泰、官文，各十四年。車克、巴泰、齊郎阿，各十三年。明珠、左宗棠，各十二年。其餘十年八年者，則指不勝屈矣。

四、協理大學士與額外大學士

未定協辦制度以前，有協理大學士，及額外大學士等名稱。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以兵部尙書白潢，爲協理大學士，旋授文華，雍正二年六月，以吏部尙書田從典，爲協理大學士，翌年亦授文華。七年七月，以禮部尙書陳元龍，爲額外大學士，旋授文淵。又以左都御史允泰，爲額外大學士，旋授東閣。十年七月，以左都御史福敏，爲協理大學士，至乾隆三年始授武英。其後設有協辦大學士專職，而協理與額外之名，不復見矣。至於署大學士，及予大學士御者，二百餘年中僅見一二云。

五、協辦未晉殿閣者

乾隆以後，協辦爲入閣之初階，俟缺推陞，乃授殿閣職銜。但已晉協辦，而未及正揆席者，或卒於任上，或緣事降謫，數頗不少，分考如下：對於義，於乾隆九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十三年卒於任。陳大受於乾隆十三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十五年出任粵督，十六年卒於任。汪由敦，於乾隆十四年，以刑部尙書協辦，旋以事斥去協辦任，仍任尙書，尋卒。達爾黨阿，於乾隆二十年，以吏部尙書協辦，二十一年解協辦任。鄂弼達，於乾隆二十一年，以刑部尙書協辦，二十六年卒於任。兆惠，於乾隆二十九年，以戶部尙書協辦，三十四年卒於軍。莊有恭，於乾隆三十年，以江蘇巡撫兼刑部尙書協辦，三十一革任。程景伊，於乾隆三十八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四十五年卒。永貴，於乾隆四十五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四十八年卒。彭端兀，於乾隆五十五年，以吏部尙書協辦，翌年降侍郎，復官尙書而卒。書麟，於嘉慶四年，以閩督兼吏部尙書協辦，六年卒於軍。吉慶，於嘉慶六年，以粵督協辦，七年冬降革，旋自

戕。琳甯，於嘉慶七年，以粵督協辦，九年休致。紀昀，於嘉慶十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兩月而卒。長慶，於嘉慶十年，以刑部尚書協辦，十四年革協辦任。明亮，於嘉慶十五年，以兵部尚書協辦，翌年革任。鄒炳泰，於嘉慶六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十八年降謫。百齡，於嘉慶十八年，以粵督協辦，翌年卒。章煦，於嘉慶十九年，以吏部尚書協辦，二十二年病免。吳璥，於嘉慶二十五年，以吏部尚書協辦，道光元年致仕。汪廷珍，於道光五年以禮部尚書協辦，七年卒。李鴻賓，於道光十年以粵督協辦，十二年革職。文字，於道光十一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十六年予告。伊黑布，於道光十八年，以滇督協辦，二十一年革任。湯金釗，於道光十八年以戶部尚書協辦，二十一年降調。奕徑，於道光二十一年以吏部尚書協辦，翌年革任，敬徵，於道光二十二年，以戶部尚書協辦，二十五年革任。陳官俊，於道光二十四年，以吏部尚書協辦，二十九年卒。杜受田，於道光三十年，以刑部尚書協辦，咸豐二年。卒禧恩，於咸豐二年，以戶部尚書協辦，旋卒。訥爾經額，於咸豐二年，以直督協辦，翌年革職。賽尚阿，於道光三十年以戶部尚書協辦，咸豐二年革戍。駱秉璋，於同治六年以川督協辦，旋卒。沈桂芬於光緒元年，以兵部尚書協辦，七年卒。李鴻藻，於光緒七年，以兵部尚書協辦，十年緣事降調，二十二年仍以禮部尚書協辦，二十三年卒。翁同龢，於光緒二十三年，以戶部尚書協辦，翌年休致。剛毅，於光緒二十四年，以兵部尚書協辦，翌年九月卒，尋追革。徐麟，於光緒二十六年，以吏部尚書協辦，三十二年休致。榮慶，於光緒三十一年，以學部尚書協辦，以迄清亡。翟鴻機，於光緒三十二年，以外務部尚書協辦，翌年致仕。戴鴻慈，於宣統元年，以法部尚書協辦，翌年卒。李勉林，於宣統二年，以吏部尚書協辦，以迄清亡。

六、遭降革者

陳之遴，於順治九年，授內宏文院大學士，十三年，以原官發盛京居住，十五年革職流徙。李率泰，於順治八年，授內宏文院大學士，旋革職，十年起復，爲粵督，康熙三年，卒於任。劉正宗，於順治十年授內宏文院大學士十七年革職。索額圖，於康熙八年，授國史院大學士，十九年休致，尋革禁。勒德洪，於康熙十六年，授武英殿大

學士，二十七年革職。余國桂於康熙二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七年革職。嵩祝，於康熙五十一年授文華殿大學士，雍正五年革職。蕭永藻，於康熙四十九年，授文華殿大學士，雍正五年革職。趙國麟，於乾隆四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六年緣事降調。祿康，於嘉慶九年，以戶部尚書協辦，十一年授東閣大學士，十四年降尚書，十五年復授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再降調卒。蔣攸銛，於道光四年，以直督協辦，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以事左遷侍郎，未任，卒。耆英，於道光二十五以粵督協辦，二十八年授淵閣大學士，三十年降調。葉名琛，於咸豐五年，以粵督協辦，旋晉體仁閣大學士，七年革職。徐桐於光緒十五年，以吏部尚書協辦，二十二年，授體仁閣大學士，二十六年卒，尋追革。（在協辦任上黜革者，已見上段，不贅錄。）

七、陷刑辟者

李建泰，以故明大學士降清，於順治二年，授內宏文院大學士，緣事革職，旋伏辜。剛林，於順治初元，授內國史院大學士，八年，坐事革職，尋棄市。祁世格，於順治二年，授內宏文院大學士，十一年二月革職。尋棄市。班爾布善，於康熙六年，授內秘書院大學士，八年，以事革職，尋處絞。馬爾賽，於雍正六年，授武英殿大學士，十年七月革職逮問，尋棄市。陸福，於乾隆十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十二年十一月革職，十四年八月賜自盡。訥親，於乾隆十年，授保和殿大學士，十三年九月革職，尋棄市。楊應琚，於乾隆二十九年，以陝督授東閣大學士，三十一年四月革逮，予自裁。阿爾泰，於乾隆三十五年九月，由川督授武英殿大學士，翌年十一月革職，三十八年予自裁。和珅，於乾隆四十九年協辦，五十一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嘉慶四年正月革逮，旋賜自裁。柏葰以咸豐六年協辦，八年十月革問，九年二月棄市。肅順，以咸豐十年協辦，翌年九月革問，尋予自裁。

八、更易最多及最少之年次

順治八年，閣臣留任者三人，進六人，退六人，共十三人。十年，進退及留任者共十四人。十一年，進退及留

任者共十五人。十二年共十六人。十五年亦十三人，是爲閣臣更易最多之年次。康熙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四十三年，四十五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五十六年，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六十一年。乾隆五年，七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三十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三年，四十六年，四十七年，五十三年，五十七年，六十一年。嘉慶三年，八年，十三年，二十年，二十一年，道光三年，六年，八年，九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同治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八年，九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六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八年，三十四年。宣統三年，則全年並無更易。又康熙朝閣臣無更易之歲，大學士列職恒爲五人，尙少於定額。乾隆朝恒爲六人，恰符額設之員數。但康熙五十四年，閣臣共有四人，漢三滿一，而李光地復乞假回籍，秉樞府者，祇蕭永藻，嵩祝，王掞三人，尤爲一代所罕見云。

九、開國宰輔與亡國宰輔

順治元年之宰輔，爲內秘書大學士范文程，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內宏文院大學士馮鋐，內秘書院大學士洪承疇，建極殿大學士謝陞。五人中，除剛林爲滿籍外，范則以瀋陽人隸籍漢軍，久爲從龍之彥，而馮、洪、謝、則皆故明降大學士，歸附清朝，仍躋顯要。蓋以開國之始，降臣來歸，正宜厚爵勗縻，籍以餌引。又因滿人夙重弓馬，且立國未久，爾時惟精軍旅，少諳治理之才，故入關初期，尙多以漢人居相職也。至宣統三年之閣臣，共爲六員，與三年相同。惟是年夏四月，已更易新內閣，其首相即屬之總理國務大臣，原日之內閣，已奉嚴裁併。各大學士則列職於弼德院及翰林院。其未裁併改職以前，文華殿大學士世續，文淵閣大學士那桐，體仁閣大學士徐世昌，東閣大學士陸潤庠，協辦大學士榮慶，李勉林。至於新內閣人員，總理國務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載澤，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隆昌，海軍大臣載洵，司法大臣紹昌，農工商大臣溥倫，郵傳大臣盛宣懷，理藩大臣壽耆，此爲第一次之責任內閣。至是年九月，武昌事起，召袁世凱入京

，旋罷突勵，以袁爲總理國務大臣。各部大臣由袁支配，已無協理大臣名稱，其閣員姓名如下；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嚴修，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蔣鎮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工商大臣張謇，郵傳大臣楊士琦，理藩大臣達壽。此次閣員，除達壽外均爲漢人，蓋清廷避免親貴用事，示意袁氏重用漢人，冀以挽回輿論。然是時大勢已去，新選閣臣如嚴修、張謇等多不就職，坐觀時變。此未造之新內閣，亦屬於有名無實，未嘗正式成立也。

十、狀元宰輔與帝師

狀元宰輔，史所艷稱，蔚爲佳話。有宋一代，龍首凡四十三人入贊綸扉者，祇八人而已。明代將近百科，入相者亦幾逾十人。清代正科恩科，合共一百一十二科，而狀元膺大拜者凡十四人，約占全數十之一而強，計聊城傅以漸，武進呂宮，崑山徐元文，金壇于敏中，番禺莊有恭，會稽梁國治，韓城王杰，大庾戴衢亨，吳縣潘世恩，南皮張之萬，常熟翁同龢，嘉定徐鉉，壽州孫家炳，元和陸潤庠。十四人中，傅呂徐（元文）莊徐（鉉）皆不獲易名之典，爲美中不足。惟翁、孫、陸三人，又嘗充上書房總師傅者，狀元宰輔又爲帝師，益覺不可多得，談掌故者榮之。

十一、易名及出身

閣臣必起家詞林，始於明代，清代因之，惟限於漢人爲然，滿洲、蒙古、漢軍，則不在此例。故滿蒙漢軍出身，資格可以不問，枚卜最易，且身後常得謚文。若漢臣則內而閣部外而封疆，凡邀易名之典者，非翰林不得謚文，且必修撰編修檢討，方得大拜，雖庶常不得與焉。此爲相沿通例，人所共知，不過一代之中，間有二三名臣，特蒙恩遇，量爲變通，破格予以美謚者，此爲特恩，屬於異數，又不限於常例矣。如田從典之謚文端，彭蘓章之謚文敬，皆進士得大拜謚文者也。朱軒則以庶常而謚文端也。左宗棠則以舉人欽賜檢討，而謚文襄也。然十葉之中，亦僅此四人而已，謂非異數而何？至全代二百五十二人中，獲易名者共一百七十四人，約占全數之秦半。漢籍九十一人，

，滿籍六十二人，蒙籍九人，漢軍十二人。謚文者合計一百六十二人，以謚文端爲最多，共有三十七人。謚文安、文介、文康、文成者各一人，謚勤僖、忠毅、忠襄、忠愍、襄壯、敏壯、襄愍、清義亦各一人。第滿籍宰輔中，亦不少爲翰林出身者，如英和，爲乾隆癸卯進士，授編修。寶興，爲嘉慶乙丑進士，授編修。文慶，爲道光壬午進士，授編修。麟魁，爲道光丙戌進士，授編修。全慶，爲道光己丑進士，授編修。倭仁，爲道光己丑進士，授編修。靈桂，爲道光戊戌傳臚，授編修，載齡，爲道光辛丑進士，授編修。恩承，及麟書，皆爲咸豐癸丑進士，授編修。崑崙，爲同治壬戌進士，授編修，皆是也。進士出身者，亦十餘人，茲不贅錄。至漢臣由通籍至入閣，歷時較速者。當推呂宮、傅以漸二人。呂以順治二人丁亥狀元，至十年，由吏部侍郎授內宏文院大學士。傅以順治三年丙戌狀元，至十一年，由翰林學士授內秘書院大學士。惟功名不終，致身後皆不獲謚耳，又巴泰共有二人，康熙朝之巴泰，本姓金氏，隸漢軍鑲藍旗，由內大臣授內國史院大學士，卒於康熙二十九年，謚文恪。又一巴泰，則爲滿洲正黃旗人，於雍正十三年，由工部尚書授協辦大學士，乾隆九年予告。

十一、人才之地域分布

清代宰輔，其滿蒙漢軍人員，多數隸京旗籍；屬於各地駐防者，則居少數。而駐防者後不易查考，故其出生地城，頗難分析統計。至於漢籍人員，江蘇二十七人，浙江十六人，山東十五人，山西八人，安徽江西各七人，直隸十一人，湖北、湖南各六人，陝西四人，順天、福建、廣東、四川各三人，河南二人，廣西一人，最多者爲江蘇，最少爲廣西，而雲南、貴州、甘肅則無。清代人才，夙以江浙爲盛，自相臣八座，各省督撫，以及各科鼎甲，多數爲江浙人，此固信而有徵者也。

本文參考書目

- | | |
|----------|--------|
| 東華錄 | 清史列傳 |
| 清朝全史 | 清鑑輯覽 |
| 六十年中國大事記 | 清稗類鈔 |
| | 國朝先正事畧 |
| | 清會典 |
| | 清代通史 |



東亞國防體制之急務與其原理

岡野鑑記

一、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與東亞聯盟

中日事變，掀起東亞的內戰，經三年有半，迄於中日滿共同宣言發出，中日基本條約及附屬議定書簽定之日，東亞五億民衆所期待的東亞新秩序，才確立了基本原則。

中日基本條約，經過日阿部全權特使與汪精衛先生七個月間的交涉，週旋折衝，一進一退，所得今日效果之貴重可知。彷彿於猜疑或忌恨之漩流中的東亞民族，至此始發現了光明之大道。

條約內容如何，本文不加贅述，所欲言者，為該條約內容要點殆與東亞聯盟論的主張完全一致一言而已。

東亞聯盟的理想，為世界和平之實現，其第一目標，為確立東亞永久和平，其指導原理，為出發於民族協和之王道主義，至其聯盟之基礎條件，則為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提携。

中日滿共同宣言，劈頭即說：「三國政府希望三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共同理想下，互相緊密提携，形成東亞永久和平軸心，以此為核心，貢獻於世界全面和平。」此與日本東亞聯盟論者所謂：「以東方道義（王道主義）為指導原理，在聯邦協和（民族協和）之下，尊重其本然之特質（獨立性），求東亞永久和平之確立，進而謀世界和平之實現。」毫無二致。

宣言中又云：「中華民國，日本國，及滿州國，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此即東亞聯盟基本條件之一—政治獨立。

其次，如「以互惠爲基

要之手段。」等句，不外爲軍事聯盟，經濟提携的說明。「以互惠爲基礎……善隣友好」，與「以道義的公正立場之民族協和」，其意義正復相同。

根據以上，可知東亞聯盟，爲東亞各國一致之主張，在基本條約及附屬議定書中，更發見了實踐方策之基本原則。

基本原則既已確立，則此後之間題，當在「實踐」，然倘以誠相見，邁進於實踐途上，則此重大原則，亦等於男女。際此大轉換期中，首先使民衆徹底認識時局，而以誠意相協力，此爲東亞聯盟運動者的重大任務。

一、東亞國防經濟體制確立之急務

繼決定基本原則之後，最急務者，無過於東亞國防經濟體制原則之確立。東亞國防經濟體制，即全面的東亞防衛體制，成立了東亞國防原則，即實施協定的實踐方針。

日本東亞聯盟協會宣言中有云：「數十年後，將爲人類歷史最大關鍵的世界最後戰爭，東亞民族，倘能聯合運用其全力，最後勝利，必歸於我。」爲此，則東亞各國家不可不先增進實力，整備必勝的體勢。

且也，世界四大集團化的趨勢，已漸成爲事實。在此四大集團之中，東亞集團，進步最爲遲緩。此次基本原則既已訂立，中日事變，必須結束，否則東亞集團，將爲世界的落伍者，此東亞國防體制之確立所以爲當今之急務。以現代戰爭的國家總力戰論，國防體制之內容，極之廣汎複雜。現代戰爭之對象，不僅是軍隊及後方人民，即凡一切物力人力財力甚至家畜草木，均應集中以爲國用。國防體制原則及具體方策之決定與實施，原非易事。本文僅就經濟方面作爲討論之中心。

濟提携之事實，因此須講求一切必

三、東亞國防廣域經濟之原則

求東亞國防經濟體制之確立，其重要之問題，第一為「廣域經濟。以戰時經濟的原則論，人的資源與物的資源，以愈能接得為有利，而求人的資源與物的資源充分之供給，則以佔領廣大經濟領域為必要。倘若人的物的資源數量缺少，則國防力全部貧弱，求高度國防力的產生，也就感覺困難，此東亞聯盟所以有樹立國防廣域經濟的必要。

廣域經濟的範圍，本不限於東亞聯盟的範圍內，即凡東亞聯盟勢力圈及其他友邦，都可包括在內。唯是勢力圈內的各地方，務使其加入東亞聯盟，始可認為國防經濟體制之內容組織。至於友邦，離合既定，難期待以永久，日本過去依存第三國之國防體制，其苦惱自不待言。

雖然，國防廣域經濟的原則，非僅為求範圍的廣泛而已。廣範圍的國防圈形成之後，倘不能自給自足，反以範圍擴大而增加其對外依存性，則國防經濟轉為無力。同時，經濟內部，若僅為低度經濟之發達，無法實施計劃經濟，則國防經濟更暴露其脆弱性。

總之，國防廣域經濟之原則，為國防體制最重要的條件。然亦不可不注意其以求資源的迫切而單獨謀範圍擴大的危險性！

四、東亞國防自給自足經濟之原則

國防經濟體制之第二原則，為自給自足經濟。任何國防圈，雖未必真能達到完全自給自足以確立其國防經濟，究亦須持有高度的自給自足能力，方可以之確立國防經濟體制。

自給自足經濟的內容，約可分為四項重點。第一，為資源的自給自足。東亞埋藏有豐富資源是事實，然資源須經過採運製造，使之商品化之後，才產生其使用價值。現階段的東亞國防經濟，應如何使埋藏資源產生其使用價值。如果僅以東亞有天賦之豐富資源，便認為已確立了自給自足經濟，則陷于大錯覺。過去滿洲嘗以資源豐富自為滿

足，而忽於國防經濟論之要點，可以爲例。今後之中國，亦當置重點于資源之開發。

第二，爲資材的自給自足。這裡所謂資材，是指利用以開發資源之資材，爲生產而需要之各種資材。資材與資源因相互關係而發展，資材不能自給自足，高度國防經濟之樹立也不可能。重要資材依存於第三國，則必暴露國防經濟之脆弱性，過去日本即爲此例，滿州建設亦有同感，將來中國經濟建設，其資材之困難，殆思過半。

第三、爲技術及勞力的自給自足。國防經濟建設，其需要技術與勞力，自不待言，尤其在高度國防經濟上，更有需優秀之技師與強力之勞動者之必要。日本富有技師，其能率亦不遜於歐美各邦，數量亦不弱，日本之勞動者，能勤勉，惟量的方面，則微感不足，然而華滿等國，技師者既少，勞動者能力又低，將來東亞國防經濟，關於技術與勞力的自給自足一點，應如何補救之，殊爲重要的課題。

第四、爲資金之自給自足。資金爲物資問題的背槩，物資不足的時候，如何建設其國防經濟，使之不至發生通貨膨脹，此爲最困難問題之一，日滿間之資金調節，及日滿與中國間之通貨問題，均爲今後重要的關鍵。

以上資源，資材，勞力，資金等問題，爲保證自給自足經濟成立的要素，求東亞國防經濟體制之確立，不可不先注意於此。

五、東亞國防計劃經濟之原則

如上所述，東亞廣域經濟成立，人的物的資源的自給自足具備，即此以確立高度國防經濟仍不可能，蓋高度國防體制，須以高度計劃經濟爲絕對的條件。在綜合運用東亞全民族能力，以期必勝于決戰場上，其國防體制，非有精密之科學的國防計劃經濟不可。

計劃經濟之要件，爲計劃之全體性，統一性及計劃性，於是始能作最高度之發揮。所謂計劃經濟之全體性云者，即是站在東亞的立場，以東亞全體經濟的觀點來擘劃國防計劃經濟，以東亞爲打成一片的經濟地域，判斷軍事經濟諸條件，以樹立最高度能率之國防經濟爲原則。

然以東亞之立場，作求計劃經濟之確立，其間如仍缺乏在國防目的上綜合的有機的統一性，則國防經濟，不過爲機械的經濟政策的集合而已，無論發揮所謂綜合運用的效果，故計劃經濟之統一性，實關至要。

其次，爲計劃經濟之計劃性。東亞國防計劃經濟，既有全體性與統一性，而經濟政策本身，無科學的合理的精密計劃性，則高度國防經濟仍不能成立。蓋自生產以迄消費的全經濟機構，正如人體之循環組織。對於循環機構之運用，自非有適當之計劃性不可。

總之，國防計劃經濟，應以全體性統一性計劃性三者爲要件，今後如何樹立計劃經濟，必先秉此三者爲原則。

六、東亞國防共榮經濟之原則

共榮經濟，爲東亞諸國間相互之共存共榮的互惠經濟。三國共同宣言中有言：「以互惠爲基礎，舉三國間，一概提携……」中日基本關係條約第六條云：「兩國政府，基於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之旨，平等互惠之原則，應行兩國間之緊密經濟提携。」以上均不外說明共榮經濟的原則，所謂東亞共榮圈，也是以「共榮」爲出發點。

然共榮經濟的原則，須以樹立東亞國防經濟爲目的，而東亞高度國防體制，須站在東亞民族協和的基礎上，始能成立。民族協和以平等互惠爲原則，不能平等互惠，則民族間發生裂痕，更何有國防經濟之可言。

三國共同宣言及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對於東亞高度國防經濟建設的內容，未爲充實；日華滿經濟建設要綱中，亦未有國防經濟內容之明白規定，不過僅言及以東亞共榮經濟建設爲目標而已。際此國際情勢急變之下，東亞國防經濟建設之急待實施，自不待言，誠然，則本文所論諸原則爲期期不可缺者。



亞細亞民族政策論

新明正道
譯者李辰

(一)

自中國事變，勃發以來，對於中國民族之政策，固成爲對象問題，然對於亞細亞其他民族方面，不能不深

切關懷，且積極的對此政策，亦非相當問題，吾人既主張建設東亞新秩序，而處此情勢下，必先明瞭中日滿三國間，政治、經濟、文化、以形成連帶的組織，然仍不足充分攷慮東亞新秩序廣義之建設，故從事變之推展，不得不向中日滿三國之外圍，以從事建設東亞新秩序，現當歐洲大戰中之德意志，壓倒荷蘭法蘭西，表現驚奇舉動之際，尤足令吾人喚起南方領域之注意。蓋東亞新秩序之擴大紀念，基於東亞共榮圈之概念而來，所謂南

方領域者，誠以中國民族與亞細亞諸民族，住居地域不同，故我的民族政策，非獨中國民族問題，此等諸民族，更成積極問題，即東亞共榮圈之全體對象，而民族政策，亦已達到考慮之時期也。

亞細亞民族政策，以亞細亞稱者，對象固爲亞細亞諸民族，而非絕對的尋求特殊政策，只適用於亞細亞，乃整個的亞細亞諸民族之重大問題，所以一國政策，要不能不力予支持，此種原理，又非僅用於亞細亞，且超越亞細亞，求爲世界的正當之規律，非然者一則對抗英美(德謨克拉斯)資本民主主義的民族政策，蘇聯共產主義的民族政策，奚能達到克服之期望？故亞亞細亞民族政策，對象既爲亞細亞諸民族，則從其內容檢討之，必不

可無對抗其他世界的民族政策之性質。

(二)

具體的亞細亞民族政策，係包括亞細亞中諸民族，此問題亦要先明確一般的基構，觀察我等民族之存在如何。評論所謂民族主義之價值如何？夫然後我的民族政策，特樹一幟，足為世界代表的民族政策之典型！抑由此解決此等問題結局如何？當有以決定！蓋各個諸民族方面之政策，既先立特殊化，則對此等核心的問題，尤不能不先決定我之態度，然我對此核心的問題，尤在新現事態加以檢討，特別把握，直可謂操諸日本之動向，自事變發生以來，日本以中國為對象者，其原因絕對非要求民族政策之考慮，係使此間民族及民族主義，完成一定之政策的機構而確立之，日本對處近代中國情形，推進的動力，不能不以民族主義為問題，自無待言。原夫民族主義者，中國孫總理三民主義之基幹也，固從帝國主義之桎梏中，謀中國民族之解放，而又握住民族從社會中以窮其極的單位，得到其見解也，民族本來平等，充其量形成一個國家結合而成為國族之主張，是以一民族一國家之理想，即民族主義，國民黨具有此觀

念，普及於中國民族，事實上遂成爲促進中國統一化之淵源，蔣介石政府因而利用發揮抗日手段，事變起因，未嘗不由此，日本與中國對立，雖同一民族主義之原因，我決非鄙視民族之意義，亦非完全否定民族主義之主張，我肯定民族與民族主義，惟有應付社會發展現階段之必然性，隨各地形態，使其推進，卽一言以蔽之曰：「東亞的民族協同主義。」總而言之，民族若無基礎，則各個民族與自己肯定的民族主義，決不克相與相終。

各民族之在東亞，如能認識其共通的性格，及歷史的運命，以形成協同的連帶組織，斯爲唯一超越民族主義。

(三)

日本之亞細亞民族政策，乃從民族之社會的單位性，評論價值，此要點固與所有民族主義同一立場。第民族者，非如人種有相類體質的基礎，在客觀的成立統一的模範，及隨主觀的意識，而具有文化的統一體之意味，由此推及政治的統一之要素，亦非一定無構成必須之條件，民族直接原非含有政治性，以爲統一體，惟理想

的條件存在時，自然的與國民之母胎，結合而成。故基此意味，民族與國民，決非同義的，兩者間各別觀念，然民族文化的統一體，乃有力國民構成之要素，事實上國民能否長成政治的統一體，其民族的構成如何？及構成方法如何？是又問題之重大者！至關於民族與國民，又如何規定其關係？我嘗溯追此問題之解答：十九世紀之初，所謂民族主義抬頭，舉世皆知爲一民族一國民之公式，中國民族主義，即屬此統系，原無可指摘，但在今日猶本此主張者，殆欲支持其相當之廣大範圍耳。

一民族一國民之民族主義，起源於近代歐洲之英法，法國猶爲先導者；自法國起革命，民族主義浸潤全歐一，而奏厥功，後此思潮，非僅播及歐洲，且喚起全世界反響，展開民族主義之世紀，時至今日，亞美利加

與英法，仍持民族主義爲外夸的口號，殆歷史造因使然。故凡爾賽處理民族問題，正是英法美立場之唯一表現也。

然而在今日此種公式，已批評不足爲吾人之標準，則在民族中，國民構成之要素，不能不承認其重要性，斯民族與國民之關係，猶應有更新省察之必要。

十九世紀之民族主義，向內的基礎，促進民族的結合，故其國民社會，任何地均有飛躍之可能，却不能不認爲歷史的意義，英法美俄德意等，成立民族國家，所由表示社會發展之必然性，日本明治之維新，當時亦無非基此動向，而究竟一民族一國民之公式，能完全實現於世界的，決未之有。誠如英美之倡導民族主義，彼自盲裡叫囂，一舉一動，罔知實踐信條，所以樹立於世界的帝國主義，無足重視，彼等踏足於東亞，與此原理，全屬矛盾，且早已將此原理，蹂躪淨盡，試從其外交的實現觀之，無一非屬虛偽，彼等支持此種民族主義之義理，我絕對否認爲忠實信徒，我因之痛感所謂民族主義，殊有再加檢討之必要。

(四)

英法美鼓吹一民族一國民之原理，始則左右逢其源，繼則忘其本來面目，恬然實行帝國主義，彼固以先進國自居，不惜維護其獲得有利地位，因而施其狡猾心理，絕對否定日本在亞細亞之行動，目爲違反所謂民族主義，實則自完其說，冀掩己非，回顧十九世紀初期，唱導民族主義之意味如何！彼等自應深加反省，今惟無反

省故，於是成爲渝府之同情者，而後者亦認彼等維持自己之立場，盛爲稱譽，怪狀滋甚。就此問題論，英美等之實現的實踐，謂之無標準的民族主義也可。夫英美之現實，原從十九世紀初之民族主義，脫軌而來，以彼等民族主義之公式，愈愈失去其出發點，則其行爲未有不受損害者，到底不能不攷慮維持其價值，故我決非否定十九世紀之民族主義，唯要求英美忠實的實踐而已。

然由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當中，從我豫想的經驗，固非肯定十九世紀初之單純民族主義，舊調重彈，我惟

要求我的構成超越的新思想。

十九世紀之民族主義，始終爲一單位民族主義，對於密接的民族之結合，絕無特別關懷，其缺陷要點，即在於此，故超越個別的民族主義，含有廣域的連帶性，要非察其內容不可，由此點觀之，我的亞細亞民族政策，若祇稱民族主義，未足充足，從指導說，東亞的連帶之意識，更有發揮之必要。蓋對亞細亞之民族關係，特別負調整之重大責任，如我中日兩民族，國既強而具有實力，尤不可不明確此見解，而否定此協同之意志，東亞諸民族，人種的，地理的，既具緊密關係，握有此基礎條件，則在近代以後，此相互之社會，當更成一層有

機的關係，如此廣域的結合性，業已達到單純世界的結合性以上，從實質的進行，自能分曉。倘並此第一義的所有意，猶不認識上則成立於自然的亞細亞之廣域圈，惟有任英法美帝國主義之魔手，肆意破壞之而後已。

我們亞細亞爲世界廣域圈之一，事實極臻明確，以東亞的連帶之意識，協同亞細亞諸國民諸民族，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特東亞現狀，處於英法美共同侵界之下，被其蹂躪，則亞細亞諸民族，愈應一致要求，協力以圖解放，此東亞諸民族，所當深自覺也。從積極的而獲握此目標者，自經此次中日事變發生而後，任何時期，亞細亞民族政策，決無單純民族主義，明乎此東亞的連帶意識，不能不亟指加尊，中國夙昔之民族主義，完全陷於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之錯謬，故絕乏認識，而反否定日本協同東亞的連帶之方面，迄今渝府尤膠執成見，媚結英美勢力，狂叫澈底抗日口號，東亞的連帶之可能性，視若無睹，是要求此種民族主義，實現東亞，程道距離，寧非遠甚！

然更有一點加以檢討者，我的民族主義觀，由廣域

國的連帶感，分晰其內容情狀，使自然的廣域圈內之同類諸民族，促進結合，本極明顯，惟希望各民族一律適用一民族一國民之公式，實際的對方殊覺困難，蓋民族主義之理想，存在於一民族一國民，使之同化，猶非易易，茲就歐洲觀之，近代得確立民族的國家者，祇英法意德俄諸民族，其他民族仍無實現，假令實現此公式，其基礎必無鞏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如捷克，斯洛伐

克，波蘭等國家，處強國勢力之下，雖極艱辛，亦終不克保其存在，可為例証。又同一事態，而在歷史可認為安定者，如丹麥，荷蘭，比利時等，然此等國家成立非由民族主義之公式，雖能一時苟安，而四周受強隣之牽制與壓迫，結果其民族實力微弱，事實上貫澈一民族一國民之公式，亦力有未逮，民族的國民主義，實現優良者，總在人口五千萬以上之民族，其他中小民族，若非結合同等的民族，或協同強力民族，事實上亦不獲保其民族的生存，就令肯定十九世紀當初之民族主義復施今日，而如上各難點之發生，依然不能避免。若只採用單純民族的國民主義公式，更奚能完成克服目的？所以強大民族必然採用民族的國民主義，而以此公式的使之普及化，務令所有民族與國民之關係，成為無限制之確定

。此强大民族，中心健全全國民族的民主義，其進出途徑，頗屬適合。若夫中小民族，則因缺乏民族主義之公式，求其同途共進，殊感困苦，但能與同類者或協同大民族依此肯定，庶幾延長歷史的生命，故我主張大民族國民之包容的國民主義，與中小民族國民之大目的，在協力意志中，得照民族主義公式，達到展開民族與國民之新調整而完成之，是余所企望。

我的亞細亞民族政策，對中國大民族及各中小民族之要求，非止此也，殊於東亞共榮圈問題，有增加嚴重之必要，倘不問民族大小，澈底的適用民族主義之公式，在此種情形，各民族也未必獲得最大之和平與安定，且因追求此公式，却使東亞的連帶之結合，反有遲滯或紛亂之可能性，當屬意料中事。然日本非多民族的國民也，中國除漢族外，雖有多民族的國民之性質，而適用民族主義之公式，使東亞的連帶之結合，結果決無導入不安定的要素。若在南方領域之民族，謀民族的解放，則非充分完成亞細亞民族政策之目標不可。但不論民族大小，適用一民族一國民之公式，亦非賢明之處置，如泰國民族，及其他民族，既已發揮國民力量，又表示其可能性者，姑勿具論。要之對於中小民族，與其分別各個

，適用民族主義的公式，毋寧使此等糾合於大民族中心，或使此等互相聯合，其能排除將來之不安定性，尤爲愈也。在此情形，就十九世紀之民族主義觀之，已非公式式的，若能尊重民族之價值，在多民族一國民之結成中，促進之，助長之，使其內容充實，如是方策，乃能肯定。調整民族與國民之關係，原屬政策之最困難者，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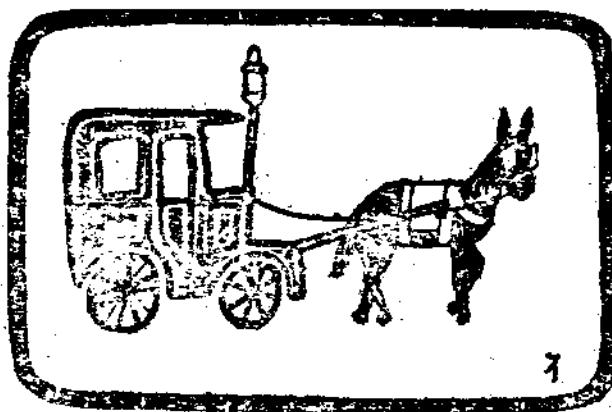
依據此點，絕對的，毋慮陷入機械的，而製薩十九世紀亞的連帶之組織，充足各民族之協和，與增進全體的幸福，此皆基於亞細亞民族政策，亞細亞諸民族乎，盡舊起而共圖之。

由民族主義看，有一個新時代擺在面前；由民生主義看，也有一個新時代擺在面前。大家不用遲疑，總理所主張的路線，是光明的大道，開展成一個新時代在前面，正需要我們新的努力。我們要本於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來與東亞的友邦合作，與東亞的各民族合作，以求中國民族的開放，並且求東亞各民族的解放，本於民權主義，來實施憲政，犧牲個人自由，完成國家民族的自由，本於民生主義，來解決民生問題，復興國家經濟。

—節錄汪主席新時代的使命—

中日新條約與大東亞聯盟

鹿島守之助著
徐華癡譯



(一)

關於中日兩國間之基本關係的條約，已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由阿部大使與行政院長汪精衛簽字完畢，至此，日本帝國政府對國民政府已正式承認。又中日滿共同宣言，亦於是日由中國全權汪，日本全權阿部，滿洲國全權臧式毅署名發表，中國國民政府與滿洲國政府由此互相正式承認，於是東西恒久和平之基礎，因中日滿三國善鄰友好關係之樹立而確立矣。此次簽字之中日條約乃由下列三件而成。

(一) 關於中華民國與日本國基本關係之條約。

(二) 附屬議定書。

(三) 關於附屬議定書之中日兩國全權委員間之諒解事項。

不用說基本條約是包含規定中日間永久關係之事項，約定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以善鄰友好為根本精神，於

政治，外交，教育，宣傳諸領域，除去足以破壞互相友好之舉措及原因，且將永久禁絕之（第一條）。其次關於文化之融合，創造及發展，約定彼此協力（第二條）。更約定為共同防共及為達此目的所需之軍隊，屯駐於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第三條）。再關於治安之維持，約定緊密之協力（第四條）。承認日本艦船在特定地域之駐留（第五條）。關於根據平等互惠原則的兩國間之經濟提携為詳細之規定（第六條）。最後並有關於撤廢租界及治外法權之約定。

此基本條約誠可謂近衛第一二兩次聲明中所闡明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之三原則忠實的條約化者也。

〔註〕第一次聲明：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

第二次聲明：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次為中日滿共同宣言，此宣言為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關於互惠為基礎的三國間一般提携。就中為舉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之實，應講求諸般必要之手段。以中日基本條約與此共同宣言綜合觀之，誠如滿洲國張國務總理所言，此可謂建立吾人近日提倡之東亞聯盟結成的基礎也。

(一)

余於滿洲事變勃發數年前，中日國交關係未如此緊張時，極力提倡東亞聯盟之建設。此種聯盟之目的曾舉下列四點：

- (一) 東亞的永久和平。
- (二) 對於蘇聯之政治的軍事的壓迫之共同防衛。
- (三) 由中日經濟組織之改造有與歐美經濟競爭之可能。
- (四) 東洋之政治的經濟的及文化的獨立之可能。

此等根本趣旨能見於近衛聲明及中日基本條約中，不勝欣懌之至。余憶當時曾為如次之論調：

「欲求今日東亞之無秩序而成為有秩序，欲化東亞今日之紛爭而為善鄰友好，只能徐徐圖其實現。其第一步為

中日兩國政府或兩國之各種團體舉行會議或會商。中日兩國政府之會議對於仲裁裁判，保障軍備、交通、關稅、爲替、貨幣、移民及文化等諸問題，須組織各種委員會。在最初的會議中須約定舉行週會的會議，如汎美會議或英帝國會議然。又北京與東京須各設立東亞聯盟事務局，爲兩國共同運動之中心，亦如汎美事務局然。

中日兩國締結關稅同盟，以東亞爲一個統一的經濟區域，於將來東亞產業的發展上，極其重要。固然今日欲使東亞經濟爲急激的變更，實行頗爲困難，但將來關稅撤廢之準備，自今日始不能不爲熱心之致慮。中日兩國之貨幣同盟亦屬必要之圖。

其次，在目前最富於實行之可能性而最重要者，其爲文化問題之範圍乎！關於經濟問題，在中日兩國與歐美諸國締結的條約之關係上，兩國不能單獨處理者頗多。然關於文化問題則不受此限制或拘束。

學校與新聞乃使今日世界不依暴力或革命手段而能期其圓滿的進步與發展之唯一的機關也。學校者能培養青年少年之心，但又能戕害之。新聞者能培養成年之心，但亦能戕害之。不幸今日之學校與新聞多操於思想偏狹者之手中，利用之以引起中日兩國間之不和，反感，憎惡，侮篾及嫉妒。在中國且有以外國資金創立之學校及新聞，此等資本亦有專爲引起排日的感情而投之者。又中日兩國多有專藉兩國之反感以維持其生存與名譽之人手，真爲中日兩國之將來而考慮者對於此等人應共同攻擊之。中日經濟委員會之設立誠有必要，同時設立國民憎惡除去委員會亦爲當務之急。此委員會認爲利用學校，輿論、講演、文學及新聞等以喚起國家間的憎惡者乃東亞人種之叛徒，由中日兩國之法官組成之特別法庭，予以嚴厲之處罰。只有對於此等造成國家間之憎惡者，施以共同鬥爭，始可防止中日兩國將來紛爭之禍根於未然，亦只有如此，始可達到兩國之結合也。

東亞聯盟運動之最高目標在建設東亞聯合亦如汎美聯合然。東亞一方統合於其他世界，他方在聯盟內，中日兩國須獲得最大的自由。故其政體爲帝制抑爲共和之間題，應委諸兩國之自由。東亞聯盟對於其構成員之中日兩國，不是限制其國民的文化的發展。其目的不是銷滅兩國國民的個性，而是綜合此國民的個性，組織一個政治的團體，以適應時代之要求。

余以爲此十七年前之提倡，雖至今日，亦無何等修正之必要。余所提倡之一的除去兩國間憎惡問題，若果中日兩國對此曾加共同的努力，則東亞的歷史，恐已成爲遠勝於今日之歷史，東亞聯盟今日不聞尚在建設過程中，定能現其雄偉之姿與汎美·蘇聯，及德義指導下之歐洲而並立，誇耀其鞏固之存在矣。

余當時提倡東亞聯盟之見地乃從交通、通信、技術所及於政治之影響，認爲有由國家更進而爲超國家或國家聯合之傾向，基於此方向之東亞的再組織實有必要。同時並主張對於英美之經濟的壓迫，蘇聯之思想的軍事的壓迫，東亞方面應毅然表示共同防衛的態度。

當時余之提倡殆無人顧及，因爲世界在國際聯盟思想之下，受和平主義之支配，日本亦得貪眠。在蘇聯有史丹林與托洛斯基之猛烈的爭端，在歐洲因賠償問題，德法互相嫌視，英美屢行軍縮，是以日本不受蘇聯、歐洲、英美任何方面之直接的威脅，從而在此和平時期，豫想樹立國家百年之大計，孜孜於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的提倡，其不能獲得共鳴，蓋亦不得已之事耳。今日之事態已根本不固。蘇聯在史丹林之治下以強大力之國現其獨立之姿於歐亞北部，歐洲於德意指導之下欲將其二十六國統一於歐洲之聯合。此聯合體於其軍備文化方面將占世界無比之卓絕之地位。英美愈有合體之傾向，縱令英本國之前途無良好之希望，其自治領加拿大，澳洲與北美合衆國合爲一體，盎格魯撒克遜之存在，於其富有及海上權方面，仍然可以誇耀於世界。處於如此緊迫的國際情勢，東亞遂不能如從前之貪眠，無從事紛爭之裕餘，而有急速的結成東亞聯盟之要求。此在今日尙有可能，然至明日則恐爲時已晚。若不察時勢之傾向，只一味行具日暮窮途之政策，中國與日本難保不同在蘇聯及英美合作之重壓下，有喪失其國際的威權之危險。唯有建設東亞聯盟，始得對蘇美諸國主張亞細亞人之優秀的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的獨立。前陸相，現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中將亦云：「現在是世界入於未曾有之混亂期及大轉換期。際此轉換期中，得爲優勝者，非所謂民族主義者。務必許多民族許多國民真能共同合作者，始能得勝利的榮冠。」此公之金言，爲關心政治者瞬息不可或忘之真理。此真理無論爲中國人民，無論爲日本人民，皆切望其真能理解之也。

(二二)

東亞聯盟超出思想之範圍，而爲政治家、軍人、經濟界人所關心者乃滿洲建國以後之事。石原中將於滿洲建國紀念日，在京都講演「滿洲建國與中國事變」，言及東亞聯盟，其說明如次：「所謂東亞聯盟者空爲何物？就目前而論，承認中國與日本及中日兩民族共同經營地的滿洲國之獨立，依下述之原則規定中日滿三國之提携。其方針爲國防方面對於白種人共守東亞之天地，經濟方面以眞的共存共榮爲目的，極力合作，以圖經濟之體化。然中日滿三國各有其國家之特長，應使政治獨立，內政互不干涉。基於王道之精神，純粹爲精神之提携。是即東亞聯盟之條件也。」又曰：「於滿洲建國過程中，因感於必要，在滿洲國內有民族協和之間題，在國際方面有基於王道之東亞聯盟的結成。」又板垣中將於其「寄東亞聯盟論」中，說明由滿洲建國至東亞聯盟之必然性，首先關於滿洲建國之由來說明如次：

「滿洲事變勃發時，一時主張滿洲占領論。然滿洲事變前數年標榜抗日之國民黨的統一運動，實使對漢民族政治能力抱絕望之我輩的見解，有再檢討之必要。且此一部份人士無論如何高唱滿洲占領論，在依然重視歐美實力之日本國民，到底無占領之意向。此諸種關係之意識之結合。遂釀成滿洲國之獨立。」

其次，關於東亞聯盟之必然性，述說如次：

「既決定爲獨立國，前述之滿洲二十萬日本人之意識以民族協和爲建國之根本方針，標榜民族協和之王道主義立國，遂成爲必然之趨勢。而在滿之日本人及一部滿洲人以相當的誠意，一經努力於王道之滿洲立國，又感覺對此三千萬漢民族之大苦惱，不能不設法爲之解除。

其苦惱爲何？卽自三千萬漢民族觀之，無論如何安居樂業之王道樂土實現於滿洲，若自己任意自中國本土分離，不問本國如何，只是自身處於王道樂土節足，則難免受漢奸之譏。於是，青年集議之結論，乃決向東亞聯盟發展，以王道主義的國防共同，經濟相通，政治獨立爲條件。又東亞聯盟應暫以中國日本及中日兩民族共同經營之滿洲爲其構成員也。」

板垣中將更爲斷語如此：

「此種憲皇之政治理想，實際上雖未成爲東亞聯盟之實現，但滿洲事變後，日本或中國若真有優秀之政治家，能將此東亞聯盟之線由思想運動而開拓兩國之胸襟互相接觸，從根本上打開和調整兩國國交，則我數億東亞民族之幸福，誠未可量也。」

石原中將亦支持板垣中將之意見，於前述之講演中，曾說明如下：

「滿洲事變後，若日本真有強力之政治家，則可以沿此昭和維新之根本方針的東亞聯盟之線，正面向蔣介石接觸折衝矣。」

處理中國事變之根本目標，今已由中日基本條約闡明。是爲亞細亞門羅主義，而以東亞聯盟爲基調也。日本對中國未占有思想上之力量，已屢言之。中國共產黨員，十年如一日，爲蘇聯的主張作代言人，而所謂親日，知日派之中國要人，將依如何之思想爲日本之主張代辦乎？其唯東亞聯盟之思想無疑矣。滿洲建國後，昭和八年三月滿洲帝國協和會，聲明應擴張民族協和運動於全東亞，結成東亞聯盟。其結成之條件爲思想之一元化，國防之共同，經濟之一體化，至此，滿洲建國遂成爲東亞聯盟之一階段，在滿之漢人對其祖國始無良心上之痛苦，而表示滿腔之贊意。當時在現地的日本人，痛感東亞聯盟思想對彼等之影響，究有如何之深。其中足爲東亞聯盟論之魅力的中心者，厥維聯盟各國之政治獨立一項也。

中國事變勃發後，國民大叫其「膺徵暴華」，其後隨事變之進展，漸次入於建設的階段，現在已至諒解唯有大東亞之建設，纔是忍受此次事變之至大犧牲的唯一途徑。

東亞聯盟論者云：近衛聲明之精神實爲此次中日條約之基礎，沿東亞聯盟建設之線而進行者。故近衛聲明可以解作以東亞聯盟之結成爲目標，在其結成前臨時提出之條件也。在此思想的基礎上成立之此次中日基本條約及中日滿共同宣言，在我大陸政策史上，堪稱劃時期的事績，滿洲事變以來，方有實現端緒的東亞聯盟，將見諸急速的實現歟！且此東亞聯盟將更加以我東亞共榮圈的範圍內之南方諸地域，而結成亞細亞聯盟，乃爲必然之事也。

(四)

關於中日基本條約及南京政府之承認問題，三國同盟締約國之德義及加入同盟之匈牙利，羅馬尼亞，將予以承認，毫無疑問。但英美以及蘇聯將出於如何之態度，實為問題。英美之態度已表示輕視本條約之意義，且不承認南京政府。美國政府於本條約發表之日，決定追加五千萬美金之借款，以圖蔣政權之強化，更聲明於短期內另提供五千萬美金，作為安定法幣資金之舉，亦在考慮中。三國條約締結以來，美國對日本大發其怒，不問合理與否，一味反對日本之對華政策。但日本以為三國條約，只是防禦的意義，且於不違反對德義兩國所負之義務的範圍內，關於太平洋及極東問題，希望與美國彼此諒解。此次成立之中日基本條約及中日滿共同宣言，果與美國之利益相反乎？余確信決不如此，且切望美國對於此點勿為誤解可也。

羅斯福大總統暗示「在歐、亞、菲各地域施行門羅主義之者想確保一名案」之時，若彼果為何等具體的考慮，相信其必有使各地域諸國為友好的結合作成幾個集團的打算。歐羅巴，亞細亞若實現其門羅主義，則亦應如美國然，由其地域內之強國宣言之。此在歐洲為德國，在東亞為日本，是無可諱言者。前美國國務部次長駐日大使賈斯爾氏亦有言曰：「在歐洲不由德國而由英國，在亞洲不由日本而由中國宣言之，則美國或可減其憂慮。但苟非各地域中之最強國所宣言者，其聲明殆無若何效果也。」

產業高度化之地域，在經濟方面常支配技術落後之諸近隣地方。美國之所以得向美洲各國宣言門羅主義，又創造汎美主義，乃因在美洲擁有經濟的指導權也。所以墨西哥雖不欲承認美國之政策，但墨西哥之發達，不達到與美國同一程度，其反對決不會成功。至於古巴，加爾佛等沿海諸國，亦莫不然。在歐洲方面，英國為最大產業國時代，其勢力之卓絕為歐洲諸國之冠。及至德國能維持其經濟的支配權，不絕的擴大其範圍，歐洲之情形完全發生變動。今日英國之勢力幾被逐於歐洲大陸之外，德國在歐洲之經濟力，已成壓倒的趨勢。於是德國提倡之歐洲門羅主義，自屬可能。至日本提倡亞之細亞門羅主義，對於與本地域外的世界各國之通商，決不會使之減少。只是對於各

集團諸國之活動，強化其調整之程度。此東亞新原則不但不減少與外國之貿易，反可從而增大之。故賈斯爾氏斷言曰：「日本門羅主義若果能使東亞諸國之聯合提携愈加密切，而其結果使其全地域之生活基準向上時，則對於地方對於世界均有甚大之價值者也。」

彼又云：「日本門羅主義若果與美國門羅主義然，只爲防止外國對東亞圈內諸國之侵畧而確保其和平時始用武力，自爲世界之利益，若用之於侵略方面，則害莫大焉。」今觀中日基本條約，中日兩國約定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中日滿共同宣言又聲明互相尊重其主權及獨立，是則日本無侵略亞細亞諸國之意圖，至爲明顯。美國門羅主義並無自制的規定，亦未誓約決不擴張領土。然日本門羅主義，如前所言，有尊重中滿兩國主權及領土之自制的規定。關於此點，遠勝於美國之門羅主義，甚至德國之門羅主義。若令門羅主義產生於亞細亞，能發揮其效果之國家，舍日本莫屬。何則？前已言之，握有足以支配東亞之優越的經濟力與軍事力，只有日本。故縱令由他國宣言門羅主義，恐無何等實益也。

大英帝國之基礎，其所築成之石塊，無一而非潤有血痕者。美國對墨西哥之戰爭，不外爲征服之戰爭。日本在滿洲之進展，比美國在加爾佛尼亞之進展，更爲正當，自其後之發達觀之，足証兩方皆係爲本地域及爲世界而出於賢明之行動。賈斯爾氏有言曰：「美國自以歡迎日本之門羅主義爲高見。若美國率先承認之時，則吾人立即可恢復與日本之友好。固然吾人之行動乃以自國本位爲主，但日本亦必理解而歡迎之。」該氏最後結論謂：「美洲門羅主義向世界其他部分宣言排除對於亞美利加兩大陸之政治生活的干涉。此即表示美國亦不干涉歐羅巴及亞細亞兩大陸之政治之意。故爲對抗外部侵畧實行強化協力與美國門羅主義同一原則的亞細亞門羅主義，於美國誠有利而無害也。」

以上所考察者苟無誤時，則近衛聲明及沿中日基本條約之線而發展的亞細亞門羅主義與大東亞聯盟，不但爲盟邦德意所贊成，若國交調整成功時，且亦廣爲英美蘇聯等所承認，洵可謂週到而妥當之政策也。



緬甸之佛教

謝爲何

佛教乃在第七世紀，即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傳入緬甸。緬甸之佛教，乃南方佛教，屬於小乘。最初之傳教人爲疏那及烏打拿，乃由錫蘭而來者也。

佛教未傳來以前之緬甸，與當時之其他民族相同，並無何種之宗教，祇崇拜數多之靈魂，以爲山、川、草、木皆有靈魂存在，此乃由恐怖所發生之單純的崇拜。

緬甸人，現時仍信此等靈魂之存在，但因有佛法之故，已無恐怖之心，觀緬甸各地之幽靜路傍，與森林之中，遍有奉祀自然現象靈魂之小祠，自可知緬甸人之心理矣。

最初歸依佛教之緬甸王，爲十一世紀之那吧打王。

王之歸依，爲緬甸佛教紀元之始。自此之後，佛教之急速發展，有如火之燎原，結果，全國國民皆從而歸依，現在緬甸人口一千四百萬中，有一千二百萬以上爲佛教徒，不信奉佛教者，大部份爲外國人，及居住緬甸與中國。

國國境鄰近之未開化蕃族。

緬甸佛教之所以如此迅速普及者，乃僧團，即僧伽之活動所致，彼等初時遊行全國，以傳播釋尊偉大教義。最初所到之處，均受歡迎，且尊奉彼等所說之教義。最初彼等紙屬遊行僧，自教義盛行，各地居民，乃要求彼等長駐，以便說教，最後因各地居民維持僧侶之能力，與宗教的要求之熱情增加，於是各村各區，均有僧侶居住。是時之僧侶，均招集當地之弟子、學生施以教訓，對弟子，教之以佛教聖典及三藏，對學生則教之以佛教初步，讀書、寫字、算術等。至於科學，歷史、地理等科目，乃世俗之學問，禁止教授。

緬甸之僧侶，乃穿著黃衣，普通之衣服，乃由大小二衣而成，大衣乃遮蔽全身，小衣乃遮蔽身體之下半，普通則不穿內衣。

僧侶乃落髮者，鬚髮均不留。常着類似日本草鞋之

皮拖鞋。

結婚及無論任何種類之性的行爲，均在禁止之列。

食物祇在上半日之間，即祇准午前食物。由正午起至翌日之晨早止，無論何種固體食物，或液體食物，又或牛乳、茶、蜜糖等，有食物價值者，無論何物，均不得攝取。有等宗派，甚至捲煙亦禁吸食。彼等不得與俗人同居於家庭，祇准住修道院或寺門，不得持有金錢，如俗人之所謂所有財產者，亦屬禁止，一般國民，皆供之以各項日用品物，以維持其生活，故緬甸僧侶，皆每朝手持鐵鉢，前往民家乞食，殆若工作之一種。緬甸國民，均篤信佛教，樂於供養僧侶，故一見僧侶持鉢到來，則敬虔供奉，非必俟其乞而後供養也。僧伽有兩種階級，一爲上級之僧，二爲下級之新發意。二十歲後，方得爲

僧，由五六歲起，可爲新發意，前述食物與居住之戒律，兩方均宜遵守。

婦人不得加入僧伽，但女子可以爲尼僧。尼僧須落髮，橙着黃色之衣服。關於食物之戒律與僧侶相同。

緬甸全國少年，均應以新發意之資格，加入教團。在一定之期間，即由七日至七年之間，須居留教團。彼等以加入教團爲莫大之功德，其父母亦以其子女之加入教團爲一種有名譽之事。

緬甸僧侶，能努力於修己化人，故一般國民，均受其感化而篤信，我國佛教之遠祖，亦與緬甸相同，但發展之速，遠不及緬甸，豈僧侶之不力歟？抑國民信仰之不足歟？極盼我等佛教同人，努力護教，勿甘居於緬甸之下而後可。



勘察加半島獵黑貂之奇談

桐雲

勘察加人的生業，主要是狩獵和漁業，但最近飼養家畜也很發達，獵的目的，以黑貂、熊、狐、川獺、貂、野牛羊等為主，至於獵兔及獵他爾巴年不過屬一種玩賞，有時也去獵狼。

右列舉動物中，最重要的是黑貂，其次是熊，黑貂和鯨，勘察加之為亞爾花、呵美加、假使沒有這種東西，那麼勘察加到現在，也不過住的祇是飼鹿的遊牧民，不得到現在的地位無疑，這兩種動物，竟把俄國人及其他民族誘到這土地，令他們飽受嚴寒慘冷的氣候，又引誘斯埃遜及其他大皮革公司的船隻來到這裡，也是黑貂；每年夏季，許多小汽船曳着滿載各種商品的平船，趨勘察加河而來的，也為的是黑貂。他們的皮毛，不過屬一種奢侈品，全半島竟偏設着商店經營或販賣，這是很值得奇異的，一到冬天，人人皆說黑貂的話，無數小商人，駕着犬橇，積載着蓄音器、懷中鏡、婦人靴、烟艸、火酒、砂糖及各種物雜，都是土人們垂涎得很利害的物事，在半島各地，走來走去，小部落內，有的每家都有這種小商人寄宿着，其中最多的是中國人，他們具有無匹的生意才能和天寵，他們買收獵師們的黑貂皮，運去他處謀利，此輩旅商人，有的是大商行的買貨手，個人經營的也有。

勘察加的黑貂，就是貨幣本位，所有商品交易，都用毛皮支給，因為牠是土人們唯一的交換物，土人們要問問外商所有的銃器或雙眼鏡的價格，他們便說，這東西值得黑貂皮幾多張呢？最初外人們覺得奇異，可是見慣了，

也就不以爲奇了，有一次一個勘察加主人，從鄰人買了一隻獨木舟，他給了黑貂毛皮一張，作爲代價，還有找頭，贖的是一張狐狸皮，又某村小學校的學費，男生是黑貂一枚，女生是狐皮一張，這裡的交易，大概是以毛皮交收的。

勘察加人們的錢，現已配給全世界，至于大都市華麗客堂的高價毛皮，怎樣得來，這是甚有興味的一味事。黑貂是類於鯨的獸，其大和瑞典的貂相同，牠是棲止在柳和針葉樹的密林中，勘察加人狩獵牠，是在十月雪降之後，直至明年三月。

雪未深積時行獵，名叫秋貂狩，大抵是乘馬而出，馬背上除騎者外還馳着鏡器、鋤鎗、布帳、食糧、捕獸器等必要的東西，勘察加人把一匹馬，畧如冰島所產的小馬一樣大，自己乘上之外，還積着四五並同多的行李，他們或兩人一組或數人一組，帶同一兩四小犬，便勇躍出發，獵場大抵距村鄉甚遠，要行數日至二三星期，才能到達，到時便選擇適當場所，張開天幕，作成了臨時寓所，或用木料，建成小屋，獵場上或有前年建造住過的住居，或重新急造，獵得的物誰多誰少，不入計算，因爲籠總均分，所以局外人問他們，這個冬季你獵得多小黑貂呢，他會答你說五匹半或七匹零四分之一，那不是奇異的一回事。

一個月後，積雪漸深，馬行不得了，他們便暫且回村休息，把獲得的貂屠了大排筵宴，既飽且醉，又準備正式的冬季狩獵，數週間之後，再出征，這回却不乘馬了，人皆改用犬攏，一切必要品之外，攜帶大量乾鮭，作爲自己及犬的食糧，但冬季狩獵中彼等的主食物，係由哥拉和茶，師獵們張開天幕或建造小屋，其場所，不很對村中別的獵師們說知，造成住居後，便從事裝飾，第一要安置小煤爐取暖，把犬繩在周圍的樹木，又造架放置由哥拉，防犬偷吃，一切準備就緒後，便開始狩獵。

他們着馴鹿毛皮的長靴，更縛上滑雪鞋，又於衣服上，加上雪衣名叫加姆列加的，將獵鏡的革紐掛在肩上，手拿長柄的木製拂雪帚，此外攜帶捕獸器數具，和少量兔肉，這是誘捕黑貂的餌，又解除一二頭犬的鎖，鎖一解後，犬便大吼狂喜的吠聲，牠們雖也使用作曳擺，却和普通的曳犬不同，是爲狩貂特別搜求而來，名喚拉姆特，牠們裝

着和獵犬一樣，不曳繩却曳奇形的袋，袋內藏着黑貂網。

天未光前獵師兩人，帶了這種犬出外，因黑貂係夜行動物，此時正係牠們捕食小兔和雀鳥歸來的時候，獵師們先搜尋其足跡，有時搜索數日，還尋不到黑貂的足跡，可是，運氣佳的話，一便尋得，他們既發現了和狐足跡相類的痕跡，犬們先便一齊蓄勢待機，獵師便解開犬們曳着的黑貂網袋，犬便發狂搖尾，立刻追索足跡，轉瞬跑入林中，連踪跡多不見了，獵師們也循着足跡，緊隨犬後跑，却總追不到。

突然聞遠處犬吠聲，獵師們側耳細聽，方角立明，便離去足跡，一直向聲的方角跑，不久跑到被風雪吹倒的老樹傍邊，並見犬在這裡搖尾狂嗥，不住用前爪掘扒積雪，牠們這時，已不暇理會主人經已到了。

獵師們到達後，犬們暫時要寧靜，獵師便檢查場所，設立方策，足跡既止于老樹之下，黑貂自然蹲埋樹的窟洞無疑，便在倒樹周圍，張開線網，樹網的棒，當然先已齊備，不移時，那倒樹便被高約一米的網所包圍。

獵師一人，持鎗兀立，另一人，拿雪扒，和犬一齊發掘倒木下邊，時時用雪扒敲擊倒木，忽然間一小動物飛出，疾如閃電，犬立追之，悲哉貂君，陽光眨眼，一無所見，不移時便竄入網中就捕了，犬們便會從網中啣之出，若是普通獵犬，會立刻將牠噏殺，不然，也咬了逃走，可是這特別訓練過的犬，自己的義務完成後，便離開了獲物了，獵師們得了獲物後，即把網卷好，又重新找尋足跡了。

但是，如此容易的事，不是當時遇見的，黑貂也不是日日可獲得一如獵普通的野兔野雞似的，獲得一匹，代價得到二百他拉桓至六百他拉桓，有時從朝到晚任你怎挖掘老樹下，也得不到，到了日暮，留犬四守着，自己回歸帳幕，要是運氣好，那犬深夜了咬獲物歸來，翌日纔發見黑貂脫出的穴，那也罕見的事。

黑貂有時也會藏在立木的洞內，這時候怎樣辦法呢，須要用鎗擊之，也有用斧頭狂砍，驚使飛出，但有時任你怎樣敲也不出的，此時勘察加人，便用火攻法，烟燻樹洞，黑貂忍耐不得，不能不逃出，一個人持鎗以待，貂一出立卽轟殺之。

足跡雖然見出，但貂究竟走往甚麼方角，未能詳明時，便裝成幾個捕獸器，用兔肉或大松雞的肉爲餌，捕獸器捕

獸要熟練，關於動物的習性要有深認識，勘察加人，實爲此道的名人。

狩黑貂普通的方法，就是如右所列舉，但往往有不携獵犬的獵師，例如俄國人他們祇是自己步行搜尋黑貂的足跡。

也有用繩直捕黑貂之事，就是晚秋堅冰未結前，用一條長木架在河上稍狹之處，有如橋一樣，黑貂一行到橋上，便顛入置內，勘察加人在未使用鐵製捕獸器前，就使這手製的置，置的製造頗妙，黑貂一觸及餌，置上一棒，便前在貂身上，把牠絞殺，這方法今雖禁止，但使用者依然不絕。

最勤勉的獵師，一個冬季，通例獲得五匹至十五匹，獲到十五匹時，只限于黑貂豐產，且運氣最好又係精勤的人。

聖誕節一來臨，獵師們便全體回村宴祝，用費大體賣了最初獲的一匹充當，他們藉慶祝爲名飲酒最多，往往宴會數日不斷，一匹的賣錢不夠又賣第二匹，宴會告終他們又打伙兒赴獵場了。

冬季狩獵終了，撤退獵場時，他們於黑貂之外，並將多數獵物，其中渴有捕獸器捕得多數的狐，最多的是赤狐，也有黑狐、十字狐、銀狐等，北部還有白色的北極狐，可是這半島內，單單沒有青狐，青狐大抵棲息于半島東海岸附近的銅島及比林克島內，又獲物中，大抵含有川獺。此獸，凡勘察加所有河川內，都很繁殖，用捕獸器便可捕得，至于野兔，就在天幕附近設網，便很容易捕獲，因爲這東西這裡至多，牠行過雪路上，成了一條顯然的道路，又狼和苦津利，不過偶然獲得罷了，說到苦津利，實係勘察加最討厭的動物，獵師們一次運不完的獲物，便放置在現場，打算明天往取，誰知明日去看一看，把獵師們嚇個舌橋不下，因爲所有剩下的獲物，拉去的拉去，吃淨的吃淨，蓋昨夜一夜內，已被苦津利鬧得亂七八糟了，勘察加人見了這苦津利的大足跡，不覺嘴裡哼着「普羅克拉他也，羅梳馬哈」（其意即謂抵死的東西）苦津利毛皮的價錢，比較赤狐畧貴，但這東西未曾出現世界市場，商人們買了牠，持往哥爾約克人和拉姆特人家裡和他們交換更好的毛皮，因爲遊牧民種，好用赤色，作爲毛皮服的製飾。

距黑貂獵場不遠的地方，若發見野生羊或野生馴鹿的踪跡，勘察加人們便大喜，立刻狩獵，絕不肯放過，因爲

這種獸的肉，可食且美味，皮却不甚中用，況且他們日日祇食干鮭，吃膩了，自然想吃別種鮮味，又他們並不單爲自己計，獲得後並給與攬犬吃，狩獵時，不甚使用攬犬，一個狩獵期間大部分，都是把犬們繫在橋下，所以食物，祇最少限度便足，通例一日給食干鮭半尾，有時且會減少。

最後還有不常見的事情，譬如帶了獵犬搜索山林時，突然發見熊巢，此時獵師們便用棒和犬，把巢內睡熊弄醒，並逐出至適宜場所，以便圍擊，但是正式熊狩的季節，實在春天和晚秋之時。

狩獵期間中，勘察加人們，在山林中過活，甚爲苦楚，建造小屋的尤要冒着酷寒，建一間屋，至少雖得幾勞動，這種勞動，勘察加人們是最不歡喜的，他們只好躲在天幕，伴住那天幕用的暖爐取暖，這小暖爐流入勘察加聞說是二十年前的事，現在半島內盛行使用着。

爲降之故，往往要躲在天幕過一兩星期，因之他們要把天幕張得極其堅固，而且要準備一兩星期足用的柴薪，本來若是歐羅巴人，最討厭的是不疲勞時沒事可做，可是勘察加人們却當作是很平常的事，反而喜歡，謂是難得的安閒機會，他們可以幾個星期睡着不起身，一個天幕，通例居住二人，交相添薪，吃飯更爲簡單，他們都是躺下蒙着厚被，吃飯時僅僅伸出兩手，用來拈住食物，送向嘴裏，一日內祇取集床下的雪，放入暖爐傍的釜內，便萬事足矣，于魁置在容易取用的地方，一日內大部分是在夢中，睡醒時就取干鮭，嚼食一頓，飲幾杯茶，又復躺下，再睡時又復如是，只可憐的是繫在外面的攬犬們，牠們並無何等掩護物，日夜曝于凜風冷雪中，有時幾日得不到食物，餓到跌倒地上，禍因就是主人懶惰貪眠之故。

冬獵期間所有勘察加人，都患着列馬斯病，尤其是大人，實在沒有一個不患者這病的。



中華東亞聯盟協會青年團幹部訓練班 第壹期學員結業典禮拾零

張子凡

警備東亞聯盟第一線

中華東亞聯盟協會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第一期學員，經過了三個月來嚴格的訓練，現在蓬蓬勃勃的滋長起來了。這一羣八十多名叫的年青同志，也就是在這「鷄鳴風雨」「兢兢戰戰」的氛圍下，已經踏進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就是結業了之後，將來怎樣去肩荷大時代給予的使命，即是怎樣去促進「東亞聯盟」建設的實現。

二月二十八日那天，青訓班第一期學員結業典禮和畢業同學會同時在廣州惠愛中路該班禮堂舉行。這天的天氣，始終是澄澈靜穆的。雖則「春寒料峭」，還不免帶點令人顫慄一下的冷氣；却是爲了當筆者踏進了場內之後，見着會場情緒的熱鬧，空氣的緊張，一切什麼「雪雪呼凍」「肌膚欲裂」的感覺，都已拋諸九霄雲外。

十多名保安隊、七八名警察、幾個便衣偵緝、和六七位全副制服的青訓班學員，分別兩排站在門邊，十來

輛汽的車，是停放在馬路的一旁了；多是「警衛森嚴」，多是「堂皇瑰麗」。「路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但云」什麼？杜工部老先生所謂「點行頤」嗎？不，却是說「青訓班舉行結業典禮」「結業典禮」呢！

踏進了班門，祇顧朝着前面走，迎面的屏門板壁上，中、日、滿三面鮮明的國旗，很整齊的當中并列着；在一幘面積相當偉大的 汪主席肖像之下，四幅別饒作風的漫畫，分別次序的張貼起來，那就是：「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從每一幘含義的深刻，筆畫的神似，都相當的可以收着文字宣傳的效果的。

簽到簿上早已留下了許許多多中日長官，和各界名流的題名，這些「雪泥鴻爪」，是彌足可貴的：陸軍特務機關長矢崎斟十，海軍特務部長岩越寒李，東京帝國

大學教授中村孝也博士，廣東共榮會主席井上正男，廣州市長關仲義，社會局長陳嘉鶴，軍委會委員長駐粵辦公處主任李謙一代表朱則，軍分校政訓處長黃恩灑，朝日新聞社，廣東英文新報，本市各報社……真是濟濟一堂，滿歎盛會。加上了禮堂佈置的週密陳設的肅穆莊嚴：各色各樣的生花，紙球，旗幟，標語……的是使筆者不但絲毫沒記起「干戈」「暴戾」的氣氛；而且極度感覺到有「和平」「幸福」的意味。兩所招持室內，香烟娛樂，談笑喧嘩，相離幾十步，就可以見到、聽到、同時感覺到裡面已經憩息着許多軍政顯要、貴賓名士。室內的四壁，滿掛着各種圖表：像學員年齡比較表啦、資格比較表啦、保送機關統計表啦、學員學歷統計表啦……和各種照片：像「學員自治會成立典禮」、「日本東亞聯盟協會促進會會員參觀留念」，各種學員生活照片……真是目不暇給。

是中國時間正正二時，行禮儀式宣佈開始，於是「聲影衣香」「夷服長袍」的來賓一羣，摩肩接踵地一一魚貫的踏進會場了。從他們或她們每個分子臉上喜溢眉宇的神態，都可以象徵得到他們或她們都是滿懷興奮的了。全場人數，大概總在七八百人以上，廣東大學特地派

出幾十名學生到場，更加增進了全場的熱鬧。從肅立、向國旗致最敬禮、全體就座；以至於致開會詞，這幾項節目，都在莊嚴肅穆中渡過。大會主席是班主任陳顯謨，致開會詞的時候，由於他的姿勢的中矩、態度的靈活，充分表現出年少老成的典型。他的演詞大意是這樣的：回想青訓班自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到現在，已經三個月頭，第一期學員的結業了。在這三個月的中間，因爲得着外界人士的時加指示，班內各位教授的悉心訓導，辦事同人的努力合作；加上了各個學員的奮志力學，遵循訓示，差幸得着今日的結果，這點是頗堪告慰於各界人士之前的。我們知道青年是社會的中堅份子，社會的柱石、棟樑；一切社會建設，一切社會文明，都有賴於我們年青熱烈的分子去推動。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我們要立大志做大事，不要立大志做大官。各位現在是結業了，將來的工作，更加艱鉅；使命越益重大。況且現在「東亞聯盟」的趨勢，又是一天比一天接近。將來各地會務的推進，責任也就在於你們，益發是「事繁責重」了。希望各位將來派赴各地機關服務，本着以往在班受訓時的精神繼續努力。朝着當前的目標邁進，去完成「東亞聯盟」建設的使命。

接着便是由會長林汝璣氏致詞。因爲林氏赴日考察未回，由協會理事陳嘉謙代表訓話。他——陳先生，先就中國歷史上的關係，闡析出「東亞聯盟」的必然性。謂中國古代有兩個著名的國際研究家，就是墨翟和蘇秦。蘇秦的「合縱」說法，就是現在國與國間微妙關係的張本；可是他的主張的立腳點，純然祇曉得替個人利祿打算，只知道矯矜妻嫂；國家社會的利益，何嘗理會到？這種「權謀術數」「捭闔縱橫」的思想，在承平時代已是不要不得；何況在這國家多故，望治孔殷的時候，還是我們每個熱誠愛國的年青份子所應該具有的頭腦嗎？至於墨子的「兼愛非攻」，那纔是「和平精神」的真正表現。拿這一位學者的人格，來做我們今日和平運動的寫照；「東亞聯盟」建設的圭臬；以及我們青年作事的模範；是最切合不過的；也是最需要不過的。希望已告結業的各位，効法這位先進先賢——墨翟——的作事規矩；和他的刻苦奮鬥精神，各盡所長，學以致用；繼續以往服務的勇氣，鼓起我們的魄力，去建設共存共榮的新東亞。

隨着教育廳第二科科長林伯榆氏也代表了教育廳長敘述訓詞，勉各同學除了應該更謀學識上的增進認識外；應該更加注重內心的涵養，人格的潛修，方才可以完成大時代給予的使命，方纔不愧爲「東亞聯盟」建設的一員。

前綫開士。陸軍特務機關長，也由通譯員翻譯傳達訓話，贊許各學員的刻苦耐勞。並謂現在中國的內地，大部份都還未曾瞭解「東亞聯盟」的真締。說到受過「東亞聯盟」學識洗禮的人，更是絕無僅有。各位是第一批受過訓練的青年；責任的重大，當然是不言可喻的。將來各地人民的逐漸普遍認識，與整個中國人士的理解，都在你們各位的肩上，希望始於不懈，以竟事功云。井上正男先生此時更加老實不客氣地直接用日語的流利腔調，去解釋「東亞聯盟」的真義。爲的青訓班的日語課程，所採書本——日語寶典——是井上先生漚心灑血，一手編纂而成的。學員們經過了九十日來的昕夕陶冶；又得着教授先生們的善誘循循；相當的有着可觀的收穫了。因此對於井上先生的這一席話，也就絲毫沒覺得「難深枯澀」「佶屈聱牙」。至於中村博士的演詞，更是別開生面，奇趣新穎。

中村先生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也就是世界知名的學者，最近由本省省立廣東大學，專誠聘請來粵，在該校擔任講學的。他老先生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足爲我們的表率，是不消說的了。從他說話的有節，精神的飽滿……，都格外另具一種使人肅然起敬的神情，確是一位有其超特風格的學者。他——中村先生——

過好幾次，而且好像很混熟的了。他一說出，真使筆者摸不着頭腦兒，不知中村先生說些什麼？啊！一會兒他却說出了原委，才使短暫的筆者，有如「大夢初覺」，真的像晨鐘暮鼓似的了，原來他見着這興奮熱烈的一羣，年青蓬勃的一夥紳士；彷彿如廻身東京帝國大學一樣，和見着一班活潑勇敢、奮發有為的學生是無二致的。因此，在「人遐寧遠」「停雲落月」的憧憬中；更加加上了今日「緊張熱烈、充滿和平」的景象；就覺得不其然而然地說出這衷心之言——也就是「推心置腹」「精誠」的一席話。

一陣哄堂的內心微笑聲，打斷了他老先生的話匣。頓了一刻之後，他又毫無倦容的繼續說：『站在本人的立場，本來就不應該對各位敢有所訓示的；然而各位既是這般美意的堅邀；熱誠的感召，也是着實使我難受。於是我也祇得拿出所要說的話，不容氣的儘量公開於各位之前。『東亞聯盟』，到現在已經是很普遍的流行着它的不可遏抑的聲浪了。看吧！這種有其自然性與必要性的運動，在日本、跟滿洲國早就有了兩國間關於「東亞聯盟」的結成，而且很密接。此刻和中國也進行這種結成運動。雖則爲的是開始未久，然而所收效果已足驚人。不過，今後關於聯絡的進行，各地會務的推動，最是急不容緩的要務，這些責任，就得請貴國的青年，上特別是在座各位受過純正訓練的年青同志去擔負。今日覺得各位朝氣勃勃，怒苗振奮的精神，本人實在覺得非常安慰與歡愉。兄弟之意在廣東大學講授一月期滿之

後，回到東京的時候，對着本國——日本——年青學子，當然會在他們跟前盡量介紹各位的熱誠；竭力帶進各位的真意給他們知道，使他們有所澈底認識的。而且不久的將來，本人會率領他們到貴國各地——特別是貴會所在地的廣州——來，「耳聞不如目見」「百聞不如一見」，好教他們實地觀察、親歷其境；使得聽得到的、就見得到；見得到的也就要做得到，實行得到呢！同時也極端希望你們，在可能範圍內，在最短的期間內，也到敝國各地參觀一下；也好教各位明瞭日本的一切，進而諒解日本的一切；這也是「切磋琢磨」「相觀而善」的一個好辦法。——詞畢，四下裡先是沉寂不過的，此刻却不期然有點熱烘烘的鼓噪空氣來，却是劈劈拍拍、全場鼓掌的雷動。

隨後儀式的節目，便是：來賓演說、學員答詞、會長授憑、畢業同學向全體長官行一鞠躬禮、畢業同學會理監事宣誓就職、拍照、茶會、禮成。中間還插着各方面祝詞的宣讀，像：廣州市長關仲氏義的祝詞啦、衛生局長王會傑氏的祝詞啦、廣東省婦女會的頌詞啦，廣東大學的祝詞啦……都是瑯琅滿目，鏗鏘可誦的。

最後由陳嘉鈞氏代表林會長向結業同學授憑，由班主任陳顯謨氏轉遞授給學員，是分組一組領受的；儀節也是莊重不過。這一會，學員們的每一個臉龐，老是流露着笑逐顏開的神態了。同席通訊社幾位特派寫真師，熱着感光快鏡旋轉機，興奮地聚精會神的注視着；電光一閃，又是得着一個「銘鑄心版」的留念。

會務撮要

本會自去年九月九日成立後，即確定本會內層組織；一面集中全力，向本省各縣市籌備分會，積極宣傳，同時徵求會員，以期鞏固下層基礎。至十一月間，各地分會，陸續成立，業將各分會籌備及成立情形，於本會月刊第一二期。分別敘述。茲再將上年十一月後之會務，擇其帶有推動性者，簡述於后，以爲關懷東亞聯盟運動之人士告：

一、本會內層機構，已於第一期月刊本會組織系統表內述明，嗣爲強化本會機構起見，特於上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增設秘書處，并派林朝暉同志主持，期使會務圓滑推進。

二、東亞聯盟協會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第一期學員於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學，班址在廣州市惠愛中路一百八十二號，學員八十五人，此項學員由各縣市保送，訓練期間三個月，其目的保養成東亞聯盟運動青年幹部人材。

三、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在廣州市廣東大學舉行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演講比賽會。演講題目，大學組爲「怎樣解決中日事變，完成新東亞建設的使命」高中組爲：「東亞聯盟與中國政治獨立問題」初中組爲：「我們對於東亞聯盟應有的認識」結果成績甚優。

四、番禺縣分會及南海縣分會分別在十二月十八日午後二時至四時，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二時至四時，舉行各機關職員各區鄉鎮長，各團體領袖座談會。本會派秘書林朝暉組織組組長林伯榆參加指導。

五、本會爲整理本協會組織之體制使東亞聯盟運動於華南方面迅速發揮其實蹟起見，特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在本會召開各縣市長及關係者座談會。談話要點，係報告過去工作，研究將來推進會務計劃，結果完滿。

六、本會為溝通中日文化意見，特由編譯組蒐集東亞聯盟刊物，從事翻譯，其已譯成華文者，計有昭和維新論、東亞聯盟建設綱領等多種，於本月二十六日出版，以供東亞聯盟同志及一般民眾之參攷。

七、本會自成立以來，以所負使命的重大，為要民眾認識與了解東亞聯盟的真義，實非側重宣傳方面不可，特刊行東亞聯盟畫報、月刊、小叢書、建設綱領等刊物多種，藉以啓發民眾對東亞聯盟運動的開端，現各項刊物均繼續出版，并按期遞增印刷數量，以廣宣傳，而期達到發揚東亞聯盟之目的，將來特刊壁報及每週在新聞報紙發表附刊等正在計劃當中，相信如此做去，必能更惹起社會人士之注意。

八、本會為引起羣衆觀感對東亞聯盟認識起見，特在市內各衝繁地點，繪製東亞聯盟宣傳壁畫，使有目共親，默化潛移，查巾內如漢民路、惠福路、長堤、靖海路、大新路、小北路、惠愛路、東山、太平路、文明路、大南路、西湖路、倉邊路、中華路、黃沙車站、廣九車站等處，均已繪製完竣，其他適當地點，正在派員調查預備繪製中。

九、本年一月七日，本會理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改組機構，以求工作之圓滑強化，（一）添設計劃部，調宣傳組組長李家英為計劃部主任（二）本會畫報社及月刊出版社歸併宣傳組，以林秘書朝暉充任組長（三）改組海外組為海外會務設計委員會，以海外組組長張伯蔭為海外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四）分會之下增設支會，以鞏固下層基礎。

十、一月十四日本會歡迎日本衆議院議員東亞聯盟促進團，在本會召開座談會，以中日合作及東亞聯盟運動為中心誤題，中日兩國人士，開誠作無隔閡的談話。（談話筆錄見本刊第二期）

十一、二月二十五日，青年團訓練班學員自治會舉行成立典禮，其目的為養成個人自治，達到團體自治。

十二、一月十七日派理事梅慶芬赴南海縣分會召開第二次座談會，提出東亞聯盟問題，互相討論，獲有良好的成績。

十三、一月十二日順德分會，召開懇親大會，會員到會者甚衆，對於東亞聯盟運動真諦，互有發揮，會員情感，益

見親治。

十四、一月卅日本會林會長林秘書飛京出席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成立大會，并於十日飛赴日本與朝野人士作現地懇談，期內會務，交由組織組長林伯樞暫行代理。

十五、本會為使各會員具有活動之知能，完成東亞聯盟之使起見，特頒行訓練會員暫行辦法，規定各機關各學校團體及各區鄉鎮等，按月分期舉行演講會、研究會、講習會、座談會，以期達到訓練之目的。

十六、二月初旬南海縣分會擬訂各區支會暫行規程，聘縣屬各區長為該支會幹事。

十七、二月二日中山縣分會舉行第二次會員大會到會者三千餘人該分會主任歐大慶及外賓暨各界名流演講對於東亞聯盟意義闡述辭遺，情形甚為熱烈。

十八、本月份東莞縣分會與東莞縣政府宣傳科聯合舉辦演講會座談會及民衆識字班，并規定（一）逢星期一為座談會，星期四為演講會（二）派員輪巡前赴縣屬各中小學校舉行，（三）民衆識字班以教授本國文字及灌輸和平運動思想為宗旨。

十九、二月十八日，本會青年團幹部訓練班舉行第一期學員畢業典禮，中日長官到會出席者有日方陸軍特務機關長，海軍特務部長，暨友邦教育名流中村，井上等多人，中國方面有廣州市長關仲義，社會局長兼本會常務理事陳嘉靄，中央電訊社廣州分社主任兼本會理事陳璞，軍校政訓處長黃恩灑，教育廳代表林伯樞等暨該班全體教授全體學員數百人，由該班陳主任顯謨主席，陳常務理事嘉靄代表林會長訓話，特務機關長與教育廳代表林伯樞等致詞，關市長王衛生局長廣大林校長致祝詞，最後由教育名流中村，井上等相繼致詞，語多勗勉，旋由學員答詞，陳常務理事嘉靄代表會長授憑，至四時典禮完畢，拍照散會。

二十、本會青年團幹部訓練班計劃徵集第二期學員，名額約為一百五十名，徵集辦法如下：（一）由各縣市保送約六十名。（二）由各機關保送約十名。（三）由各民衆團體保送約十名。（四）其缺額之數另由招攷補足之。

廿一、二月廿四日番禺縣分會假座八桂中學禮堂召集學界座談會參加者有八桂中學，縣立第一小學等員生百餘人由

該分會黃常務理事仲篠主席，向各生解釋東亞聯盟意義，繼由出席者屢續發表意見。情形異常熱烈。

廿二、二月廿八日番禺分會召集該縣警察隊開演講會，到會者全體官佐參加約百餘人，由該分會宣傳股長何大山幹事關文祥先後演講東亞聯盟與人格建設。及東亞聯盟的重要性。

廿三、三月五日番禺分會舉行第二次各區鄉鎮長各學校長各社團領袖座談會，本會派梅慶芬黃仲篠兩同志出席指導，參加人員互相發揮東亞聯盟理論，並討論今後推進會務方案。

廿四、三月二十日本會主辦之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第二期舉行入學試驗，本會派李頌衢同志蒞場監考，結果正取四十名備取二十名。

廿五、林會長汝珩自東渡返國後，即召集本會重要人員計劃推進工作，並為強化下層機構，擴展各地會務起見，擬定整理各分會計劃，分期躬赴各分會指導督飭，特於三月廿六日偕同訓練班主任陳顯謨先赴花縣觀察，就地指導工作，并召開座談會討論推進該地會務之有效辦法，四月二日偕同林秘書朝暉訓練班主任陳顯謨前赴順德縣分會指導會務，並擬就計劃飭該分會舉辦該縣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又於同月五日偕同編譯組長陳致平組織組長林伯樞青訓班主任陳顯謨赴中山縣分會視察，並指導推進會務，至其他各縣市分會，亦擬於最短期間分別前往指導督飭，以完成本期之推進計劃。

廿六、油頭市分會中山縣分會分別於三月廿八日及三月三十日舉行學生演講比賽會。
廿七、三月十三日，是日為國府還都週年紀念本會特預行刊印宣傳標語數萬張於是日分別函送各機關團體學校及在市內張貼以誌慶祝并藉此以宣揚東亞聯盟，其他關於東亞聯盟口號綱領等均用三色版大量印刷陸續分送各縣市各鄉區張貼，以推展東亞聯盟之宣傳。

投 稿 簡 章

- 一、凡有關于東亞聯盟及和運之發揮，當前政治經濟問題與國際關係之研究，無論著譯皆所歡迎。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黑墨清晰繪寫。
- 三、譯稿請將原著寄來，或請詳示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月日及地址。
- 四、投寄之稿，本刊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 六、酌減。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譯稿酌減。
- 七、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八、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音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九、來稿請寄廣州漢民北路五號中華東亞聯盟協會東亞聯盟出版社社

每期廣告價目

地 位	全 面	二 分 一	四 分 一
底 封 面	一 百 元		
封 面 底	八 十 元	五 十 元	
正 文 後	五 十 元	三 十 元	十 八 元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東亞聯盟月刊 二月 合輯
編輯者： 中華東亞聯盟協會
發行者： 東亞聯盟出版社
經售處：
上海中華日報館
香港南華日報館
廣州中山日報館
各地各大書報社

▲ 實價每冊國幣六角

附註
一、如長期刊登另有優待
二、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加其他彩印另議
三、繪圖製工價另議
四、廣告費一次付清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七天七五二年